

下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风沙雁文集

〔新加坡〕欧清池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风沙雁，原名欧清池，国籍新加坡，祖籍福建成就尤溪。毕业于南洋大学，后负笈日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位。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曾任职于新加坡移民厅、外交部；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为期五年；现任职于《联合早报》。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

风沙雁早年写诗与散文，收入集子的有《砂砾集》与《矛盾集》；后不再写诗，专写散文编为集子的计有：《文艺絮语集》与《哀思集》。有政论选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风沙雁的散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其中受唐诗宋词影响尤深，他的文字优美，讲究意境的塑造，早年散文较有激情，偏重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与歌颂美好事物；留日时期写的散文较为沉郁；近转向学术研究与短篇小说创作，文风较为淡雅。

本书收入悉数捐赠给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下
卷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风沙雁文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风沙雁文集(下卷)

(新加坡)欧清池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沙县印刷厂排版印刷

(府西路 87 号 邮编:3655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6.625 印张 4 插页 63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046-X

I·941 定价 35.00 元(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忧 患 集

东方传统研讨会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493)
关于大传统的继承问题·····	(496)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498)
要未雨绸缪 别临渴掘井·····	(500)
不入虎穴 焉得虎仔·····	(502)
笑傲江湖与挺身为国·····	(504)
无知与不可一世·····	(506)
大自然与儿童心理健康·····	(508)
反映民情 弹劾时弊·····	(510)
我们很需要知识分子·····	(512)
把科学与文学融合·····	(514)

新华作家应看清困境 从重重困难中找出生路	(516)
华语夹外语不是好现象	(519)
讲华语运动朝向崇高目标迈进	(523)
春到河畔 芳踪何处	(526)
做好抽绎合时价值观工作	(530)
建立优雅社会至为重要	(532)
优雅社会须艺术人才支撑	(534)
文化特色须长期营造	(536)
华文书市场尚有发展余地	(538)
养成阅读的习惯	(540)
文化建设的信心问题	(542)
唐城应可吸引旅客	(544)
加强新中文化交流	(547)
新中加强经济合作的里程碑	(549)
新中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551)
重视亚洲的优良价值观	(553)
不排斥流行曲 更爱抒情歌	(555)
“他踢我的脚”哲学	(557)
东方社会的困境	(559)
文明古国的历史包袱	(561)
探讨儒家思想中的有利因素	(563)
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	(565)
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 日、韩、台、港大趋势系列	(567)
有责任对日本提出批评	(587)
广岛原爆纪念会的意义	(589)

遗臣怀旧情绪难以教人忍受·····	(591)
让更多日本人知道史实·····	(595)
日本的美,像往事一般凄迷·····	(597)
香港人在语言上的困境·····	(600)

闲 思 集

隔着一层雾的欣慰·····	(602)
自我反省·····	(604)
时间因素·····	(605)
懒汉推论法·····	(606)
蝙蝠人·····	(608)
地方戏剧有看头·····	(609)
惧怕外国人·····	(610)
横的多点目标·····	(611)
江山与爱情·····	(613)
寂寞有时是成功的机缘·····	(615)
向往乡村生活·····	(616)
傲骨·····	(618)
长叹是抒情方式·····	(619)
生活哲理·····	(620)
开朗·····	(621)
旅行·····	(623)
生活稍息站·····	(625)
可悲的人物·····	(627)
包装精美不是浪费·····	(629)
理论·····	(630)
赏花·····	(631)
时代苦闷·····	(632)

粉红眼镜	(633)
撒娇哲学	(634)
更愉快	(636)
看海去	(637)
插花	(638)
盆栽	(639)
家乡的水	(641)
多情	(642)
改嫁	(643)
择友	(645)
认同标帜	(647)
思想毒害	(648)
生活充满记忆	(649)
滋润	(650)
抒情流行曲	(651)
代价	(653)
人生境界	(654)
指点	(655)
伤感	(656)
揶揄者	(657)
渔翁	(658)
朴素的愿望	(659)
比赛	(660)
共赏自然	(661)
求变	(663)
多读报章	(665)
三多	(667)

喝茶·····	(669)
归隐大自然·····	(671)
游园·····	(673)
聚会·····	(674)
封笔·····	(675)
精神家园毁不得·····	(677)
“此情可待成追忆”·····	(679)
河水日自流·····	(681)
勇往直前·····	(683)
短视·····	(685)
现实照片·····	(687)
深思的水滴·····	(688)
诗般的生活·····	(690)
两只鸬鹚·····	(692)
鹭江苍茫厦大情·····	(693)
大隐应可隐于鼓浪屿·····	(695)
武夷山水涤尽我尘埃·····	(698)
初步印象·····	(700)
汉城市内·····	(702)
板门店去来·····	(704)
宁静的庆州的夜·····	(706)
上浦项下蔚山·····	(708)
“新村运动”·····	(710)
告别汉城·····	(712)

喻 世 集

野史传说 堪足玩味·····	(714)
文化素质与地方戏剧·····	(717)

书法不是消闲艺术·····	(719)
说话亲切 态度悠闲·····	(721)
客居他乡作家的悲哀·····	(723)
构思奇特的“不夜天”·····	(725)
美术能丰富人生·····	(727)
宗乡会馆的新时代使命·····	(729)
是宗乡会馆行动的时候了·····	(731)
杂志副刊相辅相成·····	(733)
兴建有文化气息的商店街·····	(735)
增添传统节日的热闹气氛·····	(737)
出版社区图册意义重大·····	(739)
报章评论的社会贡献·····	(741)
艺术节获得热烈反应·····	(743)
会馆当前的要务 尽速培训文娱人才·····	(745)
新加坡河发展计划的意义·····	(747)
设法使旅客多逗留几天·····	(749)
外人评语 良药苦口·····	(751)
应该为朋友的成就欢呼·····	(753)
大学毕业生与职业·····	(755)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必须踏实·····	(757)
让学生了解国家利益·····	(759)
培养人民力争上游的精神·····	(761)
防止人才外流更加重要·····	(763)
官民同心协力解决问题·····	(766)
真正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768)
历史是人类前进的灯塔·····	(770)
改革教育一个新颖的构想·····	(772)

反 思 集

日本反核示威说明什么？·····	(774)
日本人的错误史观·····	(777)
日本篡改史实的前因与后果·····	(779)
无知之错与有意之过·····	(781)
樱花盛开前夕看日皇·····	(783)
日本缺乏改过的诚意·····	(785)
年轻一代日本人应知道血腥事实·····	(787)
应该更正确地对待亚洲史·····	(789)
日本仍在歪曲史实·····	(791)
日本应深思改史的恶果·····	(793)
加强日本与亚细安文化交流·····	(795)
日本文化人的骨气·····	(797)
中曾根失言余波未了·····	(799)
寻梦 寻根 诗人 文人·····	(801)
——风沙雁创作论	
后记·····	(812)

东方传统研讨会揭示了 问题的实质

由五学术团体联办的《东方传统与今后的新加坡》研讨会，反应之热烈有点教人感到意外。余英时教授在总结评论时说，与会者讨论问题之认真与严肃令人感动，凡与会者对此应有同感。余教授也说，移民两三代后的价值观就会有所改变，这更是一针见血的见解，值得我们深思。六主讲人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传统文化在建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他有关课题，涵盖面既深且广，有关当局也

应可从各学者的讲稿中探讨传统文化今后的去向问题。

如果我们肯定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是与东方传统及价值观有所关连，我们该关注的是，由于生活环境迥异，地理条件有别，移民所带来的传统观念，今后是会在我国逐渐消失的。传统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与大自然斗争中形成的，这种价值观会具体表现在文化上，而具有该种价值观的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与巩固该民族的既有的优良价值观，使该民族更有信心地生活与发展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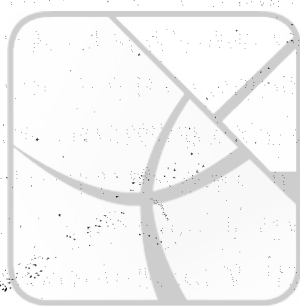
然而不同的地理条件与优越的生活环境，是会把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损磨掉的。倘若要避免这种现象产生，就只有有系统地教导该民族的后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行，而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通过语文与文化的学习来保留优良传统。

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研讨会开幕礼上说，我们应大胆移风易俗，发扬东方优良传统，扬弃落后陋习。在继承传统方面，这是非常正确的作法。环顾周遭，我们似乎发现，不良传统远远掩盖过优良传统，我们如果一任它发展下去，东方传统一定会被年轻一代所抛弃。

林徐典教授则从学习华文与民族史的角度来探讨继承传统的课题，并强调应确保华文作为第一语文这事实存在于绝大多数学校中，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如刘述先教授的讲稿中提到的，把一袋子的题目传给下一代，并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林、刘两教授的论点若综合来看，我们可以说当前我们在继续传统的工作方面，确实有所偏差。我们的母语学习似乎有实用化之毛病，而我们的儒家思想课程会不会是一袋子的题目措施呢？如果多少有这种偏差，根本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加强母语的教学，借母语学习逐步让学生浸淫在良好的文化中，并从中吸取优良传统。

新加坡开埠 100 多年了，基本上我们已进入了移民的第三代，民众传统价值观会逐渐改变，原来就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由于教

育政策的些许偏差,而致使优良传统价值观更快消失,对我国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此次研讨会已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它至少让我们有个机会探讨我们的哪怕是微小的社会弊病,并从而尽快寻求补救方法。



关于大传统的继承问题

美国著名学者雷德菲尔德在其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曾把文明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并指出大传统可影响小传统。郭振羽博士在其专著《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中，曾就我国华族的大小传统问题作过一段言简意赅式的剖析。他认为我国华族的小传统虽然是由方言群从中国本土移植过来的，却已在本地生根，并具有一定生命力，而大传统则由中国文学、哲学、历史与艺术的传授与欣赏而保留下来。提倡讲华语运动，暗含以大传统取代小传统的目的，然而华文程度若不能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则随着小传统的消失，大传统的保留也会面临危机。郭博士的剖析入木三分，足供我们深思。

简化婚丧等习俗，诚然是继承传统过程中所必须重视的一项工作。然而，从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来看，大传统的存亡问题却是更重大的课题。看看现状，我们应该可以说，当前华族的小传统虽也有日益式微的趋向，但似乎还有颇强的生命力，大传统则由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在年轻一代身上已日渐淡薄，我们若不及时纠正，大小传统会逐渐在我国消失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诚如郭博士所说的，提倡讲华语运动，会带来以大传统取代小传统的效果，这应是可喜的现象。但只有语言而缺乏程度与之相当

的文字，则大传统也就难以保留下来了。如果我们承认新加坡当前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东方传统价值观有所关连的，则保留大传统便是一项不可忽略的重大工作了。否则的话，随着华文程度的每况愈下，大传统随之消失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必然弥漫整个社会。

大传统既可影响小传统的实质，则我们与其在小传统的改革上下功夫，就不如努力维护大传统，借保留大传统来影响或甚至纠正小传统的偏差。理由是，大传统所包含的哲学、历史、科学、艺术，才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小传统往往会徒具形式且较缺乏精神实质。

从这角度来看待东方传统继承问题，我们应加强的是母语的教学，传统艺术的教导与艺术文学的传授。趁大传统还未消失之前，我们得加紧这方面的工作。倘若一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到大传统已消失到七七八八了，到时即使想挽救它，也恐怕会回春乏术的。在谈论继承东方传统时，我们应特别强调大传统的重要性，理由在此。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熊玠教授在区域英语中心举行的《文化认同、道德教育及现代儒家伦理》演讲会中，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很能振聋发聩，令人心服。第一，他说政治认同应与文化认同分开。他因此含蓄地告诉新加坡华人，要有华族的文化认同感。第二，他以自身在美国二十四年的感受，来说明懂得一种语文，不一定就懂得那种文化；而懂得那种语言与文化，不一定就是属于那种文化。即使你自以为是属于那种文化，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不会被那些你要认同的人和文化的所接受。第三，他认为有了文化认同的人，在情绪上会较稳定。第四，他认为促进华人文化认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能使其他民族觉得放心。

熊教授在美国住了廿四年，他所得出的在政治上、法律上他是美国人，但在文化上他是华人的结论，实在是震撼人心的。熊教授的结论，道出了移民在其居留国的落寞感疏离感及双重性格的特质，但也同时给我国的华人一个启示：如果我国华人不与其本族文化认同，他们在情绪上是否会较不稳定呢？

我国华人与美国华人最大的不同点是，我们是大多数民族，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民族，倘若自愿抛弃本族的传统文化，他们会不会像美国华人那样有回归感呢？我看很可能是不会的。不过这样

做就有一个恶果，那就是在抛弃传统文化后，我们得花费数十年时间，再来重建另一套新的文化及价值观，而文化传统是物质建设的精神力量，在重建文化传统期间，我们的物质建设会不会因此而停滞呢？

我们现在推行的儒家思想教育，大概用英语来教授的百分比会比华语的高出好多，圣经既能用各国文字来传播，儒家思想相信也就能通过英语来传授的。问题是，儒家思想只是华人哲学思想中较重要的一环，并不是华人传统文化的全部，而且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宗教，一个能体现儒家思想精华的人，他必须对华人的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才能做到。因此，儒家思想能藉英文来传播，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也必定能藉英文来保留的。举例来说，地方戏剧就不仅不能藉英语，甚至也很难藉华语来传播。因此若舍弃母语，我们就得面对一项挑战：在丧失除了儒家思想外的传统文化后，我们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来重建一套新传统。

我们说过，文化传统是经济建设的精神力量，在重建新传统期间，我们的经济建设一定会受到抑制的，而几十年时间，在现代社会来说，是个漫长的岁月，那经济建设所蒙受的损失，是我们所经不起的。因此，为了保留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认为即使双语政策会拖慢好多学生的学习进度，我们也还是应该继续推行下去的。

熊玠教授说美国华人有回归感，是由于不被占大多数的民族所接受，也由于受到少数民族的启示致然的。我国华人面对的问题，虽和美国华人有所不同，但为了情绪上的稳定，为了维持精神力量，我们认为保留传统文化，是应该受到支持的。

要未雨绸缪 别临渴掘井

王鼎昌部长在《80年代青年的政治觉悟》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一点引起我们的隐忧的是，90年代我国的政治前途，是否会被自由主义所淹没掉。自由主义兴起的一个基础是繁荣的经济，丰衣足食的社会条件，自由主义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国民的国家意识不浓。我国过往10年的经济成长及教育偏差，恰好促使这两个条件出现，因此我们有一批极端向往英国传统民主制度的年轻人出现。如果我国的经济继续增长不衰，我们的教育偏差没受到适当的调整，那90年代的政治，将是目前的执政党与自由主义者短兵相接的斗争，而笑傲江湖的有政治意识者，就会进一步归隐田园，过其闲云野鹤的逍遥生活，这种局面对我国的长远前途未必是好事。

牵制逆流的方法，最好是出之以正流。这正流就是在学校中教导各民族的通史及我国历史，且民族通史最好是以母语教授。只有让一个人深切地了解他的民族史，他的国家通史，他才会对这块乡土有感情，否则他会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到处飘荡。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就在学校中正确地教导历史，那10年后我们就有一批爱乡土的年轻人出现，这批年轻人就会和那时的中年自由主义分子相互牵制，牵制的结果是爱乡土的国民越来越多，终致于把自由主义分子牵制住。

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宗教或儒家思想教育，是只能培养一个人的孝敬观念，而难以培养一个人的爱国情操的。尤其是以英语来教导儒家思想，所收到的实效是会大打折扣的。宗教或儒家思想教育，只能辅助民族通史及国史的不足，而不能全然取代历史的教授。预防自由主义者出现，单单教导宗教或儒家思想，是不够的。只有让我们的国民彻底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的过去，才有办法树立起爱乡土爱国民的意识。

自由主义者既向往英国式的民主制度，他们就会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他们的理想，但环顾执政党的罗致人才政策，在野党就难以吸收到突出的人才。在野党既然在罗致人才方面输给执政党，他们能掌权的机会几乎可以说是渺茫的。自由主义者既然不能从在野党方面得到满足，那他们会不会借重外国势力来达致他们的理想呢？这是我们要提防的事。

既然可以预见 90 年代是执政党与自由主义者的搏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教育上着手防止自由主义者继续涌现？防止自由主义者涌现的方法即是以母语教导各民族通史，那我们除该在学校加强教导母语外，另一项该做的事，就是请史学家编纂一部我国通史及一部各民族通史了。凡事宜未雨绸缪，不可临渴掘井，在现在就谈 90 年代的我国政治，应该不会是杞人忧天吧？

不入虎穴 焉得虎仔

朋友认为我在《要未雨绸缪 别临渴掘井》一文中，所提及的以母语来教导民族通史，是防止自由主义者涌现的可行办法的论点，是不堪一驳的，理由是，西欧国家的国民难道不是也以母语学习其本族通史吗？那为何自由主义者却层出不穷？我不敢说我的论点全然没错，但我想说的是，东方的价值观念与西欧的全然不同，以母语教导东方民族通史，不仅能使学习者对其本族通史有个概念，而且由于学习者在学历史过程中掌握了母语，他就能通过母语继续吸收其本族文化的精华。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西方人着重改造自然，因此科技发达，东方人注重鉴赏自然，因此人文发达。由这种不同点展开出去，就出现东西方人对人生、政治、社会的看法，也大异其趣。从政治上来说，东方人并不是不重视民主，但比起西方人来，我们更重视国家。孟子虽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他还是把人民与国家相提并论的。中国通史说明，无论是陈胜、吴广的起义，洪秀全的创立太平天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都是以救国为号召，而不是以争取个人自由为目的。这种重视国家或群体的利益，而较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精神特质，正是我们的各民族学习其本族通史的原因，也正是学习了本族通史就能抑制自由主义者涌现的

原因。

学习民族通史既能抑制自由主义者涌现,那我们就没理由不去鼓励大家学习。现在值得争论的是,为何要以母语教导民族通史,若用英语来教导不是能更快地巩固多元种族之间的凝聚力吗?我的看法是,若用英语教导民族通史或儒家思想,学习者固然能吸收到一些淡化了的民族文化精华,但由于学习者无法掌握母语,他就无法阅读以母族文字书写的书籍,旷日持久,一曝十寒,他所学到的一点点文化精华就会荡然无存,这对华族子弟来说,尤为明显。

中国哲学发源很早,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家,都已完备。后世哲学家,虽有创见,也总跳不出春秋战国时代哲学家的谈论范畴。春秋战国,离我们已 2000 多年了。2000 多年来,文人学者,在吸收各派各家的哲学思想后,下笔为文,自然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寓于诗文中。唐诗如此,宋词如此,明清小说也不例外。你不学中国文化则罢,要学中国文化,就非懂中文不行。如果使用华文来学习中国通史,又从而掌握了华文,那你将来读中国文学作品,就会发觉,这些文学作品中蕴藏着的哲学思想、爱国情操,正可加强你读通史时得到的民族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就是爱乡土爱国家的渊源。

简单地说,通过英语学民族通史或哲学史,弊病在一曝十寒,在不能有能力阅读其他以母族文字书写的书籍,在不能巩固东方的传统价值观。既不能巩固东方的传统价值观,那在阅读了以英文书写的、充满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书籍后,他能不变成自由主义者吗?

笑傲江湖与挺身为国

交通兼劳工部长王鼎昌在《80年代青年政治觉悟》座谈会上宣称,我们在过去17年取得的成果,如果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兼具备高度政治意识的新加坡公民挺身为国服务,那没有原则和不诚实的人,就很可能乘机填补空缺,而以我国幅员之小,天然资源之缺乏,这些成就就会很快地一陷到底,且一去不复回。王部长因此劝勉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政治意识的年轻人,挺身而出为国服务。王部长的呼吁,可说是语重心长,值得我们三思。

平心静气地分析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新加坡人对政治冷漠,有三大因素。一是曾参与五、六十年代政治斗争的人士,目前都已步入中年,儿女成群,事业也有些成就,过往的不愉快经验,教他们宁愿笑傲江湖,也不想再惹事生非。二是五六十年代出生,而目前已迈入青少年阶段的人士,由于自他们懂事的那一天起,就已尝到经济发展的利益,因此他们向往的是舒适的生活,而不是保国卫民的理想。三是自独立以来,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也为了建设经济,理化科技科目受到重视,相形之下,文科受到忽视,尤其是历史科目的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更使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既没机会亲身参与街头斗争以吸取政治意识,又没机会攻读历史以吸取历史教训,他们会对政治冷漠,就不是偶然的事。

我国独立才 17 年,历史短暂,国家意识不太浓,但经济成就又不小,政治变化也大。这种种社会特质,是曾参与政治斗争的中年人及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年轻人都对政治冷漠的主因。如何使已对政治冷漠的中年人,重新加入议政的队伍来,如何使缺乏政治斗争的年轻人,也关心国事,确实是我们当前的两大难题。

事实既是如此,我们也只有尽力挽救,而挽救之道,我以为有两个办法行得通,一是广开言路,二是在学校中正确地教导历史。对心如止水的中年人,希望他们抛弃闲云野鹤的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容易,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鼓励他们针对过往的经验,抒发感想,或针对目前的时弊,指陈是非,不但能重新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对较年轻的一代来说,也可从他们的文章中吸取一些经验。这是广开言路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在学校中教导各民族的通史,并且最好以该民族的母语为教授媒介语,让各民族子弟彻底了解其本族历史,这对巩固国家意识大有裨益。人类的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二是从历史记载中得来的间接经验。正确地教导历史的好处,就是让没机会亲身经历过某种经验的人们,也有机会吸取那种经验。如果能正确地在学校教导历史,那十年廿年后,我们年轻的一代,就能明辨是非,关心国事,而不会为别有居心的阴谋家、国际霸权主义者所利用。

无知与不可一世

当天下的人民在闹饥荒时期，而不得不吃树根草根及观音土时，古代的那位皇帝竟然对进宫禀告灾情的大臣说，这些人民既没饭吃，为何不食肉粥？这个被人一引再引，以说明没接触民间疾苦的上层阶级的不解世情。这典故，对我来说，除了笑这皇帝的无知外，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更苛刻的批评。

我讨厌的是那么一种人，在外国呆过几年，自以为见过世面，比故乡的人多见过一些事物，就俨然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来，对故乡的一切，都要加以非议与讥笑，倒好像异乡是他的祖国，而故乡却是他的仇国一样。这种人的可恶是一如阿Q一进入城里回乡后，就大骂未庄的人是无知一样的无聊。这种人的心态有两种特征，一是对比他少见识的人摆出老子比你们见识多的傲态，二是对比他多见识的人隐瞒短处，由于要隐瞒自身的短处，他不但会隐瞒出身，还会六亲不认。因此陈世美的不认糟糠之妻，除怕驸马爷做不成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怕让小老婆知道自己的出身贫寒，有失体面。六亲不认也不单单只为个人的荣华富贵，如陈世美者之流才会做的，六亲不认有时也是暴发户怕人家知道他原来是出身贫寒的表现。因此把自己的父亲称为老头子的，算是这类人中的有良心者；更恶劣一点的是，把老父亲送进老人院，免得高朋贵友来

时，有失他的体面；最恶劣的是，在高官显要面前，竟把父亲称为老佣人。暴发户虽不学却有术，虽出身贫寒现在却腰缠万贯，自尊心的过高，自卑感的过重，心理失去平衡，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这么一副人神共怒的浅薄相。日前吴作栋部长曾因年轻的一代在观看 50 年代福利巴士公司工友的暴动景象时，不但不为工友们的遭受殴打而感动或怜恤，反而讥笑这些工友们的穿着过于朴素而震惊。吴部长对此很耿耿于怀，也算是个有心人了。其实，追究起来，这讥笑并不太严重，那只不过是他们在向这些工友们表明，我们比你们聪明多了，也时髦多了。学新君在其《认识自己的历史》一文中，曾建议让这批年轻人多学历史，这才能正确地认识我们过去的史实，这见解也是有心之士的真知灼见。

但我却没这么乐观，就算要认真地在学校教授历史，要教授的也不是这批年轻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批年轻人既比阿 Q 还阿 Q，也比陈世美还要陈世美，我看就让他们去阿 Q 去陈世美算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国大客座教授王赓武博士，两个月前曾呼吁我们多学自己的历史，真想不到，王教授果然是旁观者清，看来历史必须从小学教授起，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课题了。

大自然与儿童心理健康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王维这首咏“渭川田家”诗，呈现在诗中的唐朝农村的宁静、悠闲气氛，在今日的中国农村，相信还能寻觅得到。在新加坡，随着城市发展计划的落实，有限的农村土地，都要用来建起住宅，农村逐渐消失，悠闲的气氛，也只待成记忆了。

据《海峡时报》报导，我国目前只有 1000 名左右的菜农，耕种着 300 多公顷土地，提供市民以 25% 的蔬菜消费量。该报还访问了两家菜农，都说菜农生活艰辛，希望其子孙别步彼后尘。如此看来，我国农业的日趋式微，已成定局。这原本也没什么可感叹的，但是大都会的人们，由于少接触大自然而易形成的虐待心理，却是值得我们未雨绸缪的。

三年前东京的报章与电视都大事报导，住在东京闹市内的小学生，有一些一到乡间或郊外远足，捉到了蜻蜓，并不懂得爱护它们，而把它们碎尸万段以取乐。报章下结论说，那些儿童长期没接

触大自然，对大自然的动植物都没感情，因此成了虐待心理狂。两年前东京与大阪又出现了怪人在罐装饮品中下毒药，放在公众电话旁，结果有人在打电话时，因为口渴喝了电话旁的饮品而告毙命。这是不是由虐待心理狂发展而来的谋杀心理狂，我们不敢断定，但日本报章说的人一少接触大自然，就会不爱护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却应该是有其合理性的。

其实，东京除了街道少绿树是其缺憾外，日本政府对儿童的照顾倒是无微不至的。东京较具规模的公园，如上野公园、井之头公园、多摩动物园，都是绿树如荫，动物不少的。与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的一个郊外住宅区，我还参观过日本政府特地为居民而设的一块租耕地，收租甚廉，目的在供居民一小块土地以蒔花种菜。东京都较远离市中心住宅区的小公园，除一般供儿童玩乐的假山、翘翘板、攀登梯、溜滑板外，通常还设有一个小动物园，豢养着兔子、鸡、羊或鸭子的。

可以说，日本政府是竭尽所能为都市居民提供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在这样好的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尚且患上虐待心理狂，那像我国幅员这么小，动物园又只有那么两个，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儿童，会不会出现某种心理偏差呢？

反映民情 弹劾时弊

在华人报业研讨会上，麟记区国会议员兼国大经济系讲师欧进福博士说，华文报业从业员似乎有太多顾忌，他们依然被以往的不愉快事件的阴影笼罩着，而致不敢对时弊加以指陈。欧博士也说我国政府是个有自信、有眼光、踏实的政府，领袖们该有雅量、有信心来接受善意、中肯和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这段语重心长的谈话，既令人鼓舞，也发人深思。

今日的华文报章的一些言论，确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圆，这是特色，但这特色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渊源与客观因素。过去的愉快经验是一个原因，一些从业员的明哲保身思想也是一个原因。前一个因素会随着时日的消逝而日趋淡薄；后一个因素却牵涉到东方人的处世哲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的。中国的历史说明，历代的史学家都没有好下场：秦的焚书坑儒，清的高压与怀柔政策，“文革”的摧残知识分子，只要读华文的人，都知道谏客的不易为，都知道心存宫阙，不如浪迹江湖来得逍遥与自在。孟子的“达则兼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算是消极的人世思想，但存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已不多了；更多的是相信清静无为、寄情山水，才是人生的正道。这种逍遥乐的出世思想，是读华文的知识分子在较有言论限制的社会所必然有的现象。

要解除受华文教育者的明哲保身思想,大概有两条途径。一是确立新闻从业员的行为准则,使从业员相信他们的弹劾时弊,是受到专业法律的保障的。从业员只有在有保障的情况下,才敢畅所欲言,对行政偏差、政策的得失,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来。二是提高从业员的专业水平,使从业员有时间与机会进修。从业员必须对某一课题有深切的了解,才有可能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或富建设性的建议。否则,就只有瞎子摸象式的誉议,或沦至人云亦云的老套中去。

我国的动荡时代业已过去,现政府对我国未来 10 年的发展方针也已订下,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或许是政府需要报章反映民情、弹劾时弊的原因。欧博士的谈话,是适时的批评,但要怎样使新闻从业员有效地反映民情、指陈时弊,除了我们提出的解除心理障碍,提高从业员的专业水平外,相信还有其他必须破除的障碍。这恐怕非得有个专门负责的委员会来集思广益,是不能达致较完善的结论的。

我们很需要知识分子

钟志邦博士最近谈及新加坡只有专业人士，而缺乏知识分子，这论点颇引起一些读者的反驳。这可能牵涉到定义不够明确的问题，我基本上是同意钟博士的看法的。新加坡若不能说没有知识分子，我想至少我们可以说新加坡很缺少有理想的知识分子。

东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向来就很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是一种良好的传统。可惜的是，中国在传统上是以文章选拔人才，唐宋如此，明清尤甚，陈陈相因。所谓知识分子，到明清时代，已是五谷不分，四肢不动的读书人。加上读书范围狭小，又死抱着四书五经不放，为文作诗也模拟唐宋先秦的诗文，别说知识分子本身对社会认识浅薄，连本身的拿手好戏诗文也抒写不出心中的真实感情来。然而，在这大群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却还是讲究气节，关心民族前途的。其中的佼佼者，无论对社会、政治、经济，都还是有先进的独到的见解的。

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再也不是古代的那样孤陋寡闻，专业知识也够丰富的了，而最教人赏识的，却是他们拥有的那颗关怀民族国家的赤诚之心。

反观我们的社会，这些年来的经济成就与教育普及的结果，已为我们制造出许多专业人士，可教我们担忧的是，到底有多少专业

人士关心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呢？缺少关怀社会的专业人士，与中国古代缺乏专业知识的读书人一样，对国家民族都不会有什么积极的贡献。而且，比较起来，缺乏关怀社会的专业人士对社会国家所起的负面作用，恐怕会比缺乏专业知识的读书人更为深远。我想钟博士所说的，新加坡没有知识分子，应该是指此而言的。

科技的发达，已使人们的国家观念日益淡薄，专业人士移居外国，将是更为稀松平常的事。缺乏承担民族与国家重任感的专业人士，就更要以移民他心目中的乐乡为荣。

我们或许无法期望在现代社会中还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却得有关心社会的专业人士，或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们理想中的优雅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抛弃了理想的人，爱说知识分子充满幻想，其实一个社会还有点希望，靠的正是知识分子还有点幻想。如果人人都一如市井小民或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日日为图利而追逐目标，且一点也没幻想，那这社会就会显得干枯、乏味，一点也没朝气。我们的社会很需要有点幻想的知识分子。

把科学与文学融合

把科学与文学融合,使人们通过艺术来表达科学的美感,从而认识科学的规律,科学馆馆长陈伟兴博士的这构想值得赞扬。东方社会似乎特别喜爱神话色彩,无论是拍摄给成人还是给儿童观赏的电影、电视剧,强调神话或类乎神话的武功,数量之多教人咋舌。大众传播媒介若没能主动自我调整,多引进欧美日的科学幻想片,那文学与科学的结合,就是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了。

由于错综复杂的诸多因素,造成东方社会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科学的落后造成我们的文学作品较少接触到此领域的课题。但使情况更糟的是,荒谬绝顶的夸大武功的武打片,或甚至歪曲史实的所谓历史剧,却充斥我们的社会。这种过分渲染武功奇能,胡乱编造故事的电影或电视剧,不只不能推广科学知识,倒反而在散播落后的、迷信的思想。

我们自然不能没有仅供市民消闲的次文化,但喧宾夺主的次文化若掩盖过正统文化,那不只科学知识无法打进年轻一代的脑中,迷信与不科学的落后观念还会使得年轻人抗拒先进知识。大众传播媒介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偏差,而只一味迎合民众的兴趣。此中原因何在?是由于这类影片较普遍较便宜?还是由于决策人在主观上没有想提高民众的认识的愿望?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新旧文化相杂、东西文化汇合的地方。由于我们地小人少，历史浅短，文化根基不深厚，进步与落后的、崭新与陈腐的观念与知识，都在我们的社会并存共荣，我们要何所适从，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有能力作正确选择的，却是少数决策人，而非一般民众。

综观当前大众传播媒介在介绍新科学知识方面所犯的最大缺点是，所选择的有关科学知识的影片或文章过于单调与狭隘，而且数量不多，缺乏较具趣味性的作品。向民众灌输科学知识，若也是我们迈进先进国行列一个步骤，那大众传播媒介就应少刊载或播映神化武功的文章或电视剧，而多介绍轻松活泼的科学作品。当西方电影正朝向科幻境界发展之际，东方的电影却在胡乱神化武功、编造荒谬古怪的故事的泥淖中打滚，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科学知识的差距，怎能不越来越大呢？

陈博士说科学不应与文学隔离，这是正确的看法。立刻要求本地写作者写具科学知识的作品并不容易，但只要大众传播媒介能有计划引进科学知识，则文学与科学相融合的理想就有可能实现。

新华作家应看清困境 从重重困难中找出生路

回顾新华文学过去 70 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它所遭遇到的困难特别多,其中的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曾使新华文学沉寂到几乎窒息的地步。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前期的文学蓬勃发展局面,由于 80 年代华文水平的低落,而今也显得场面冷落了。新华文学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所要克服的困难,肯定比三年八个月的艰难困苦要重大多了。王鼎昌副总理在为“新加坡建国 30 年来华文艺书刊展”主持开幕典礼时的讲话,有几点的确是值得我们加以深思的。

两个不良现象

他在讲稿中提到海外作家给新加坡写作人的忠告,外国作家劝我们不应刻意卖弄技巧,在内容上应避免流于浮面反映生活。这两点的确是存在于我们的文坛的不良现象。只注重扭曲文字或堆积意象,而没主动地去发掘生活中蕴藏着的题材,一定会导致文学走入晦涩的死角,这点中国明代的竟陵派的惨痛经验可资我们借鉴。

与这几年来电视连续剧所反映的,我国的历史事件与现实生

活面的深广度比较起来,新华文学(尤其是散文)所触及的生活面实在太单薄了。写作人如果不能自觉地认识到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广度与作家解剖生活面的思想深度,才是作品不朽的关键所在,而只一味刻意追求文字的创新,丝毫不顾及所写的题材是不是陈年话题,那他所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成为内容空洞、徒具文学形式的文字游戏。

作家不应妄自菲薄,作家是时代的良知与记录者。作家肩负着揭露社会的不美满面的责任,也承担着指引众人朝前看的职责。在迈向优雅社会的过程中,现在的新华作家比任何时候更肩负着重任。他们可以从负面反映有害优雅社会实现的丑恶事物,他们也可以从正面反映或歌颂有利优雅社会实现的美好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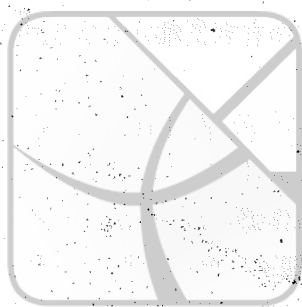
文艺批评有待提高

一个有分量的作家,应该具有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具备各个艺术领域的知识,拥有冷静剖析生活的头脑,掌握一定的文学表现技巧。作家的好作品所展现给读者的是他的整个人格、智慧、情操、艺术修养、理想。他须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他须借助文学技巧来描写刻画景物、人物与思想感情。但他不是靠扭曲文字来哗众取宠或掩饰自己作品的贫乏的内容。他是靠站在较高较先进的立场上,或者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角度上来剖析问题或反映问题,使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激情与智慧。

王副总理也提到新华文学中的文艺批评是文学中最弱一环的问题,这是事实,但却是个不容易在短期内纠正过来的现象。有深度的文艺批评家固然不易找到,但作家能不能接受批评却也是健康的文艺批评能否出现的一个因素。

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在,新华作家真的应

该放眼世界文坛，才有可能写出超越前辈的水平作品来。新华文学历史非常短浅，掷地有声、且能在各先进国的文坛上占一席地位的作品尚待产生。我们不可自来，也无须颓丧，但得看清困境，在千万重困难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华语夹外语不是好现象

在东京的街头漫步，偶尔会遇到如假包换的日本青年向你问路，而这一类青年的日语发音奇特，文法结构古怪，别说稍懂日语的外国人无法了解，连道道地地的东京出生的日本人也不知其所云。这些青年都是南美洲的日裔富家子弟，每年大批来东京学纯正日语，以满足寻根的渴望。事情的来源是这样的：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由于生活艰难，许多日本人移民南美洲。百多年来，移民及其后代已在南美洲的好些国家定居下来，可日本侨民之间却依然以日语沟通，只是岁月久远，而日侨又没在正式日语学校上课，致使日语流为一种方言，又夹杂着南美洲人的土语，以致日语与土语夹杂不清，连文法也被破坏无遗。因而这些日侨所说的日语，就连道地日本人也无法了解了。

南美洲日侨所说的口语，连日本人都无法理解，而其结果是家境较富裕的日侨得回东京重新学习纯正日语，这至少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即使是某一民族的母语，只要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中是处于弱势语言之列，该母语就会先夹杂着特定社会的强势语言的词汇；假以时日，该母语就会出现许多该地的语言特色，而后连基本文法也遭受破坏。到其时，该特定社会的特定民族所说的母语，就会与原民族的母语截然不同，而特定社会的特定民族所说的千奇百怪

的母语，由于失去与母体语言的沟通作用，就会变为海外畸型孤儿。南美洲日侨的今日境遇，岂不足够我们引以为戒？

新加坡人口虽然以华族占大多数，但华族基本上可分为受华文与受英文教育两大类，再细分则又有福建、广东、客家等等方言群。随着教育政策的改变，英语早已成为这小岛的强势语言，华语在四面受困的情况下，已出现用词捉襟见肘的窘态。较年轻一代讲华语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严格地说来，并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理由是，任何语言都可以吸收外来语，但吸收后要能融化为该语言的一部分，而不是硬生生夹在该语言中。日语由于有类似拼音文字的片假名，可以无穷无尽地吸收外来语，因而日语中虽然夹有葡、德、英等等外来语，可是一经片假名的日化之后，就自然成为纯正日语了。华语中的“杯葛”、“逻辑”以至“做秀”等等词汇也是汉化的外来语，这都可以被我们接受。然而，如果在华语中硬生生地塞进英语、方言或马来语，却不是正常与健康的现象。我们若一不正视此种不良现象，二又怂恿大家多讲此类具有“地方特色”的华语，那假以时日，新加坡的华语的成为“海外畸型孤儿”，是一点也不教人惊讶的。

语言的演变是无声无息的，为时甚长的，但一旦越出轨道，就积重难返，要纠正的话，就费时费力了。际此华文书写能力日降的时刻，华语生夹外语对华语的破坏性就更巨大。原因是，讲不纯正华语的人，根本就没机会通过书写正确的华文来纠正他自己所说的不纯正的华语。

肩负传递文化的责任

正由于华文的社会功能不能与英文相提并论，就使得华语在华社中的重要性相对地提高起来。换句话说，华语不仅仅是华人之

间沟通感情的工具，它也肩负着传递文化与优良传统之责任。华语中若硬生生夹进外语，而不是巧妙融入“汉化”的外语，那当我们的华语“脱颖而出”成为“独树一帜”的“海外畸型孤儿”之时，也就是我们与“母体”失去沟通来往功能之日。

语言学家研究过，一个人只有在大量掌握特定语言的大约六万个词组之后，他才有能力用该语言做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华文是华族子弟的母语，也是华人继承华族文化所必须掌握的工具，我们不敢期望每个人都能有效地用华文来做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但训练少数有语言天分的华族子弟能用华文作高层次的抽象思考活动，却是创造文化所必须做好的工作。由此推论开去，我们就有必要要求一般市民讲纯正的华语。因为一般市民若都说不纯正华语，久而久之，势必影响到华文的纯正度，从而也就影响了要用华文作高层思维活动的人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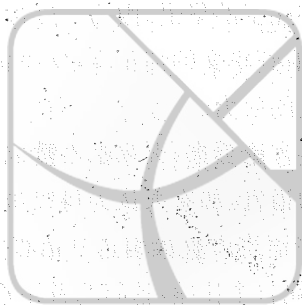
由近来的一些言论看来，大家都不赞成熔炉式的拉杂文化。但为何独对拉杂的语言，却有人认为可以接受呢？我看这有二层原因：其一是，在讲华语当中直接引进外语很方便，这是人类惰性的一种表现，若准许我打个比喻，这行为并不逊于随手丢弃垃圾。其二是，不少人以能在华语中穿插一两个英文词汇为荣，这是表现欲在作祟的结果。

语言文字演变规律之一是约定俗成，不过，在新加坡语言特别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却不可一任语言随意约定俗成。对弱势语言华语，我们更非时时加以注意它的演变不可。防微杜渐，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从低层次来看，我们的华语的污化，日久会造成我们的华语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华语失去沟通的功能的后果。从高层次来看，由于民众的华语词汇非常贫乏，有高层次思维能力的人，会苦于民众的词汇贫乏，而出现缺少供他们思索问题的语言素

材。一旦这种局面形成,我们的后代就会说一种中国人听不懂的华语,而那时的北京,就有可能出现海外华人在那儿学习纯正华语的闹剧。

微醺时看银座的夜景最富诗意,可要是不幸遇上来自南美洲的日侨青年,在他的再三问路之下,你仅有的那么一点醉意,就会被他的千奇百怪的日语惊醒,这时再看看周遭,霓虹灯竟似夜的蛊惑的眼神那么古怪,在惊出一身冷汗之余,一切诗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希望若干年后,或甚至天长地久的永远,华人不会在北京有这样的“惊遇”。



讲华语运动朝向崇高目标迈进

讲华语风气，正从小贩中心与餐馆朝向华族高级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普及。这样的做法可收到的预期效果是，华语肯定不会只局限在中下阶层人士的交谈言语中。而且，从本报一系列的特写报道看来，一些高级行政人员从学习华语过程中所得到的乐趣或好处，已不仅仅是能用华语与别人沟通这么粗浅，而是达到鉴赏文物、欣赏华乐、阅读书报的情趣这么高层境界了。

这两种新趋向都是教人鼓舞的，也应该是讲华语运动的最高与最终目标。讲华语是为消除不同方言群之间的隔阂与可能存在的误解，这应该是此运动的消极目标；通过讲华语学华文而认识到本族文化的优秀面，并从而兴起自豪感，这才应该是此运动的最崇高目标。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今年的讲华语运动开幕时，就特别强调华人必须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感到自尊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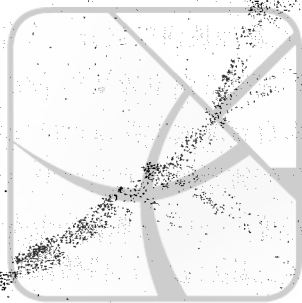
我们一向来似乎很注重学习每一种东西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并常常以此做为劝勉民众学习某一种东西的动机，这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不过，在对待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上，我们若也一味只强调实际的利益，而忽略了语言文化本身对一个民族的性格与精神方面所能起着的无形的积极作用，那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十分正确的做法。

商业公司注册局局长谢雪华女士亲自为该局高级及普通级人员开办华语课程,并亲自授课;当局公开鼓励高级人员与属下讲华语,这些都是扩大华语的社会功能的有效的、具体的做法。经过殖民地统治的国家,往往会产生本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社会地位特低,而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文字喧宾夺主地凌驾于其他民族语文之上的不正常局面。经过西班牙 400 多年与美国 98 年统治的菲律宾,英文虽然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通语文,但泰加洛语却沦落为低层人士的语言。虽然依然有人使用泰加洛文进行文学创作,但使用此语文的人数既然为数不多,有关的作家就难免有知音何处寻之叹。且菲律宾国内又有股要求加入美国第 51 个联邦的运动,这或许足供以外语作为主要行政语文、而本民族却又逐渐丧失自己的语言文化的国家作为借鉴。从这角度来探讨问题,在经过 11 年的讲华语运动后的今天,我们强调华人必须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感到自尊和自豪,我们鼓励高级行政人员讲华语,不正是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的明智作法吗?

我经常有这么一个感觉,在五六十年代的岁月里,我们虽然比现在穷困多了,但我依稀记得,那些年代的空气里,似乎较有情趣,而那些年代的情趣,主要是来自一些与本族语言文字息息相关的文化气息。是一首《绿岛小夜曲》飘在午夜街灯昏黄的小巷也好,是一出地方戏剧的戏目演在万人空巷的街边也好,是电台飘自一间陋屋的南管的哀怨曲也好,是一首来自椰林深处的洞箫曲也行;这一切的一切,都我们的生活滋润了几许的情趣。这 20 多年来的经济成就,与华文程度的相对低落,使我们在有丰厚的物质生活享受之余,感到嗒然若失。我们生活中的空气里,似乎很缺乏润湿的空气,具体地说,那就是文化气息。

而高素质的国民,是国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谓高素质的国民,不单单指有现代化的、实用性知识的人们,而且还包括对高层

次文化的鉴赏能力。本报的特写报道显示,受正统英文教育的高级行政人员,有少数人已能通过鉴赏高层次文化,诸如文物鉴赏、华乐欣赏、阅读古典文学来激发学习华语的兴趣。这现象无疑是教人鼓舞的,如果我们的讲华语运动能激发更多有社会地位的精英分子,通过对母语的掌握,认识到本族文化的优秀面,并从而培养起优雅的嗜好与情趣来,那对优雅社会的实现就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了。讲华语运动的目标与层次已提高到高级行政人员与鉴赏文化的高度来,这是一种突破,教人对本族文化充满希望的突破。



春到河畔 芳踪何处

“春到河畔迎新年”今晚 7 时 30 分在吴总理主持亮灯仪式后，这节日庆典即一连九天在新加坡河畔展开。今年的“河畔迎春”在规模上比往年大，在文化气息方面也较往年浓郁。来自黄河发祥地之一的山西省歌舞团，来自台北大专学院的学生艺术团，加上晋江会馆舞蹈团、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组成的腰鼓舞队，都将在庆典上表演。展现在河畔三座桥梁上的历史或传说中人物塑像的装饰，不只带来节日欢欣的气氛，也述说着一段段传统故事。本地的地方剧社平社与东安会馆也将演出戏目以助兴。山西小吃文化村所呈献的 17 种著名小吃，必会令人大快朵颐。

这已是第五次了，主办机构年年为庆祝这传统节日而花费了许多精神与金钱。主办机构煞费苦心筹备这些庆典节目，目的除了使这节日有更浓郁的欢乐气氛外，自然也希望华族子弟能从中认识本族文化的精华与实质精神所在，这后一点恐怕是更为重要的。否则的话，单只庆祝属于小传统范畴的节日，而不了解属于大传统范畴的文化、艺术、历史，新加坡的华族子弟慢慢就会沦为一批无根的“变种”的畸型人物。

我曾和朋友们闲谈，有人认为文字与文化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证据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并没有文字，然而传统文化却保存得

非常完善。我想，这样的论调或看法，是异常粗浅的。任何没有文字的民族，都不可能是文化与科技都先进的民族，爱斯基摩人如此，没有文字的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更进一步说，如果文字与文化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又何须千辛万苦为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呢？我的看法是：文字不只与文化息息相关，而且文字是促进一个民族前进的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有了文字的民族，并不一定会先进，这牵涉到该民族的文化特质、社会制度结构、地理条件、民族性格等等因素，也牵涉到该民族能否吸收先进国的文明与科技。不过，尽管这些因素会妨碍一个民族的进步，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进步先决条件却是拥有文字。没有了文字，就等于没有了一切。

日本东洋大学教授今富正己曾对我说，最落后的地区往往保存了最多的古老传统。他是针对东南亚华人保留着不少中国人已不再保留的华族传统而说出这句话的。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他寄宿的本地一家旅馆内的事。他说话时不带褒贬的神情，使我足足哀伤了好几天。我从当时一直到现在还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海外的华人，不分是非皂白保留一些华族传统，却把最宝贵的文字给丢了，而又自我陶醉地说文字与文化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的话，那是多么沉痛的悲哀！

我每年到“河畔迎春”庆典上去逛逛时，或者在百货公司购买年货时，我总会遇到一些的确保留着许多你我都保留的传统的“峇峇”与“娘惹”，他们的庆祝春节的虔诚程度，我敢向天发誓，比你我都忠实呢。然而，从他们身上，我总发现有一种丧失了本族文字后的虚妄。所幸他们掌握了另外一种非民族的文字，因而也还能蹒跚着前进。

节日如果沦为只为民众多制造一个吃喝玩乐的消闲日子，那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日本自明治时代起已不再庆祝农历新年，

而改为庆祝公历新年。庆祝新年的日期是改了，精神实质却保持着，因此日本人庆祝新年还是郑而重之的。我暂居日本期间，每年12月下旬，夜晚从我家窗口往下望我所任职的机构的那对司机夫妇，埋头在灯下调制年糕的情景，我心中就油然会泛起一股来自文化气息的温暖。日本人若没保留着本身的文字与文化，那即使到今天还在庆祝农历新年，又有何实际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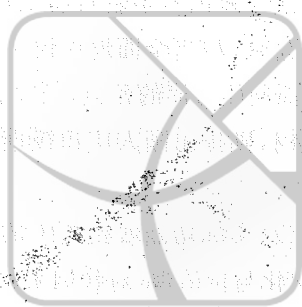
只限于平冢与仙台才庆祝的七夕庆典，不用说是富有文化气息的，为排除夏季盛暑夜间在日本全国各个角落举行的土风舞“盆踊”，就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而不纯然是节日的庆祝。凡游过日本与美国的人，相信都会有这么一种情怀：日本远较美国教人难以忘怀。这不单单因为日本国土狭小，万美集中，更因为日本文化气息特别浓郁。

我这半生有两段生活最难以忘怀，一是云南园的四年寄读生涯，二是东京的五年暂居经验。前者是品味中华文化精髓的切实感受期，后者是领略东洋情调的凄清经验期，这两段生涯都教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此后我的远游或观光，都是由此两种文化延伸出去的触角的品味。因此横滨的新年气氛对我来说很空泛；温哥华的唐人街的华人色彩，看来很落寞；华盛顿唐人街华人色彩已不易觅到；纽约唐人街的华人色彩陈旧而暗淡；洛杉矶唐人街华人色彩平淡而寡味；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色彩，似乎又过于喧闹嘈杂了。

那天我独自到河水悠悠的新加坡河畔漫步，春的气息的确已在那儿蔓延开去了。我边走边看周围的装饰与即将上演歌舞戏剧的舞台，我为主办当局的煞费心机而感动。但与此同时，我也为我们引进这么多外国节目而伤感。借鉴是进步的过程，我只愿华族子弟在认识本族文化的精深博大后，能从中汲取养分，创造出既具民族色彩，又具本地风情的文化来。美国、纽西兰、澳洲与加拿大，若

都曾经历过汲取英国文化才繁殖出本身的文化的过程，那我们的华族子弟也应经过此过程。在河畔漫步时，我的的确确感受到春的气息洋溢在各个角落，但春的芳踪在何处，我寻寻觅觅，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始终无法看到春的真面目，它似乎只是若隐若现在我眼前晃动、晃动。我要捕捉到它具体的影像，看来还须好长一段时日。



做好抽绎合时价值观工作

各报章主要负责人与海内外学者日前聚集报业中心，与参与研讨会的各方代表及公众，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新加坡报章在推广亚洲文化与价值观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新闻与艺术部代部长杨荣文准将在致开幕词时，则提出国人应积极推广亚洲文化和价值观的看法。

无论是从文化建设、实际功能或民族感情其中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提倡亚洲文化与价值观，对我们来说，都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选择。文化建设不能凭空而来，而我们的三大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与此相反，新加坡本土的可供我们继承的土生文化又并不丰厚；权衡利害得失后，鼓励各民族继承并发扬本族文化，便是创造新加坡特色文化的明智选择了。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就像东方文化一样，有其优秀面与腐朽面。但环顾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的年轻一代受到西方文化不良面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方面，我们的成绩乏善可陈。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只有走继承亚洲文化、以抗拒西方文化不良影响的道路。

郭振羽博士说：“大部分新加坡人对本身的种族文化和传统具有深厚感情，因此，才会提倡追求亚洲价值观。”这是事实，不过，感

情并不可作为判断保留一种文化或价值观的唯一标准。

在取舍亚洲价值观时,现实需求与社会风尚、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否则,我们会陷入老学究的哀叹人心不古的老调中去。

各语言报章在推广亚洲文化与价值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力之大,大家都可感觉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亚洲文化与价值观起源于农业社会,历史久远,好多价值观恐已不适合现代社会了。华文报集团总经理黄锦西先生在其文章中就指出,亚洲传统价值观,与现实充满矛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保留传统价值观与保留传统节日截然不同,前者是须以之作为国人日日生活遵循的是非标准、价值取向的尺度的;而后者则多少带点调剂生活的游戏意味。如果我们不能挑出真正适用于现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那报章无论如何努力推广,都将只是国人戏谑的空洞名词而已。

从任何历史久远的宗教都有一些历久弥新的教义的特点来推断,我们不能否定亚洲文化必有千古颠扑不破的价值观存在。怎样把这些万古常新的价值观抽绎出来,并配合现社会的进展而赋以它新生命,看来是学者专家所必须先予以探讨的一个艰难课题。

具体而有形的华族礼俗手册须经过一番整理删节,才可使华人有所遵循;亚洲价值观这无形的意识思想,也必然得经过一番淘汰筛选,才有可能纳入国人的行为准则的范畴。否则的话,以华人来说,老庄思想会成为事业失败者的精神慰藉所;儒家思想则会成为独善其身者的理论根据,其他民族的价值观也不例外。如此一来,所谓推广价值观的工作,将只是一种徒具形式的运动。因此,我认为抽绎万古常新的真理的工作,首先就得做好才行。

建立优雅社会至为重要

只要客观地加以剖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有不少民众是缺乏自律精神的。严正的条规，与各种如火如荼的运动，使我们的社会面貌变得比以前美好，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我们的一些陋习消除了。赏罚分明，如果曾是我们移风易俗的手段，自律精神，则是我们创造优雅社会的必备因素。自律精神不只是维持公共秩序的要素，它也是维持正义、发扬友爱的必备条件。一个缺乏自律精神的社会，就不是高度成熟的社会，自然也就优雅不起来。

文化更是构成优雅社会的重要一环，在极端物质主义者看来，文化并无实用价值。事实是，一个缺乏文化气息的社会，无论物质生活多丰富，它终究是个不健全、不优雅的社会。只有物质成就而缺乏文化气息的社会里的民众，是粗俗的。没优雅的气质，一举一动都充满暴发户的特点。

从人类发展的观点来看，文化是促使人类进一步脱离动物阶段，而迈向真善美的境界的要素。从纯功利观点来看，文化也是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越是先进的国家，它的文化也越是精致的；反过来，精致的文化又会把人们带进更精密的思维中去。不管你怎样赞扬当今世界的某些角落的部落文化的豪迈与粗旷，这些部落的人民并无法创造精密的物质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由于我们不能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而我们所继承的东方文化在本质上却又带着相当浓厚的农村色彩，这就显得我们在继承与发扬、在接受与创造文化方面，更非得下点功夫与心思不行了。扩大地来看，反殖反黄争取独立若是五六十年代民众建国热忱的来源，那在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 80 年代，我们显然需要有另一套理想来促使民众力争上游，努力向前，优雅社会应该是个有力的精神号召。

有人担忧优雅社会与拼搏精神会格格不入，这其实是误解了优雅社会的定义。优雅并不是悠闲，更不是懒散，而是有人情、有温情、有文化教养。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其国民一旦陷入懒散，国势尚且会衰微，更何况没天然资源如新加坡者？拼搏应该是我们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精神，优雅是指在工余、业余的生活方式、日常的待人处世态度及哲学。有人说日本人的生活并不太优雅，我们以为日本处境困难，国民勤劳才是求存求发展的秘诀，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并没窒息他们对艺术的执着，而且日本人的高度自律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

由一切恶习都须靠惩罚来消除到自律精神的提倡，由物质建设到文化创造，这是建国的必然过程，也是我们继续向前迈进的必要步骤，因此，建立一个优雅社会，是项重要的工作。

优雅社会须艺术人才支撑

要建立一个卓越社会,是比取得高速增长更为艰难的。尽管雄厚的经济基础与高度的物质建设是卓越社会的基石,卓越社会仍须大批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的支撑,它才有可能出现优雅的气氛,并在精神生活方面给人民提供丰富的养料。

环顾当前我国的艺术状况,我们可以说已比20年前蓬勃多了,无论舞蹈、美术、音乐、戏剧,都有逐渐走向专业化的倾向。艺术界人士的感慨是,喜爱艺术的队伍还不够壮大,因此在推广任何形式的艺术时,都难免要遇到支持者与喜爱者不够多的难题。

我们的民众是需要与喜爱艺术的,这由新广华语连续剧的深受观众欢迎可得到佐证。新广的拍摄技巧,与真实地反映本地生活的作风,应是连续剧风靡观众的原因。电视剧在这科学昌明时代是不是会比其他艺术形式,甚至电影更容易讨好观众,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该注意的或许是,本地电视连续剧在反映我国历史面貌或当前生活方面,有其独到与深入之处。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新广在处理一些历史事件时所持的观点,我们却得赞扬它敢于触及一些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敏感的史实。追溯历史与紧扣当前生活现实,是连续剧成功的主因,这两个特点在其他艺术形式,甚至文艺作品中,都相当缺乏。

在赞扬新广连续剧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提高民众的鉴赏水平问题。在任何自由体制的社会里,都有较低层次艺术与较高层次艺术之分。如果在市面上可看到的,把传统华乐流行曲化的录音带是媚俗的做法,我们就不该鼓励一切艺术向电视剧看齐。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舞蹈、音乐、戏剧等等艺术,都应该重视反映本地生活现实的重要性。虽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致使其音乐近一、二十年来进展甚慢,但中国音乐家创作的一些富民族色彩的乐曲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海韵》、《黄鹤的故事》等等,都深受国内外人士欢迎。这说明外来的艺术形式并非不可引进,但却须用来反映本地现实这道理。

改进内容如果是一切艺术争取知音的其中一个要素,是各艺术团体可自我更新与改革的工作,那缺乏经费以推广艺术却不是它们已力所能解决的问题了。社会发展部近年来已关注到此课题,并尽力给予艺术团体各种方便与资助。只是单靠政府部门的支持,那力量是很不够的。大商家、大文化机构、大企业家,都应该大力拨款支持艺术活动。有财力与地位的文化机构或可考虑设各种文化奖章,以金钱与荣誉奖励各个领域的杰出艺术工作者,这样做将能激励更多搞艺术的人默默埋头工作。

在政府所成立的6个咨询理事会中,文化与艺术咨理会便是研究与探讨艺术发展课题的。建设卓越优雅社会,那不单单是政府的理想,也是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在新广为庆祝启播25周年而特摄的“新广群星耀狮城”这节目中,王鼎昌副总理再次强调了培养艺术人才与建立卓越社会的关连性。为促进艺术的发展,我们实有必要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激励艺术工作者更努力创作,因为优雅社会与艺术人才及艺术鉴赏者是分不开的。

文化特色须长期营造

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日前有关创造新加坡文化的谈话,有两点值得我们探讨。一是追溯我们的文化根源,研究我们的历史背景并整理我们的文物资料;二是有关新加坡文化的特质问题。

创造文化不同于建设物质,文化创造须长期坚持才能见出成绩。文化特质就更是一种承先启后,长期酝酿的结果。文化须先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创新,美国在科技方面虽然有显著成就,且在许多领域领先世界各国,但美国文学独立 200 年间还始终处在英国文学的阴影下,只有在出现马克·吐温后,美国文学才走上独具风格的道路。如果这能给我们什么启示,那便是在当前阶段,我们应重视的是研究历史,整理文献。

新加坡的先驱开拓者的言行事迹以及蕴藏在这些事物背后的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应该在我们的文化创造上有所表现。歌颂与表扬先驱者的吃苦耐劳好品格以及其后新加坡人民争取独立、埋头建国的热忱,应该可以列为我们迄今为止的文化的特质。这样的主题,在新华文学作品里以及近年来的新广华语电视连续剧中,都或多或少有所触及。我们或许可以在鼓励学者进一步发掘与整理史料的同时,也激励艺术工作者通过各种艺术媒介,更深入

与全面地反映这种具积极意义的主题。

拓荒精神与建国热忱,可以也应该是我们的一切艺术作品的基本主题。在这样的优良传统下,再加入鲜明的地方色彩、时代基调,应该是创造新加坡独特文化的可行途径。如果文化的独特性须经长期自然演变来达致,那文化中蕴藏优良传统却可有系统地继承下来,并以它作为该文化的特质之一。

庄部长针对外国一项显示我国人民生活最为枯燥的调查的容忍与自省态度,也很教人注目。不管外国的该项调查有多大偏差,我们在艺术建设方面尚待进一步努力,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承认这一点,并鼓励民间团体努力推广艺术,培养广大的艺术喜爱者,既是提高民主素质的做法,也是为艺术创作提供有利条件的办法。

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各种不利于艺术发展的客观因素,艺术团体若没在主观上积极努力推动艺术,艺术就更难在民众中普及。全国 11 华语话剧团在诸多困难下再接再厉举办第二届戏剧营,那股落力推动艺术的干劲,是教人激赏的。如果有更多艺术团体也这样做,那不只艺术能更快地普及民间,新加坡的文化特质也可逐渐显现出来。

华文书市场尚有发展余地

一年一度的“世界华文书展”的摆设与气氛，很使人联想起东京八重洲的那间规模奇大的书店来。在日本旅居不太感寂寞，并不全因有四季变化、风景宜人；周末下午可到处逛书店，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银座有家丸善书店，楼下卖体育用品；二楼记得是摆卖日文书的，还有间小型咖啡座可供顾客喝茶吃点心小憩；三楼就全是外文书了，以英文书为主，也有法文、德文的。走进这书店，有时竟会忘记自己身在日本。

神保町的特点是有一两条街道的店铺全是书店，而且旧书店特别多，还有三两家专卖中文书的。但三省堂书店则是贩卖日文书的，规模之大在新加坡也属少见。

八重洲书店应该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书屋，整层楼面摆满书架，墙壁四周也筑满书架，书本之多与排列之整齐，真教人有如身入书海，目不暇给，往往流连忘返。

日本的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国内国外发生的事件，任何人都可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或报章立即获得有关事件的详情与背景。而且日本教育普及，各种各样的课题都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任何国内外的突发重大事件，报章、电视或学术机构都要举办座谈会

讨论该课题，在人选方面绝对没问题。生活在讯息这么发达的国家，人们即使不阅读书籍，也能对天下事有足够的认识的。但日本的读书风气很高，这我看应该与书店规模够大、书本齐全有关。

我们的华文书店的规模大都不够大，书本也不齐全。若想钻研一些较专门的课题，在收集资料方面就非常费时费事。“世界华文书展”的吸引人，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规模够大，书本较齐全。

参观书展的人数是众多的，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我今年竟然没遇到故雨知交，这自然是可喜可贺的事。买华文书的人若都是中年或以上的读者，那华文书前景就未卜先知。经营华文书的商家只好未雨绸缪，早作好转业准备。推广华文书显然不能只靠一年一度的书展，书展只是推广读书风气中的一个办法。不过，书展能吸引千千万万顾客，书商对前景应有信心。

资本不雄厚的小商家，我们难以期望他们扩大店面。不过，建屋局的租金优待在认真执行的同时，也应监督书店，别让它们挂书店名而只卖文具与课本参考书。

很难预测当今的学生日做夜做各科的课外参考书作业，日后会有怎样的不良后果。但只读课本不看课外书，学习生活很单调，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的组屋里的书店若又只卖课本参考书而不卖课外书，那读书风气就更难于培养起来，下一代人的生活也会更为刻板单调。

中国的中华、商务书店应可考虑携手合作，设间较具规模，书本较齐全的书店。台湾的书商也可这么做。在华文程度低落的当前，开拓华文书市场并不容易。书展年年获得热烈的反响，至少说明华文书市场尚有可开拓的余地。

真希望周末或星期天有个地方可翻阅好书，这不应是个奢望。没有人愿意看到书商无利可牟，只是书展的成功似乎意味着规模大、书本齐的书局大有前途，资本较雄厚的书商应可考虑研究这课题。

养成阅读的习惯

新加坡全国书籍发展理事会，将在8月到9月间举行一个全国读书月，主题是“与孩子一同阅读”。教育部原本已组织了一些活动，如，图书馆周以促进阅读风气。为了响应这读书月，教育部会鼓励各学校安排活动以配合。在这知识日新月异的年代，鼓励国人，尤其是学生，养成阅读习惯，是很必要的。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不阅读书报，他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知识一落后，不仅对时事的演进不了解，长此以往，他还与这社会脱节，而只生活在过往的世界里。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没阅读习惯，那这个国家就会日渐落后，这不是危言耸听。日本人就因为爱书如命，才会在经济与科技上，攀上今天的成就顶峰。

举办诸如读书月这样的活动，固然能鼓起读书风气，但家长若能经常鼓励子女阅读，相信对培养阅读风气，更有促进作用。文化部长丹那巴南说得对，家长有空闲时，如能经常讲故事给孩子们听，是很能刺激起孩子们的阅读兴趣的。孩子们都有好奇心，要听故事，要知道更多生活以外的事物，或与生活有关的有趣事物，但碍于语文能力，往往不能彻底了解故事书中的全部内容。如果家长不从旁协助他们了解书中内容，他们就会因阅读时遇到困难无法解决而索然寡味，而渐渐失去阅读的兴趣。家长若能协助孩子们去

了解书中内容,他们就会继续阅读故事书的。

我们的社会,电视机的普及率很高,电视比书本强的地方是,说明事物以图像为主,以语言为辅,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但缺点是,观看一个节目,就只能从该节目得到好处,语文阅读能力既无法提高,就不能帮助孩子们去阅读水准更高的书本。而且,因为电视节目易于接受,不用思索就能理解其内容,这对孩子们的思考能力不但起不了加强作用,长久地观赏电视节目,还会养成懒于读书的坏习惯,因此要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家长最好要限制孩子观看电视节目。

我国由于要攀上经济高峰,采取相当严格的教育制度,学生的功课都很繁重,要拨出时间来阅读课外书也颇费周章的。这就更要学校当局的鼓励,才能使学生养成阅读习惯。教育学院最近在给学校理事会的报告书中曾建议,把“图书节”编入学校课程表中去,这是个很有新意的建议。但学校在实施这建议时,应该采取比一般上课轻松的态度,让学生觉得上“图书节”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无端地多出一节课来。

培养读书风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因此对学生来说,读书习惯的养成,就更为重要。只有从小养成阅读习惯,长大后,才能有喜好阅读的性格。但是,阅读习惯的养成,除了举办读书月、图书馆周外,学校家庭及社会各方面的有效配合,都是很重要的。

文化建设的信心问题

文化建设须长时间来进行，它不像经济建设那么立竿见影与有迹可寻，这点任谁都不会否认。当前有心人士对文化建设缺乏充足的信心，并非操之过急的心理在作祟，而是对日趋式微的本民族文化感到无可奈何。对本民族文化的前景缺乏信心，就有可能对外来的移植文化产生排斥心理。我们若没法消除此二大障碍，长远来说，对我国的文化建设的危害性就不小。

世界上不乏由移民后裔建立起来的国家，例如美、澳、纽、阿根廷等等都是。这些国家都是在继承移民本族的文化与文字的基础上，才慢慢发展出深具地方色彩但基本上却是以母语及蕴藏于其中的价值观为主题的文学艺术。移民后裔在建设本国文化的过程中，都无法避免沿袭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无法不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深受本民族文化影响。因此，若过分强调尽早摆脱本族移民文化的影响，那是不合实际的想法。

在主观上各民族的艺术创造者都应尽力强调本地色彩，但在事实上却不能立即断绝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肉关系。有此二层认识，在建设文化过程中，我们才不会操之过急，也不会永远沦为本民族文化的附庸。

不过，我国目前的文化建设最大危机并不是上述的两大课题，

而是对本族文化的信心不够坚强的问题。本族文化在我国的日趋薄弱,除其中的一些形式因已不适合现代化社会而逐渐被淘汰外,另一原因是母语水平日渐低落而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构成威胁。前者如地方戏剧的没落,并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可挽救的,但后者却肯定是可挽回的。

直接继承本族文化的艺术形式与传统,在创造具地方色彩的本国文化工作上,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的,这已有史例可为借镜。更何况,揆诸当前的事实,我们不难发觉,通过英语我们诚然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文明,但却没能把西方的传统文化移植过来,我们所引进的好些只是西方文化的糟粕,即次文化与不良的价值观。

民众对本族的优秀文化的成长若失去信心,那较低层次的本族文化就会喧宾夺主,随着而来的是夹杂在低层次文化中的落后价值观或传统,也会升为社会道德的是非标准。到那时,西方的次文化与东方的低层次文化就会泛滥成灾,健康的文化就更难茁壮成长了。

没有人可断言,若假以时日,我们是否可能把西方的优秀文化移植过来,并发扬光大之。不过,即使答案是肯定,那也是为期长久的功业,在移植期间,我们就得靠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建设文化的骨干。因此,有关当局应积极提倡各民族的适合现代社会而又具有价值的优秀文化,而艺术工作者也应树立起对本族优秀文化的信心。只有这样做,我们的文化建设才会有突出的成绩。

唐城应可吸引旅客

艺术所创造出来的意境，一定比现实中的实物更为集中、典型、优美，也因此，许多人一到出现在艺术中的意境的现景一看，往往大失所望，原因是现景的美不如艺术中呈现的意境那么集中与完整。如果艺术呈现的是春天百花盛开春雨绵绵的凄清美，你到现景游玩时却是万叶争绿的盛夏，那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如果艺术呈现的是枫叶红透落叶缤纷的深秋的萧瑟美，你到现景观光时是树木光秃秃的深冬，那也是游不逢时的煞风景之举。

把人生看得太透彻，必然是削发为僧才可解脱，以实用观点看现实景物，景物必毫无真美可言。大观园的竹丛，无论怎样婀娜多姿，只要一想到它们发不发笋，那美感必然全然消失。雾里看花总有几分朦胧美，云消雾散太阳高照，花是看得更清楚了，可那艺术美也就消失殆尽。因此无论看古迹，游名胜，还是爬高山，望大海，在审美观之外，总得加上三分想象，不然景物的美就得大打折扣。

茵妮亚在其《唐城，真能吸引人吗？》一文中，的确提出不少可供管理古迹名胜的有关人员参考的意见。香港的宋城缺点不少，城中景物不够深邃，站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把全城景物一览无遗，这是一个缺点；城内摊位贩卖的糕饼，要非硬如顽石就是近乎寡味，这是另一个缺点；历代帝王名人蜡人馆，阴森恐怖，一点美感也没

有,这也不能不说是缺点;娶新娘或杂耍,除教人感到滑稽外,似乎乏善可陈,这自然也不是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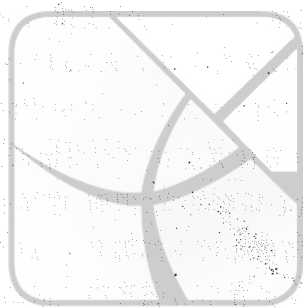
但宋城的失败,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不能建唐城。一个国家并不是不能建立一个呈现另一个国家历史或风物的名胜来吸引旅客的,日本的东京铁塔毫无疑问的是抄袭巴黎铁塔,而且许多人都说前者的气派不如后者雄伟,但东京铁塔却是旅客的重点观光地之一;东京狄斯尼乐园更摆明是全盘抄袭美国的,可自几年前开馆以来,游客如鲫,于今不衰。

由报道看来,唐城的规模要比宋城大得多,城内景物也似乎较为深远有致,较有看头。前车可鉴,唐城内的杂耍及其他活动是应该严加监督、时时改善的;城中食摊或餐馆所提供的膳食糕点,不用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菜肴应以美味可口为号召。有历史癖的旅客,不一定非食有历史味的菜式不可;没史癖的旅客,相信一定会取美味而弃历史味的;美食家能在富历史情调的唐城内吃美味佳肴,还有什么比这更赏心乐事的呢?因而,唐城的美味佳肴、糕饼点心,都应应以美味为主,历史味可全部抛弃,一点也不必感到遗憾。

裕华园与星和园失败在空有园景而无活动。裕华园每次配合华人佳节而举办活动,例必吸引成千上万本外地游客前往游玩,足以说明美丽园景若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活动相配合,就会更吸引游客的道理。裕华与星和二园既已有桥梁相接,再加上唐城的锦上添花,科学馆与宇宙馆的左衬右托,南洋理工学院云南园的相映成辉,裕廊一带成为历史文化观光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宋城的缺点,是唐城兴建时的借鉴,但不应是唐城兴建的信心打击。对大多数游客来说,有了唐城就多了个消闲去处,城内活动多些,食物美味些,就可以一年多去几次,至于城内景物是否酷似唐代长安城,他们并不感兴趣。对于较有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的游客来说,他们的游城就可借此深一层窥探唐代文物的真面貌。

什么事物一呈现在眼前就会失去几分神秘美，历史文物也不例外。想象是使事物美化的必备色彩，游山玩水看古迹逛名城，由于实物已在眼前，神秘之纱已揭开，游客就须把想象再笼上实物，能这样做，游趣势必大增。否则，即使真的登上青天揽明月，也会为月球的丑陋表层而痛心大哭。



加强新中文化交流

近几年来,新中民间学术与文化团体的交流实际上已在进行中。最近于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新加坡便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现在在曲阜举行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国的东亚哲学研究所更是个联办组织。只是由于一些省级主办的、有关马华文学或海外华侨史的研讨会,大众传播媒介较少报导,或者即使有报导也语焉不详,大家对这些研讨会的现场状况与实质内容,也就所知不多了。

有关海外华人史的研讨会较少,个别学者有时受邀前往中国国内作短期的专题讲学,若有关学者事后没撰文在报章上发表,一般民众也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从讯息传播的观点来看,像这种规模较小的文化交流,其实也是值得报导的。

市级或省级主办的文学交流会,不只规模较小,且研讨内容会重复,对新中的文化交流不能起更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的大学或学术机构,应可互通讯息,集思广益,联办较具规模、较有代表性的研讨会。

在收集海外华文作者的资料与编辑海外华文作品选方面,中国的各省、市的学术机构或出版社,也是各自为阵的,这既教有关作者不知从何选择出版社,而且将来书出版了,也会出现各书都

大同小异的弊病。

新加坡方面也有一些偏差。由于筹办研讨会、征集作品等等工作，都不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有关负责人即使交游广阔，也难免有失之交臂及沧海遗珠之叹。我们或许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新中文化交流委员会，最好由民间机构主持，以改进这些方面的工作。

亚洲研究学会在今年4月举行的一项研讨会上，有人曾呼吁新中学者应尽快进行合作，把华侨南来史更完整地整理出来，这呼吁是及时与值得我们关注的。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如今已进入垂暮之年，有些又已定居中国，新中有关学者若没能及时进行合作，与这些历史见证人取得联系，许多可靠与珍贵的口述史料不久就会湮没了。

在表演艺术方面，中国艺术团的莅新表演，可说相当频繁。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团体到中国去做观摩演出，相对地来说，就非常少了。其中原因很多，如出国经费便是一个问题。不过，文化交流应该是双程交通的，有关当局应尽力协助表演艺术团体前往中国演出。

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在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中国想了解用其他观点和方法进行儒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理，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我们也可了解到用唯物观点探讨文化课题的特点。文化交流除可促进新中两国人民的了解外，也可使双方人员在研究文化课题方面，有更广阔的视野与角度。因此，加强新中文化交流，可说是民间学术机构的重大任务之一。

新中加强经济合作的里程碑

中国国务委员谷牧此次率团前来新加坡访问，并与我国签署旅游民航及展览合作协议，这可说是新中两国加强技术与经济合作的另一个里程碑。当中国文物馆在我国成立后，两国在旅游业方面的协作就更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了。

谷牧也透露，新加坡将赢得一项大合约，负责扩建中国一机场。新中贸易一向紧密，但科技与经济合作却还大有加强的必要。新加坡所处的微妙地位，使它在与中国来往时较别国谨慎小心，反映在经济领域里就是新加坡是个迟来者这特色。

世界各国不约而同一齐涌向中国寻求市场，这是中国采取经济门户开放政策后的一大特色。欧美日自不用说，亚细安成员国中的马印也争先恐后到中国开拓合作领域，比较起来，我国的确是比别人落后了几步。

由于起步较迟，在尖端科技领域里我们又比不上欧美日，我国与中国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看来就只局限在海港管理、旅游事业、机场管理与建屋工程等方面了。谷牧先生就很清楚地表明，我国在城市建设、公共建屋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专家人才，在中国将能发挥作用。

我国虽然只是个新兴工业国，但在某些方面到底比发展中国

家先进一点；中国则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破坏，现在打算走现代化道路，百废待兴，人才也不够分配，新加坡在某些方面或许能与中国合作，并协助中国更快取得突出的成绩。

谷牧先生说得很坦率，中国不会给予新加坡任何优惠条件，一切全凭新加坡的竞争能力。新加坡与中国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与文化，如果其他竞争条件相等，中国将会优先考虑新加坡。谷牧的谈话，既清楚表明中国是以实际精明的态度来处理一切问题，也隐约暗示我国具有较别国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其实，除了这些优越条件而外，新加坡人一般远较一些国家或区域的商人诚实可靠，这也是我们的优点。我国企业家在与中国进行投资合作时，应该始终保持这份荣誉，理由是，这种荣誉得来不易，但若一旦失去，则损失就很大了。

新中迄今的合作计划共计 40 多项，但此次谷牧前来签署的协定，却有加强技术与经济合作的另一层意义。希望新中两国在此合作基础上，能为将来的更进一步合作打开宽阔的局面。

新中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中国国务委员谷牧在访问了我国的东亚哲学研究所后，建议中国孔子研究机构与我国学术界进行紧密合作，并说新中除了在经济领域可合作外，在思想领域上也有汇合点。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主席吴庆瑞博士则除强调新加坡欢迎更多中国学者来此从事研究外，也倡议双方进行合作，召开国际性会议。

我国在建国初期，为解决迫切的民生问题，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发展经济与兴建组屋上面，相形之下，文化建设就没那么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当局才有系统有步骤地鼓励文化活动，但文化风气却并非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因此与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如中国比较起来，我们的社会文化气息就很单薄了。市侩哲学的泛滥，使得一般人总喜欢从金钱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这不只使国民的素质难以提高，长远来看，对国家根基的巩固也会起不良的影响。

与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开拓我国学者的眼界，并增强他们的研究信心，从而普及学术的研究风气。外地学者来到我国从事研究，往往会发现资料不够充足的毛病，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学术资料收集不全，也说明研究风气尚很落后。

我们当中的相当多的人错误地认为，我国地小人少，在各个方

面都难以出现杰出人才,这结果是拿来主义特别盛行,在经济上、科技上如此,在文化上、学术上也不例外。其实这是妄自菲薄的看法,不利于国家意识的形成。经委会经过仔细检讨与研究我国过往的经济政策后,特别强调本地企业在将来我国经济发展上的重大作用,最足以说明拿来主义是有其偏差的。同样的,长期依赖外国文化,也必然有其弊端。

以我国地处东西交通的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来说,我们的学者一般上都较能具备东西方研究方法的特长,如果他们有充足的资料,是不难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

其实,自中国开放门户以来,新中的文化交流,民间早已在进行。把这种交流提高到官方的水平上,那是更具意义的,新中文化交流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孔子研究只是沧海中的一粟。以语文来说,我国的英文教学法,就有足供中国参照的地方,同样的,中国的华文教学法,也有可供我们参考的价值。在大众传播媒介方面,除了电视节目的交换外,报章在许多方面也有协作的可能。还有,在先进商业行政管理知识方面,我国也应给提供中国一些经验。

文化交流本来就是开拓对方学者眼界的有效途径,新中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大致相同,又由于彼此都有其长短处,因此学术交流就更有相辅相成的积极意义了。

重视亚洲的优良价值观

有关亚洲价值观问题竟然由报章辩论到国会,又由国会搬到大学校园里去议论,足见此问题受到重视之一斑。但市面上有一种看法却颇教人担心: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只是华文报章与詹时中的争论。这是非常不符合事实的说法,麟记区议员欧进福博士日前已指出这点来。

什么是亚洲价值观,哪一些适合我们的社会发展需求,为什么不强调西方价值观而要强化亚洲价值观?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就全盘否定东方或西方价值观,那是草率的作法。

王鼎昌副总理曾指出,注重纪律,勤劳好学,群策群力,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些都是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当然不只是这些美德,它也有一些落后的、不合此时代的观念,正如西方价值观中也有些颓废因素一样。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东方社会,亚洲价值观长远以来就存在着,我们要发扬亚洲优良传统与价值观,是轻而易举的事。西方先进文明也自有其优良价值观,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未引进整套西方文化与其优良价值观。我们强调个人自由,但却缺乏尊重别人的民主作风,我们强调尊重人权与言论自由,但却缺乏集体观念与维护国家安全的情操。一句话,在引进西方科技知识与管理学

技巧方面,我们相当成功,可是在生活方式、习惯与文化方面,我们却依然保持着东方式的。我们至多只沾染到西方的次文化与蕴藏于其中的不良积习,这些积习与次文化若在毫无限制下泛滥起来,就只会冲毁我们的国家根基。

有一些人惯以夸大亚洲价值观中的一些糟粕,并以之来否定其中的精华,从而得出袒护这些糟粕者都是抱残守缺的人的结论。若再由此引申开去,谓抱残守缺者都是受华文教育者,那不只是诬蔑,也是国家的悲哀。一般受完高中教育的华校生,对亚洲价值观的认识已相当全面,他们不只会盲目崇拜其中的糟粕,而且还是反封建的急先锋。反儒反孔进行得最激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推崇备至的倒是西方的学者,这要非说明受华文教育者不尊孔,也至少说明他们并不是抱残守缺者。

如果我们不可能把整套西方的优秀文化及其优良价值观横植过来,我们何不从已植根于我们社会的亚洲文化与价值观中去芜存菁呢?任何对此项工作采取全然否定态度者,要非对亚洲价值观一无所知,就是别有用意了。我们应当重视优良亚洲价值观,它们不是国家继续繁荣的要素,也是文化建设的根基。

不排斥流行曲 更爱抒情歌

还住在乡村时，我的房间有一扇窗，可以看到窗外的椰树、香蕉树、挂在椰梢上空的星星和月亮。临睡前，月光带着草丛中的虫鸣声泄进窗口来，晚风轻飘着，把香蕉叶翻覆着，像一条大鱼游在大海中。在这样的夜，我爱听一些描写大自然景物的流行歌曲。

在云南园时，当夜雨飘洒，我从窗外看出去，逶迤长廊的朦胧灯光，在一大片宁静笼罩着的山冈上，把斜斜的雨丝、开满粉状黄色花蕊的相思树，都照出个大意来，整个山冈就像一幅水墨画般清淡。这样的夜，我爱听一些描写情思的流行歌曲。

扶桑的情调，是艳丽又凄清的，日本的庭园，是精巧而又富于诗意的。这样的情与景，在日本流行曲歌手演唱艳歌时，在背景是一座小庭园枫叶飘飘或竹影横斜时，最为感人，日本传统流行歌曲的吸引人，魅力全在哀怨上。

无论是中国的或日本的流行歌曲，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有民族色彩的，如中国的《街头月》、《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等，日本的《北国之春》、《旅愁》、《梦里追寻着的酒》等等，另一类是全盘受到欧美流行曲影响的，以啸叫呼号为主调的流行曲。我会聆听的是前一类，因为它抒发了该民族男女的偶遇之情，邂逅之意，或描写了该民族的生活情趣，这是比较能感人的歌曲；后一类流行曲则

是颓靡者的呼唤，全然没有美感。不过，即使我会听富民族色彩的流行歌曲，它给我的感受也只是伤感、惆怅，而不是欢乐、活泼的情绪。

在乡居，在云南园，在扶桑，当我心情平稳时，我会聆听民歌、艺术歌曲，或无词的乐曲。民歌的充满生活气息，活泼生动的旋律，使我对生活产生信心。艺术歌曲，但不是从外国横植过来的贵族艺术歌曲，它所抒发的是提升了的感情，能净化我的龌龊感情，并提高我的情操。优美的乐曲，有广阔的空间，让我填进我的想象，让我开拓人生的境界。

因此我不反对聆听富有民族色彩的流行歌曲，但那是情绪的发泄，不是情操的提高。我更喜欢聆听的是民歌，艺术歌曲或乐曲，从其中我体会到该民族的生活情调、智慧、毅力，从其中我开拓了自己的人生境界，从其中我也提高了自己的情操。打个比喻，流行歌曲是啤酒，喝过就算了；艺术歌曲或民歌是陈年佳酿，可以细细品味，可以回味无穷。再打个比喻，既然很多流行歌曲的旋律是剽窃自世界名曲，我们可以说流行歌曲就如名画的复制品，缺乏真迹名画的笔触与韵味，而艺术歌曲或民歌则是艺术家的真迹，不仅有韵味，且耐人寻味。

“他踢我的脚”哲学

那个清早的太阳非常炎热，我们排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出席周会已半点多钟了，运动场两旁是教室，教室外的棕榈树，峇楂里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树下的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树荫真教我们向往，我们真想赶紧到树荫下纳凉。好不容易散会了，其他队伍都散开了，独独排在我前面的队长不敢带队离开，因为我们的级任老师不在场。

“先生，他踢我的脚”，我等得非常不耐烦，就对着这个该带我们到树荫下去的队长的脚踢了一下，暗示他开步走，没想到级任老师就在这时来了，队长因此不但不开步走，还向老师诉说我的不是。结果老师罚我站在阳光下 15 分钟，这已是廿多年前我在小学时代的经验，但真想不到，“他踢我的脚”哲学在社会上还是很流行的。

“他踢我的脚”哲学的内涵有二，一是作为一个部门主管人缺乏主动性，缺乏带领属下迈步前进的干劲；二是他的属下若踢他一脚，暗示他该开步走，他不但不敢走，还会向上司报告他的属下不守规矩。这种“他踢我的脚”哲学，在私人公司里存在着，在政府部门里更是普遍。遵守“他踢我的脚”哲学的人，他的工作态度是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因为但求无过，他心里想的是多拿薪水少做事，少做事就少犯错误，少犯错误就有希望获得加薪。但“他踢我的脚”哲

学能存在，却另有种种因素促成的。

以公务员来说，繁文缛节，把他们束缚得动弹不得，或者动辄得咎。既然动辄得咎，就少动为妙。积习日久，就索性不动。既然自己懒得动，他也不希望其属下动。因为自己不动，无所表现，属下若动而有所表现，就会使自己黯然失色，为了不使属下的表现超越自己，他必然向上司呈报属下的动，于是“他踢我的脚”的投诉就出现。

促成公务员产生“他踢我的脚”哲学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食无打骂有”。当公务员的一个苦恼是公众人士中的屑小之辈，时常会写匿名信向你的上司诉说你的不是；上司收到信后，照例是不问青红皂白先责问你一番；你若应答不得体，上司就会搬出“他踢我的脚”的口实来责备你，说你假聪明，不照规章做事，这样下去，公务员不遵守“他踢我的脚”哲学也很难了。

但最教公务员丧气的评估制度有问题。公务员是只能照章行事的，但较有创见的人却爱随机应变，看情况处理问题，这样的人往往被上司目为叛教逆道者，到了年底一份评估书就把你判入死刑。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繁文缛节的束缚，好多公务员只希望稳稳保住饭碗，而不想有所表现，这种想法发展到极致，就产生了“他踢我的脚”哲学。上司既奉行“他踢我的脚”哲学，属下要是不辞职，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也必奉行此哲学不误。

现在欣闻我国公共服务部门将以雇员为重的管理哲学，来取代过往的工作定向制度。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但在把人当成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要给予栽培的同时，公共服务部门若能简化一些规章，“他踢我的脚”哲学就能逐渐消失，否则无论怎样重视雇员的前途，雇员若只奉行“他踢我的脚”哲学，那一切预期的成果还是难以收效的。在私人部门，“他踢我的脚”哲学也一样得清除掉，否则在强烈的竞争下，那公司也必兵败如山倒。

东方社会的困境

东方社会落后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两个重要因素是教育不普及与知识分子和群众隔绝。教育不普及是东方社会的一大特征,尤其是高等教育更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由于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就形成他们与社会低层人们脱节的现象,其结果是知识分子是浮在东方社会顶层的一层油,而一般民众则是处于低层的水,油与水永远无法融合。

这种知识分子与群众隔绝的现象,在多种语言与文字的社会里就更为严重。于是就会出现上层知识分子生活在相当文明的境界里,但低层群众则生活在落后无知的狭缝里,又由于文字的隔膜,知识分子无法把他们的知识向群众普及,于是东方社会里常出现的两个社会阶层面,就会越拉越远。

日本社会比一般东方社会高超的地方有二,一是他们没有多种文字的困扰,二是他们的高等教育非常普及。没有多种文字的困扰,在知识的沟通与普及方面,就轻易多了。加上日本印刷业非常发达,书刊众多,很多先进知识,一下子就深入到社会低层去。另一方面,由于大专教育普及,翻译事业发达,日本民众在吸收外来知识方面,也较诸亚洲其他国家为快。

日本的两大有利条件,并不是一般东方社会都能具备的,尤其

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更难做到以单一文字来传播知识。因此,我们只能从普及教育方面着手,去缩短知识分子与一般群众的距离。根据报载,我们有 50 万工人必须接受继续教育与训练,可见我们的社会也和其他东方社会一样,得面对社会高层与低层文化水平差距的困境。

撇开语文问题不谈,日本的大力普及高等教育制度,或许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一向来,就有人认为大学生过多,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日本大学毕业生而当司机的,比比皆是,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浪费,其实不然,由于大专教育普及,人民知识丰富,道德水平提高,不只社会更趋安定,在吸收先进科技方面,日本人也较诸其他亚洲人为快。

我们有 50 万工人须接受继续教育与训练,这或是过往教育淘汰制度过严造成的。为避免这种局面的重现,我们实在有必要检讨我们的教育淘汰制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学也有必要多开设夜学班与函授班给有心向学的在职青年。这是个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离校多年而又没机会接受更新知识的教育的人,往往是会落在时代的后头的。

文明古国的历史包袱

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就如一位饱受风霜的老人，他有很多过去的光辉事迹，他有很多处世待人的丰富经验，正是这些过往的光荣，使文明古国国民容易自我陶醉，“缅怀过去，而不看现状，也不展望未来”，正是这种沉醉在过往光荣史的态度，使文明古国难以在现世界上崛起称雄。我国第二副总理拉惹勒南日前受邀，在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说时指出，文明古国国民在心理上和性格上都自大，认为他们的文明已十全十美，因此，要加以保护，他们的知识只是一再地重复古老的东西，他们的思考方式和闭关自守态度，无法促成工业革命。拉惹勒南的论点，真是一针见血地点出，古老传统或文化，对现代化社会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有时是罄竹难书的。

文明古国的危机，是由于它有太多已定型的生活陋习，僵化的思考方式及自我陶醉的阿Q精神。生活陋习使文明古国国民不能接受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僵化的思考方式使他们事事物物都以历史经验来看待问题，而不以现代观点来分析事物。自我陶醉使他们生活在过往的光荣中，而不展望未来。

这种种特征，表现在学术上，是钻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特别多，但对现社会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却没有。因此当社会发展

到一个阶段而出现毛病时，文明古国的学者就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不寻求病源所在并对症下药。以中国为例，满清的积弱，固然有部分原因是满洲人统治汉人，深怕汉人造反而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来威迫利诱汉人；但满清一代，考据训诂特别发达，使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钻进故纸堆里去寻求寄托，也是清朝衰弱的原因。

但也不是因此就说文明古国，就绝对无法在现世界中崛起。日本也可算是文明得早的亚洲国家了。但日本能在现世界中鹤立鸡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教育普及，而且，日本教育既强调理工科，也给文科予适当的鼓励，这种在引进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又以之来处理传统文化，来处理社会问题的做法，也许是日本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的原因。

可见得文明古国，固然易流于自大，易陷于闭关自守，但只要为政者能高瞻远瞩，能在普及教育方面下苦功，能引进科学知识来破除腐朽的思想、落后的习俗，文明古国也能崛起，只是和历史较浅短的国家比起来，文明古国在抛弃旧包袱方面，要费劲得多了。拉惹勒南指出西欧今天面对的危机是，要维护一些不关紧要及过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观，这正是文明古国在发展途上迷失的一种征象，这批评是鞭挞入微的。

探讨儒家思想中的有利因素

儒家思想是否对新兴工业国的经济成就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过去有人争论过，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将来这课题还是会继续辩论下去的。

作为哲学思想，儒家思想是不乏古今适用、四海皆准的原则的。只要扬弃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道德项目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对家庭和谐的维持、国家观念的树立与巩固，还是大有裨益的。

儒家由孔孟开创，经历代帝王的推崇，宋代理学家的阐述，明清学者的演绎，近代当代学者的研究，有关儒学的论著已是《论语》《孟子》的数十倍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是唯心派学者，还是唯物派学者怎样条理分明地剖析儒家思想，或井井有条地逐项逐件演绎儒家的政经理论，儒家思想学说在实际上并不被任何国家所全部采用。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与教育家，他对中国甚至东亚的贡献与影响，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但任何理论都是从现实中的许多现象中综合整理而后提炼出来的，时过境迁，当时归纳出来的理论，有些在现今已不适用，那是很自然的。我们研究古代圣哲，应抱着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只知一味崇

拜，牵强附会夸大其成就，把他们神化了，不只自欺欺人，也不能更客观地了解圣哲的思想人格。

儒家思想对社会安定有积极促进作用，但它却肯定不是促使东亚各国或地区繁荣兴盛的唯一原因。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是由许多有利因素促成的。这些国家或地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管理知识。

对新加坡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建国过程中确也扮演过一定的角色，而今由于教育政策改变，西风东渐，东方传统逐渐消失，可能因此动摇社会根基。但我们却不可以因此否定西方先进知识对我们的积极贡献，儒家思想至多只能协助我们维持一个较稳定的社会，在政治领域里，它就无能为力了。我们与其把儒家思想过分美化，不如理智地探讨儒家思想中哪一些成分对我们有利，并加以保留与发扬。

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

亚洲四条小龙,甚至包括亚洲的日本这个工业先进国在内,为何能在战后在经济上有突飞猛进的成就呢?这与他们曾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连吗?这是一个近年来东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也是一般关心时事的人经常谈论的课题,最近举行的大专辩论会的决赛辩题也是关于这方面的。

单从四小龙的社会特征与经济发展来看,我们应该可以说韩、台、港、新除受儒家思想影响外,前二者在经济上相当依赖美国,在管理哲学上也深受其影响;后二者则继承或秉承英国的高效率文官制度,致使其行政系统高度效率化与制度化;如果说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德目如勤俭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四小龙经济成长的胚芽,那上述的先进的管理哲学与制度化的行政系统则是引发胚芽成长的阳光与雨露了。

也曾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把儒家中的君臣上下关系扩展到社会组织中去的日本,其成功并不能全部归功于儒学的作用。如果我们说明治之前的日本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深受中国影响的话,那明治之后 100 多年来的日本的经济文化都是深受欧美影响的。尽管日本曾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它如果没在明治之后刻意地、有系统地引进欧美的教育、科技、军事、管理哲学,日本是不会

崛起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或神化儒家思想对日、韩、台、港、新的经济成就的作用,否则我们会无法解释为何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且其民众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大陆,在这百多年来却多灾多难,经济无法快速成长起来的原因。

中日的维新革命几乎同时进行,日本百多年内从一个落后的、闭锁的封建社会走向先进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而中国的进展却是老牛拖车式的,总教人认为它是在原地踏步,这其中的关键绝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如日本的浓厚的缘故,而是中国的历史包袱中有太多陈旧与迂腐的传统,致使它不能有利地吸取西方的一些先进事物。

综合地看,我们或许可以粗略地下结论说,在引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的前提下,去芜存菁地保留一些儒家的积极的题目,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有好处。

东方学者的传统治学方法其中的一个特点是,以治经精神来詮注圣贤的著作,结果是尽管对古代圣哲的思想解释得透彻无比,却不敢对其中的糟粕稍加批判,致使后人只能在前圣的有时代局限的理论中绕圈子,跳不出其窠臼。研究社会科学,我们不妨像科学家钻研前代科学家的理论那样,既真心诚意地承认前人取得的成就的可贵,也认识到前人由于受到时空与社会条件的局限,其理论应有可供修订之处。对待儒家思想也应如此,否则许多有关的现实问题就无从解释与解决。

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

日、韩、台、港大趋势系列

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包括以下的德目:

- ①现世自我实现的精神。
- ②苦干、勤劳、节俭的品格。
- ③注重教育的作风。
- ④为家庭牺牲的美德。
- ⑤强调集体主义,少个人主义。
- ⑥讲求上下有序。

系列之一:

午后的太阳

——日本 具体体现诗词意境的国度

如果你曾翻阅旧画册,或看过战后初期日本拍摄的电影,你就可以看到东京在战后是何等的满目疮痍。然后,在90年代的今天,你到东京去走一圈。看到处处高楼大厦,夜夜歌舞今宵的繁华景象,你会很惊讶地感叹道:日本人是怎样把东京重建起来的?

融诗词意境于现实

日本人不只把日本从废墟中建起来了，他们还把中国古诗词的意境巧妙地融入现实中去。银座或许有点西洋格调，新宿难免有点脂粉的庸俗气，涉谷太嘈杂了，六本木又太优雅了，但浅草泛着的诗意，那便是诗词意境的具体体现了。横滨中华街洋溢的生活气息与华人色彩，那更叫人神往了。

然而日本的美不只体现在某一地区，即使在高耸的霞关大厦，楼下一间小小的贩卖“天妇罗”的餐馆，那假山假水的优雅布置，就俨然是山水小诗意境的具体化了。这样的诗情画意，在高建筑物的顶层餐馆，在大街小巷的小吃店，也处处可嗅到。

日本人从战后初期的一无所有，发展到今日的丰衣足食、生活环境的优雅，这其间的艰辛过程，需要多大的毅力呀。

1989年日本国人平均年收入已超过美国人。1987年及1986年日本年产汽车数目及电视机台数也已分别超过美国。尽管日本人在住方面还比不上欧美先进国，但日本近十年来投注在改善人民生活素质方面的建设，是有迹可寻的。近年才完成的半藏门线、都营浅草线、都营新宿线，车厢固然是崭新的，连有60多年历史的银座线、丸之内线的车厢也都换上新的，东京现有十条地下铁，交通可谓四通八达。

日本的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新建的不用说是货品应有尽有，摆设优雅；即使原有的也在原基础上打扮一新，使人有今不同昔的新鲜感。日本人的苦干、肯干、精益求精的品格与精神，可说是日本战后40多年来经济获得优异成就的主因。但这种品格与精神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呢？西方的一派学者认为，那就是讲求务实与现世自我实现主义的儒家思想。

与儒家思想有关连

大成建设株式会社的调查研究与发展部主任小野冢昭三郎，在列举战后日本经济获得迅速成长的种种原因后，也毫不讳言，日本人做事勤勉，有苦干精神，重视子女教育，望子女成龙成凤，有爱储蓄的美德等等特性，其实都与儒家思想有关。他认为日本战后经济迅速成长，有诸多外因，诸如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并开发技术，解散大财团，日本因有日美安保条约的保障而可节省军费倾全力发展经济，战前的工业基础在战后仍然保留下来，等等，等等；但内因显然与日本人的上述种种特点有关。这位出身东京大学，并身居日本最大建筑公司之一的要职的小野冢，虽然不认为儒家思想是日本战后经济成长迅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肯定它是日本经济成长的相当重要的内在因素。

对宗教不那么热忱

定居日本 30 多年，而日文写得比一般日本人还突出的，担任大成建设株式会社中国组顾问的吴新雄先生，在力陈日本无资源可买最好最便宜的原料来制成产品，因而能以价廉物美占尽上风促成经济成长外，也再三强调，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实在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他认为儒家思想对宗教不那么认真，这特点即使在日本也非常突出。日本人是佛教、神道教混合起来用，看什么场合行什么教的仪式。亚洲四小龙对宗教也大致如此。由于对宗教不那么热忱，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或区域的人民，就力求在现实里寻求成就，而这正是促使经济迅速成长的原因。

共同社总主笔福原亨一虽然并不那么认为日本经济成长与儒家思想有关，但他也认为，单就日本人对所属公司较有归属感与效忠感来说，那很明显地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归属感与效忠感

若也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这么一来，说儒家思想是间接促使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未尝不可。

曾经是中曾根首相智囊团要人之一、而今是东大政治学教授的佐藤诚三郎，特别强调日本的成功在于它孤悬于东方，没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不过，他也认为，如果就日本人较有纪律这点来说，说那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是可以成立的。只是他认为不应该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与朝鲜，就因为无法抛开孔子的阴影，又不能迅速引进西方文明，以致落后于迅速引进西方文明的日本。

日本经济协会会报总编辑铃木章雄认为，很难说日本经济增长与儒家思想有关。对于日本一个学者认为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已把儒家的传统的上下有序的家庭观念扩大到武士与幕主的、雇员与雇主的社会关系的层面上的说法，铃木也不以为然。他说日本社会只取儒家有用的形式为其所用，而不是取儒家的精神实质。

同样在日中经济协会工作的十川美香则认为，日本的儒家与中国的已有所不同，日本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点关系，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日本战后经济成功，主要是它引进民主制度，发展教育，且战前的工业基础与部分人才在战争中并没彻底受到损坏。

来自中国，并在学习院大学教导亚洲经济已八年的杜进先生说，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认为儒家思想与日本经济发展有关，经济学家则不如此认为。他本人认为，儒家思想有两点有利于经济发展，其一是尊上与讲求秩序的精神，这有利于官僚统治，并推行其政策。其二是雇员较尊敬雇主，大家都讲求和谐关系，这有助于促进人事和谐关系。不过，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却也与其较合理的定年加薪及终身雇用制有关，还有日本也利用较低工资机会，快速引进外国科技，并扩大出口市场。

太阳也会下山

曾出任《经济学人》驻东京分局主任的比尔埃模，在其新著《太阳也会下山》一书中，列举诸多原因，说明日本在五至十年内，其经济势力必然衰退下来。比尔埃模的一些论点，难免过于主观牵强。不过，日本即将面对的难题不少，却是事实，也是有识之士深以为忧的。

曾在美国住过好些年的宫智宗七说，日本人不但越来越骄傲，既不向亚洲国家就有关二次大战期间侵占别人国土一事道歉，也看不起美国，说美国在一些工业领域竞争不过日本，是美国人不努力工作的后果。宫智认为日本国内已兴起国家至上主义，对内非常保守，对外又不法国际法，这种种现象会使日本在二十一世纪无法继续前进。

单一民族社会难国际化

佐藤诚三郎也认为日本社会为单一民族社会，要国际化很不容易，要与外国合作更缺乏经验，而这些都是日本继续前进的障碍。

福原亨一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人有了许多钱，却不知要做些什么才好？在外国投资设厂，也不知如何与当地人搞好关系？日本贸易盈余年年增加，美国对日本已不再那么宽容了，日美关系能搞好吗？

铃木章雄认为日本人应打破岛国国民心态，关心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日本人当前只顾赚钱享受，不管他人幸福的自私作风，令人讨厌。

年老一辈，有苦干精神并现居要职的日本人，不久就会告老退

休,而年轻一代即将接棒。教人担心的是,年轻一代深受美国文化影响,不像年老一辈那么勤劳苦干,年轻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他们开始追求享受,变得懒惰,“新人类”已结婚了,生出“新新人类”来了。换句话说,如果说日本人的勤勉是秉承自儒家思想,那我们便可以说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美德,在工业化社会中已渐渐消失了。发源于农业社会的儒家思想,要如何改头换目以适应工业社会,台湾学者对此颇有研究,日本人却好像只有站在一旁干着急、徒呼奈何的分。

面对内因与外因变化

日本人口逐渐老化,储蓄将被逐步用完,美苏解冻,日本没利用价值。日美贸易矛盾日深,要如何解决?日本已走在最前头,再也发挥不出“后发效果”(指日本人对新产品或新发明的模仿改良的能力)。日本会衰败下去吗?太阳快要下山了吗?

小岛明说,日本经济若能停在午后两点或三点钟,那太阳就不会下山。他认为日本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积极协助发展中国家,使大家一起前进。第二是,减少输出产品,且移出工厂在外国生产,但并非为出口或再输入日本。第三是,改善国内人民生活素质,大力建设基本设施。

客观地分析,日本面对的问题是来自经济增长内因与外因的变化。如果说儒家思想中的勤劳、节俭、重视教育是其经济成长的内因,那随着经济繁荣,除了重视教育这美德还存在外,勤劳与节俭显然已在程度上有所削弱了。如果说安保条约日币、美元对换率曾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外因,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后,美国要求日本负起更大的防卫与国际责任,无疑的必会削弱日本的竞争力。

大来佐武郎在其著作《迈向 21 世纪:日本的角色》一书中,为美日贸易磨擦问题曾多方为日本解脱,大前研一在其著作《超越国

家界限》一书中，曾自豪地说，一个国家前途的主要关键因素是人力，而不是天然资源，而日本有一亿两千万受过良好教育与勤劳的人民。是的，日本当前的经济力量，没人可以忽视，但太阳过了中午就会慢慢西斜，日本要怎样放慢走下坡的速度，显然不是易事。

系列之二：

汉江烟波何浩渺

——韩国 无形遗产创造有形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发生韩战，经历过此二场战争，韩国一切有形的财产都毁灭了，连有形的传统也消失了好多，我们只剩一种无形的、宝贵的遗产，那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重视教育精神，节俭、勤劳苦干的品格，支持着韩国人努力求学，甚至到美国留学，并努力工作，大量储蓄。韩国就是这么慢慢地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地步的。”

早年毕业于汉城大学经济学系、而今是半岛纤维商社的东主、在巴黎与悉尼设有分公司的姜钟基先生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强调儒家思想对韩国经济成长的正面促进作用。当然，他并不排除其他因素对韩国经济成长的作用，例如有好的政策、有效率的文官制，甚至朴正熙的独裁统治所带来的稳定社会局面，都对韩国经济有积极作用，但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儒家思想在韩国人精神方面的鼓舞与积极的作用。

市容繁华不逊港台

今日的汉城的繁荣市容，即使与台北或香港比较，一点也不逊色。明洞一入黄昏，人潮汹涌，灯光灿烂，直到半夜，人潮犹未散。梨

泰院豪华气派或比不上明洞一带，但一摊摊贩卖着鞋子、皮包、旅行袋、各种各样货品的街边摊子，在平民中却也洋溢着豪华气息。路边摆卖的各种配酒的小食，也透露出经济朝气蓬勃的气象。南大门市场一大早就人挤人的。观光的、购物的，韩国人、外国人，形形色色，一派繁荣景象。Lot te 百货公司富丽堂皇，摆设不逊于东京的任何大百货公司，新世界百货公司，在古雅中也有现代气息。地下铁即使在周末与星期天，其拥挤程度比东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的士沿途一再载客下客，说明的士供不应求，数人得共乘一辆的士。小小的汉城挤着一千多万人口，你若没有窒息感才怪。从飞机上看下来，汉城周围高山不少，比起日本关东大平原来，汉城的地理条件是差得远罗。韩国人使汉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那是多不简单的事啊！

坐车或搭乘火车经过汉江，远远看去，汉江的浩渺烟波，蔚蓝色，河中沙洲耸立着的六十三层黄金塔“大韩人寿保险公司”大厦，比起东京的日光大厦还高三层，这一切景象，使人可以感受到韩国人与大自然斗争的勇气与毅力。

摆脱日本努力奋斗

韩国人民曾经受过日本三十六年的强力统治，在那段期间，生活极端辛苦，又没有半点自由。光复后，韩国人痛定思痛，深刻地意识到再也不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下定决心，一定得努力奋斗，赶上日本。亚新海运株式会社董事长兼新加坡名誉领事斐柱元先生在谈及韩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特别强调这段惨痛历史教训的作用。他和姜钟基一样，认为韩国经济成就毫无疑问地与儒家思想有关。他说韩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既深且远，他本身就是个例子。他年轻时非常努力工作，不反抗上司，很尊敬长辈，与朋友兄弟维持着友好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可说对韩国经济发展有直接

的、正面的、积极的贡献。

在韩国学术界颇为闻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的顾问郭相琮教授，也同意儒家思想与韩国经济增长有关系。他认为韩国有今日的成就，与政府有好政策，引进外资、科技，并促进出口有关，也与企业家人努力工作，引进新的管理哲学，汇集资本，扩大市场有关，更与国民觉悟高，以坚强的意志来搞好经济有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韩国工人勤劳、苦干、合作、少投诉，有强烈责任感。韩国人重集体利益，少个人主义。工人闹工潮，究其实只是一种时尚，不难解决。更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人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这从李朝以来就如此，而重视教育乃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德目。

长幼有序听从上司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策划部主任曹秉旭，列举六大因素说明韩国经济为何会成功。其中包括好的官僚，朴正熙领导有方，买廉价科技并输出有竞争力产品以及工资低等等。他也认为韩国经济成就确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的观念，延伸出去就变为雇员会服从雇主，下属会听从上司，从而使工作容易推行。另一方面，儒家很重视教育，影响韩国人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教育不只改变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生产力。这两点都对韩国经济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韩文早已走向拼音化，在汉城街头走动，绝难看到汉字，对不懂韩文的，而又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来说，其感觉就如文盲一样。这与在东京街头巷尾，处处可见汉字的格外亲切、似曾相识的感受迥然不一样。不过，深一层去探讨，就会发觉，韩国人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较日本人深远的。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国际部的副科长崔昌树先生，年纪还不到40岁，热情有

干劲，表面上看不出他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谈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相当尊儒的。他说韩国人服从父母、服从雇主的作风，重视人和的品格，排斥不认识者而与认识者特别和好的特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特征。这些特点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有好处。

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大前提是我所访问过的十多位韩国学者、专家、企业家所共同肯定的，而且，他们也都同意韩国经济增长与儒家思想有关系。不同的地方是，有些受访者较全面肯定，有些则有保留地肯定。

韩国百货公司协会执行董事经理河相勋，肯定亚洲四小龙都深受汉文化影响，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韩国经济增长只能说与儒家思想有点关系，这主要是表现在较有纪律这美德方面。韩国经济成功主要由于政府有好的策略，有远见的经济发展计划，有足够的劳动力等等。

在朴正熙时期担任南北韩统一部门的副部长，而今在东京大学担任研究员的董勋，除肯定引进科技、普及教育等等因素促使韩国经济迅速发展外，也认为韩国人拥有儒家思想中的勤奋、爱储蓄等美德，对韩国经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年纪不大，而人生经验丰富，曾在文化部任职，担任过大学教授，而今是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的输出部助理董事长兼对外主任的李映周先生，在特别强调韩国为半岛，而半岛的国民具有忍耐力、魄力，并向外发展贸易等特性，同时还声称韩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尊敬长辈，热爱国家，因而能与政府协力合作，而这些特点正是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

人民勤劳 教育普及

曾任韩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数年，而现今是韩国中小企业

银行行长的安承喆先生，很客观地分析了韩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有三点。一是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勤劳、苦干；二是教育普及，全国识字率高达 99%，而重视教育显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三是日本统治以及韩战的悲惨历史教训，促使人民与企业家努力图强，发奋工作。不过，他也指出，儒家太强调士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农工商的重要性，这是不好的负面影响。

兼任《中央日报》与《中央经济新闻》主笔的玄英镇，虽然不否定儒家思想对韩国经济成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他更强调的是基督教对韩国社会的正面影响。

系列之三：

宝岛春深不飞花

——台湾 中华文化结合西方科技

几位颇有社会地位的台湾人和几位美国贵宾，在一家高雅酒楼用晚餐。将就席时，大家一再推让，什么人都不愿意上主席位，在推推让让中，一位美国人这么问道：“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在宴会时，大家一再让位，而在马路上，却一点也不礼让呢？”一名台湾人这么说：“因为我们认识你呀。”

台大校长，又是著名经济学家孙震在他的办公室这么娓娓向我叙述这个在台湾相当流行的小故事。这小故事阐明一个道理：台湾人具有发源于农村社会的儒家思想中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而缺乏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台北交通之乱与杂，行人与驾车人士互不相让现象，使外国人瞠目结舌。特殊主义危害之大，于交通上已可见一斑。李国鼎 10 年前推行的第六运动，为的就是推广普遍主义，但看来是一败涂地。

说特殊主义不适合于工业化社会,并不等于说儒家思想会妨碍台湾经济发展。孙校长认为,有些经济学家说,由于新科学连续不断进步,才形成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但揆诸事实,并非引进科技的每一个国家都能达致现代化的目标,中华文化加上西方科技的巧妙结合,无疑的是台湾经济成功的要素。中国自古以来,阶级不明显,特别注重教育,有所谓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故事。台湾40年来经济成就,大半原因就因为它的教育发达。自然政府有好的政策,不与民争利的作风,也是台湾成功的原因。总之,不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即使引进西方体制与科技,也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成就,正好说明台湾的成就与儒家思想有关。

台北陆路交通的混乱与拥挤,既说明人民富裕,有能力购买车子,也说明当局早在十年前没建设,而现在才开始建设地铁是个不小的错误。台湾是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高的地区,而主要基本建设如地铁竟然或缺,据我接触过的一些年轻学人的看法,那是国民党政政府没打算长期呆在台湾的证明。然而,交通的紊乱并无法掩盖台北的繁荣。

环境污化,发展的代价

台北闹区如中山北路、西门町一带依然热闹,中华商场有其特色,忠孝东路颇有原宿的格调。台北新火车站美仑美奂,忠孝西路一带入午夜了还是人来人往,重庆南路的书店,晚上还是挤满了人。整个台北市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物价之高与消费之惊人,有些地方连东京也要自叹不如。

我到台北时,已是暮春季节,跑到故宫一带去,只见树木苍翠,不见花朵盛开,台北市内,更无法看到鲜花盛开的情景了。台北的天空总是阴暗的,空气污染程度一如十多年前的东京。然而,若以统计数字来说明台湾经济现代化的急速,那台北的环境污染,便是

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1952年,在台湾的就业人口中,农业占61%,工业只占9.37%,到现在,农业人口已降为12%或13%。由于整个出口以工业品为主,都市的污染便在所难免。

勤勉与重视教育

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原因不只一个,但就内因来说,那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勤勉与重视教育精神,显然是两个重要因素。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孚就特别强调儒家的重视家庭、注重教育,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贡献。由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经营者都是家庭成员,大家和谐地努力工作,因而有所成就。王教授还从科举制度可以打破门阀垄断的角度,来肯定中华文化的优秀性。他甚至举郭廷以教授论断雍正禁教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来反证儒家思想非阻碍中国现代化。

孔子的七十七代孙子,现任“考试院院长”的孔德成先生,则从孔子倡导恕道,因而使工人与雇主有和谐的关系来说明儒家思想对台湾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他说由于劳资和谐,老板明白一人无法办工厂,而工人了解既然拿了老板的薪水,就应好好做事,工潮事件就不会发生了,经济自然顺利发展。

与中国文化也有关系

“考试院”秘书长王曾才博士则说,太平洋边沿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显然与中国文化有关系,而不单单是与儒家思想有关。不过,儒家思想强调现世的今生自我实现人生观,可与经济成长息息相关,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凯恩(Herman Kahn)与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分别指出,后期儒家思想中的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坚韧性、讲求工作伦理等等,曾发展出一套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现代化价值观。

王博士认为中国文化可贵处在于它有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相互调适,印度的是自然主义太多了,西方的是人文主义太多了,而中国文化则两者都有,且比例适当。爱好山水是中国艺术创造的源头活水,这亦提供人生的退路,中国知识分子强调的人生理想是“进则诸葛,退则渊明”,这种自我实现的精神,对现代化是有利因素。他认为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科技,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作用,这也就是日、韩、台、港、新的经济发展比马、泰快的原因所在,后二者中国文化的成分较少。

经纬船务公司的陈慧俐说,“东亚经济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经济文化,它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到儒家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形成今日的经济繁荣局面。

系列之四:

香江风云腾细浪

——香港 拼搏精神与契机带来成功

五月末端午节过后的一个黄昏,我沿着尖沙咀地带的海滨漫步,天气还相当炎热,望着维多利亚海港,高耸的建筑物比10年前多出好多座。香港文化中心坐落在海边,建筑格调很是脱俗清雅。已是初夏时节,可海港无论晨昏都笼罩着迷蒙的浓雾与云朵,海面却只有细浪在奔腾着。

弥敦道一入夜,依然灯光灿烂,二三里长的繁华街景,令人目不暇接。铜锣湾百货公司林立,食街一片喧闹。旺角在平民化气息中,也自有其繁荣的一面。太古城购物中心,是港人移山倒海的典型杰作之一。在寸土尺金的香港,此购物中心的宽敞架构及其所呈

现出的优雅气氛，教人叹服。

如果香港大学给人的印象是在古雅中有点杂乱，雨中的香港中文大学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了。香港理工学院与城市理工学院的校舍都很堂皇，香港虽是个靠出口轻工业产品为主的港口，它的文化气息至少不会比新加坡的淡。

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住着五百六十万人口的小地方，全无天然资源，香港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地步呢？

走访了日本、韩国、台湾与香港之后，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香港所面对的问题，不能说与日、韩、台的绝对没有相似之处，但香港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一九九七之后的信心问题。这疑虑就如维多利亚港上的浓雾，悬挂在每一个学者、专家甚至香港市民的心上，以至其他的问题都显得次要了。

受访学者不强调儒家思想

然而香港成功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我所访问的学者中，没有一人强调儒家思想，归纳起来，他们大多认为：契机与港人的拼搏精神，是香港经济成功的二大因素。当然，若单从勤劳拼搏是儒家思想美德之一，而说香港的成功与儒家思想有关，也未尝不可。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教授兼香港研究中心主任刘兆佳，很全面地谈及香港成功的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是：香港原本就是以出入口为主的港口，二次大战前已有一些工业，韩战时，美国对中国禁运，香港出口贸易受打击，被迫进行工业化，而其时中共刚接管中国不久，大批难民涌来香港，为香港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工；加上其时西欧战后大力发展经济，市场需求大，香港产品有了庞大的海外市场，香港工业因此因利就便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香港人很勤劳，而工人与雇主之间由于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等级关系，雇主较有权威性，且一般市民的储蓄率也高，因而使得香

港企业家能顺利冒出来。而且,香港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雇用人数不多,工人难组织起来,许多小企业是家庭企业,罢工事件非常少。再加上中国所出现的政治环境,使香港不敢制造动乱,因为一动乱中国就会收回香港。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配合香港人善于自我改变以适应外来的经济变化,遂使香港经济蒸蒸日上。

战后上海企业家带来机会

港大经济地理教授薛夙旋特别强调香港的成功有两大因素。一是香港在战后有从上海来的企业家,这些人带进资金与技术,使香港的工业起步快速。二是香港人工作非常勤快,且为人现实。另者,香港消息灵通,讯息发达,中小企业转换性快,能够迅速随季节性的改变而更换款式,如成衣、玩具、电子产品、塑胶品,都能快速生产,且变换款式。

薛教授曾作过调查,发觉香港许多企业家所拥有的学历,都不是主流职业所须具备的条件,这些人绝处逢生,破釜沉舟,在千难万苦中挣扎求存,终于出人头地。

家庭企业有促进作用

港大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黄绍伦则特别强调家庭企业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作用。他说香港的跨国公司资本只占15%,而中小企业资本占85%,香港的中小企业对香港经济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小企业,尤其是家庭企业,成员间的合作无间,是最佳的竞争力量,而且,由于规模小,分工细,灵活性大,完工时间短,香港轻工业可说所向无敌。以成衣为例,每个工厂只有二、三十名工人,有的专车衣领,有的专缝衣袖,有的只缝钮扣,这样一分工,再加上小厂员工少,大家通力合作,成品很快就完成。他认为西方学者往往忽视了家庭企业的竞争力,香港的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家庭企

业有很强的竞争力。

中国提供廉价劳工

由于香港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成长,都与外国及契机有莫大的关系,因而把属于经济成长的内因的儒家思想的作用掩盖得非常不明显。香港数十年来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长期提供它价廉物美的消费资料。有了这样的生活物质基础,香港才无后顾之忧而倾全力去发展经济,而在发展工业过程中,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们,竟是发展轻工业所最迫切需要的廉价劳工。70年代中期后,当香港的制造业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时,中国开放了,珠江三角洲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与土地,又支持了香港传统式的出口导向第一阶段出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香港在第二及第三产业上有较快的发展,并加速香港外向及出口型经济的增长。

外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决定性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因的儒家思想显得无足轻重的原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香港的成功与儒家思想关系不大。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东亚经济体系”都受到儒家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形成今日的经济繁荣局面,这论证揆诸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原因。也不能说不正确。

一国两制,香港是台湾的样板

那个夜晚我在九龙郊外一位学者的家中闲聊,他向我透露一个重要消息:香港从明年开始,全岛高中会考的所有科目试卷,或可以中文作答。现在教他疑虑的另一个问题是,那大学考试可不可以也以中文作答。

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名学者的解释是:香港人才不断外流,对香港的将来发展有不利影响。香港有必要培养一批具有现代知识、

科技知识与管理哲学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尽管知识丰富,英文却不那么灵光,这样一来,他们向外国移民的可能性就减少了。

不管这样的解释会不会牵强点,香港人才与资金的外流,的确是个不小的问题,由于一九九七问题,许多专才移民加、澳、美去了;资本家则持观望态度,只作短期投资,不做长远打算。

年轻人也重视金钱

香港年轻人对钱的重视程度不逊于年长一辈,但勤快程度已比不上上一代。香港企业也正面临转换期,香港能成功地从轻工业迈向技术密集工业吗?这也是香港学者、企业家特别担忧的问题。

中国收回香港后,报章能继续享有言论自由吗?中国高干若涉及贪污行为,廉政公署敢依法执行任务吗?中共中央政府会加以阻拦吗?这是胡菊人先生的疑虑。

香港的前途真的那么不乐观吗?英国保守派国会议员,中国与香港问题专家罗伯特·阿德利在其近著《香港全变后》一书中,对此有非常透彻的剖析。阿德利认为,任何人若搞任何行动伤及中国的面子,中国就会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地“毁灭”香港;否则,中国会继续让香港繁荣下去。

香港研究中心主任刘兆佳教授,对香港前途也甚乐观。他说,是有一些港资外流,却也有大量日资、美资、台资甚至新资涌进。而且中国开放政策并没改变,香港是大陆的出口市场,大陆则是香港廉价劳工的供应地,减少了香港工业转型的痛苦。大陆利用香港发展对外关系,美日等国也利用香港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香港的重要性日益加强。香港虽有人才外流现象,但较年轻的人才可升上来补充空缺。且一些专才如医生、律师,也可从其他共和联邦国家延揽。

特区也是样板

香港中华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兼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对香港前途更有其独特看法。他说沿海特区是中国特辟出来的样板，这是做给香港人看的样板；而香港的一国两制则是做给台湾人看的样板。日本专家曾剖析中国开放沿海特区是中国想通过提高沿海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吸进台湾的手段。潘先生对香港的五十年维持现状的看法，与日本学者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我接触到的一般香港人来说，他们似乎相当能接受一九九七的到来，他们心里虽有点担忧，却相信事态还不至于如以前所想的那么坏。只是，当我飞离启德机场时，黄昏的维多利亚港的愁云还一直悬挂着，完全没有消散的迹象，不过，海面却只奔腾着细浪，看来香港是应该不会有暴风雨的。

总结：将儒家美德揉进工业社会

综观日、韩、台、港学者、专家、企业家对此四国家或区域的经济迅速成长的想法，我们可以这么下结论：从文化上来说，此四地带均受中华文化程度深浅不同的影响，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德目，无疑地也是这些地带的人民的生活信条。

我们或许无法解释儒家思想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为何却等到近 40 年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带经济才会蓬勃起来。我们只能笼统地说，东方文化的基本上倾向与大自然融合为一的特点，与西方文化的要征服大自然的特点，是两种文化灿烂后必然会出现一注重人文，一偏重科技的原因。西方的本诸于上帝的伦理观念随着科学的昌明而衰败，与东方的求诸于己的道德观念的日久常青，或者可以相辅相成。东方社会工业化后出现儒家思想有些德目不

合时宜的现象,就如欧美新近佛学盛行而部分人民感到人生虚妄一样不会教人感到惊讶。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美德,曾促使我们命题中的地带经济迅速发展,这是事实,但无须为此感到自豪或自我陶醉。工业化后社会要扬弃儒家思想,而又无法移植进新的社会伦理观念,不只是台湾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日、韩、港、新也不能幸免。

台湾的推行第六运动,台湾学者的多方探讨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伦理观念,如何在旧有文化传统上找出新生之路,都有足供我们借鉴之处。全套儒家思想的套用,显然不切实际。全盘西化,欧美的一些社会弊端又足以教我们引以为戒。

台港师范大学列四书为教师的必修科目,那完全是重视传统文化的说明。不同的社会背景的新加坡,自然不可能这么做。但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所扮演的预感角色与表率作用,却不容我们低估。韩国成均馆大学列儒学为大一学生选修科,这样的做法对韩国社会道德起了什么积极作用,我们也应研究探讨。

中国哲学思想发源得很早,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齐鸣,唯独儒家能成为华族思想的主流,绝非偶然。儒家的“达到兼利天下,穷到独善其身”处世哲学,有其坚韧性与灵活性;三不朽思想则是当前自我实现精神的支柱;这二者可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如果说日本经济转型期已过去一大半,韩、台、港、新则正处于转型期间。日本工业虽然顺利转型,但并没能巧妙解决社会问题,年轻一代的不那么勤劳苦干,就是个很叫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韩、台、港也存在着。源于农业社会的勤俭美德,在富裕工业社会中将逐渐消失,似乎是无可奈何的事。

那么,我们与其花费精力探讨儒家思想对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倒不如多花点精神,研究如何把儒家思想中尚有存在与发扬价值的德目糅入工业化社会中去。

有责任对日本提出批评

《朝日新闻》在8月15日曾出版一个终战纪念日特辑,中国、新加坡、韩国与菲律宾的四名新闻从业员受访谈论有关日本的问题。除新加坡的泛亚社会陈加昌的看法较为古怪外,其余三名报界人士都对日本对待历史态度与其今后动向有所顾虑。对日本有顾忌,是一般亚洲人共有的特征,原因错综复杂,但大致来说,不外是由于日本对待历史、对待战犯的偏差态度所造成的。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以展望未来为主,只是两国之间过去若有恩怨,而理亏的那方却死不认错,就难免教另一方心存芥蒂,致使双方关系难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与任何亚洲国家的关系,便有此种现象。这怪不得别人,日本若要突破这种僵局,只有诚心诚意检讨自己的历史观与对待战犯的态度。

我们并不能说日本与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关系最良好,因此该亚洲国家的国民就可抛弃原则,不谈论日本的不是。新日关系是良好的,不过,作为在战争中是“受害国”之一的新加坡,其国民对日本在处理一些与新加坡有关的问题的偏差时,是有权力批评的。这种批评并不应该会成为导致两国关系不好的原因。抱有此种忧虑的人,至少犯上两个错误,其一是,忽略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来往,在原则上并不以大小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否则,小国就会沦为大国

的附庸；其二是忽略了友好国国民的批评，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事实。

新加坡公民在批评任何事物时，自然应以新加坡利益为大前提，但这不等于说，新加坡公民在批评日本的某些动态时，不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国民有一致的立场。尤其是在批评日本二次大战的侵略史实时，凡受日军蹂躏的亚洲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因此在许多评论上，新加坡公民与其他亚洲国家国民的观点会相当一致，甚至互相声援，就一点也不教人感到惊奇了。

广岛、长崎民众每年举行“原爆纪念”，作为有良知的人们，我们也深为这些受害日本人及其后裔感到悲痛。不过，日本当局由于没正确处理史实，致使不少日本民众只会哀悼广岛、长崎的遭遇，而不知同情在此场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亚洲国家民众。另一方面，日本内阁成员，这些年来又每年例必到靖国神社拜祭战犯亡魂，更激起有识之士的愤怒。日本军力已相当强大，日本当局的一些行为教人反感，而日本部分民众只会自我悲怜的狭隘心胸也教人担忧，作为日本友好国的新加坡，其国民是有责任对日本提起批评的。

许多问题不谈论，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正由于新日关系良好，我们对日本的一些偏差，无论是政策上的或技术上的，只要与新加坡有所关连的，我们都会进行善意的批评，这到底有利于两国人民友谊的进展。

广岛原爆纪念会的意义

每年在8月6日与9日,广岛、长崎例必举行原爆纪念会。今年在广岛举行的纪念会似乎特别教人注目,除日本首相中曾根与美国前总统尼克逊谈及原爆问题外,里根总统为美国当年轰炸广岛而进行的辩护,也颇具新闻价值。

广岛与长崎的受原爆残害人士,都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由已公开的资料看来,倘若当时美国没在此二城市投下原子弹,那要迫使日本投降,恐怕盟军与日军的死亡人数会远远超过遭受原子弹杀伤的人数。以二城市相当大部分民众的生命来换取和平,这代价可说是很大的,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却又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我们在同情受难人士的同时,却也得追究发动战争的刽子手是谁。而且,人类还得从中吸取教训,历史才不会重演。广岛与长崎的原爆纪念会,若沦为纯粹的死难人士追悼会,那是忽视史实的作法。

该负起最大责任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人士,太平洋战争基本上是由这批人挑起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神风突击队炸沉多少航空母舰、巡洋舰、运输舰与重要军事设施?盟国处处处于挨打状态,多少无辜的世界民众死于非命,军国主义为害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命之大,可说史无前例。从此观点来看,炸广岛、长崎虽然相当残忍,但

若一任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嚣张下去,则善良的各国民众都将遭受无妄之灾。因此,炸广岛、长崎可说是军国主义迫使美国作出的行动。追根究底,罪魁祸首还是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

日本某些顽固分子,战后以来一直隐瞒此段史实。日本历史教科书,在此段史实上也一再篡改,到目前为止,还不肯坦然承认军国主义者的穷凶极恶,加上一些反映此段历史的小说或电视剧,又任意颠倒是非,怎不教一部分日本民众受到误导呢?

原爆纪念会若再进一步发展为仇视美国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那就不只是日本的悲哀,也是人类的不幸。每一桩历史事件,都必有是与非之分,广岛与长崎的被炸是日本的咎由自取,值得我们同情的是,无辜的日本民众也与军国主义者一起受难,但这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事。

日本政府若真的英明,它应该诚诚恳恳谴责当年军国主义者的劣行,并编写符合史实的教科书,使日本的年轻一代能从中吸取教训,明白是非。这样做不只能促使日本更容易取得世界各国的信任,也是爱好和平人士的福音。

遗臣怀旧情绪难以教人忍受

平和君、迷惑君与陈加昌君有关昭南遗臣来新的论争，至少让我们看到新加坡公民在对待日本南侵史实方面有相互不同的看法。

战争已结束了 41 年，往事虽然已渐渐被人淡忘，但历史教训却不可遗忘。我们不赞成把过去的过错归咎于日本年轻一代，也不会毫无原则憎恨所有的日本人。因为即使是当年为虎作伥的日本兵士，也有部分是在无知的情况与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而干出伤天害理的事。这类人虽为罪人，其罪过显然并不会比有意识地干坏事者来得深重。

但我们不敢苟同以德报怨哲学，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对已悔悟的罪人，只有增加他们心灵上的痛苦，对毫不后悔的罪人，只能助长他们当年的嚣张气焰。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固然是华人的美德，但也要看对方是什么人而定，对罪不可逭的罪人，待之以妇女之仁，到头来吃亏的只有自己。

战后 40 年来，亚洲各国对日本南侵史实基本上并没刻意渲染，日本经济势力也已深入地渗透到亚洲各国。经常挑起亚洲民众的悲痛情绪的，倒是日本国内那批阴魂未散的军国主义残余分子。

这批人死不认错的可憎嘴脸，不只亚洲民众深恶痛绝，连日本

国内的有良知有卓识的民众也口诛笔伐。这批人在处理史实上是以窜改为能事，以美化战争为手段，干的是美化自己丑行，诋毁他人的正义的勾当。因极尽诬蔑之能事而丢官的日本教育部长藤尾正行，便是此类人的代表。

“昭南特别市”遗臣南来访新，其真正动机何在，尚待进一步调查。但他们一行15人浩浩荡荡在市政厅留照，大发其思古之幽情，怀旧之愁绪，对任何有民族与国家自尊的新加坡民众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个人的功过自有定评的标准。昭南岛时代的日本文武官，在残害新加坡民众方面是一样有过错的，差别的只是直接迫害与间接迫害的轻重问题，而没有所谓明暗之分。侵略者对反侵略者自有残害的理由，但不论侵略者的理由是多么堂而皇之，它都不能为有正义感的人士所接受。侵略者的辩白，自有为历史提供反面教材的作用，但在介绍此类文字时，却须作个清楚交代，否则就有可能误导民众。

“昭南特别市”遗臣要南来，那是他们的自由，但南来而又要怀旧，就难免要挑起我们的悲伤回忆。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曾是侵略者的帮凶的遗臣，公然在市政厅前流连徘徊，是有碍观瞻与国体的。

遗臣南来怀古有其历史根源

战后日本因历史问题而经常与亚洲各国闹得很不愉快，这在世界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现象，究其原由，主要的不外乎两点，一是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在日本政坛上依然深具影响力，二是日本当局始终没诚意妥善处理它在二次大战期间的那段侵略亚洲史实。这两大原因是互相牵连而又不可分割的。然而，由此而带来的恶劣

影响,却是既巨且深的,它即可破坏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关系,也会损坏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深究下去,日本歪曲此段史实的行径,为自己本身所带来的损失,恐怕比对邻国所造成的损伤更为深重。

日本当局一而再,再而三掩饰、歪曲它的侵略亚洲历史,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日本年轻一代对此段史实全然无知,或一知半解。这对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很不好的影响。这严重后果是少数在政坛上有影响力的军国主义残余分子造成的,但这不只是问题的一面,更严重的是,此批家伙还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为历史翻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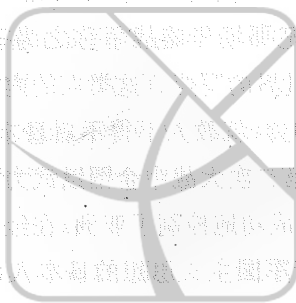
美化侵略战争,把那场侵略战争称之为圣战,把战犯视为英雄,是这类人的内心世界的写照。这类人的内心世界既这么龌龊,在政坛上又具有影响力,就教人不得不对日本的政治动向特别关注了。如果说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企图以武力征服亚洲是失败了,在战后它却在经济上成功地控制了亚洲。在经济上控制了亚洲,使一些脑袋中还残留着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人,难免要踌躇满志睥睨亚洲民众,于是建立圣战纪念碑者有之,南来怀古者有之,甚至公开诬蔑别国的事也出现了。

由于日本一般民众无法在学校中接受该段史实教育,在日本还有一批具有自我怜悯心态的战争受害者。每年8月在长崎与广岛举行的原爆追悼会,便是其例。我们深深同情长崎与广岛的受原子弹损害的日本民众,但不少日本民众只看到本身蒙受的苦难,而没能看到亚洲民众在日治时期受到的蹂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此偏差的产生,与日本民众对历史的缺乏深入了解不无关系。

日本战后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波三折,除了经济与贸易方面的矛盾外,日本当局对待历史的不诚恳态度,也是个重要因素。此二大因素已使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中。然

而,由于具有残余军国主义思想者在政坛上仍有影响力,而它的经济结构又使它无法在短期内与其贸易伙伴国解决矛盾,因此在今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在国际上还是会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中。

由此观之,前昭南市遗臣会南来怀古,就不足以教人惊讶了。归根究底,这只是军国主义残余分子掩盖与歪曲历史的一种后遗症。我们相信日本军国主义要复活并非易事。然而他们在政坛上阴魂不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足以破坏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这代价不可说不大。



让更多日本人知道史实

日本个别学者撰写有关二次大战日本南侵史实的史书，早已不是新闻，有良知的学者这么做，至少让受害者及其后裔看到大和民族善良的一面，我们也时常希望这种代表真理与正义的力量，会一天天壮大起来，把颠倒了的是非扶正过来。因此，最近新闻报道有关东京私立正则中学教师与学生翻译我国历史教科书一事，就特别教人关注了。

日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对有关日本占领与蹂躏东南亚各国的史实，一向避而不谈，或只避重就轻掩盖过去，这所造成的恶果很大。一是日本人绝大部分不知道其祖先在二次大战中曾犯下什么罪过，二是造成日本人只知一味责怪美国人轰炸广岛与长崎，而不知道日军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所屠杀的民众为数更多。

这些年来，由于中国、韩国的严重抗议，日本侵占此两国的史实，一般日本民众多少也耳熟能详，对此段史实也多少略知一二。但东南亚各国遭受日军蹂躏的史实，由于较少人谈论，许多日本人对此还是懵然无知。正则中学师生合译有关日军侵略新加坡史实的篇章，就特别有意义了。

日本人始终无法在亚洲各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只与它在二次大战期间犯下的错误息息相关，也与日本民众缺乏此方面的历

史知识有关。日本民众由于不知道过去的历史,而又逐渐富裕起来,就难免错误地自以为亚洲人民的仇视日本,是妒忌心理造成的。最近的趋势则是,日本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闻过则惧,而是以牙还牙,对欧美采取限制日货的措施,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态度。这种态度若发展到对待史实方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日本人不知道史实还有另一恶果,那就是只会责怪别人残忍,而不知日军在战争时期是多么没有人性。加上日本有关当局的有意误导与刻意美化其黠武主义者的丑行,就更使一般日本民众相信在二次大战中日本是受害者。

日本历史教科书避而不谈其侵占他国的史实,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既广且深。它使在战争期间曾直接或间接参与丑行的军国主义残余分子能在社会上立足,甚至呼风唤雨;它使日本人没法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信任;它也使日本人无法摆脱遭人欺负的阴影,而从较广阔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它更使日本无法扮演政治大国的角度,因为世界人民不敢接受无法与过去的错误割断关系的国家。

正则中学的做法算是在黑暗的斗室中戳出一个洞,它至少让一小部分年轻人有机会认识日本的该段史实。日本如果多了一些像正则中学那样的师生,那日本人就有可能逐渐了解该段史实,而这不只是日本人的福音,也是世界和平的佳音。

日本的美，像往事一般凄迷

日本就像是一盆精致的盆栽，它的美是那么地集中与耐人寻味。要品赏日本的美，不只应该注意季节对名胜的衬托作用，也该关注晨昏对景物的影响。

日本许多名胜的古庙宇，都建得古朴典雅，呈深灰色，可在初春雨后，在万木嫩绿叶子的映照下，古庙就诗意盎然了。要是在深冬万木尽秃、乌云低压的阴天里，你跑去看这些古刹，那感觉就像喝特浓咖啡不加糖一样苦涩。

在初夏的黄昏游浅草最为理想，那时候太阳落得迟，在长达半公里的商店街店屋檐的红灯都亮了的时刻，夕阳的余晖又为浅草添上另一层鲜艳色彩。在两旁尽是小商店的狭窄通道上走着，随风而来的东洋小调与红灯笼及落日残照塑造出的苍茫美，会把你带入古老回忆那么邈远的意境中去。在人潮里浮呀浮，要是有点疲倦了，不妨与朋友在有顶无墙的小食店吃点东西，喝点啤酒。在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由小食店外望苍天，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断肠人在天涯的滋味。

四月中旬春寒料峭，经常春雨绵绵，若在雨后到上野公园赏樱，最是人生乐事。雨后空气特别新鲜，雨珠残滞在樱花瓣上，随风而掉落在树丛下人群身上。放眼一看，一望无际的雪白樱花如云似

霞，把上野点缀得像个仙境。你不用急着和别人一样赶着去参观上野动物园，而可折向小湖边看人划船游乐。初春柳树已抽芽，雨水把草木洗刷得玲珑剔透，藏在远处的灰色古庙里被一片嫩绿烘托得特别有生气。你可以单独一人枯坐湖畔一角，思索一些人生问题。在初春雨后的凌冽的空气里，许多恼人的问题都会想得通。

箱根与日光都是山，但它们给人的印象却全然不一样。箱根的绿，即使在严冬里，也浓得化不开，它好像一位倩女站在高处对你微微一笑，那笑意使人刻骨铭心；日光的红叶的绛红，却恰似惊鸿一瞥的情影，具体影像难以捕捉，那刹那的美却弥留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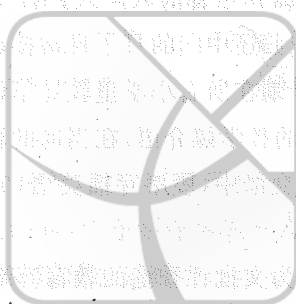
箱根什么季节去都好，强罗公园的翠绿几教人怀疑身在热带，不同的只是天气颇冷；早云山就更是翠绿得教人快要不能呼吸了。日光的东照宫很有中国建筑的辉煌特色，华岩瀑布的雪白，配上山壁上的红叶的斑驳，都显得难以捉摸，因而也就更具朦胧美了。

在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寂静街道上，有一位托着钵的高僧慢慢自远处走来，远处的庙宇钟声响了，泛起的邈远美像暮色一样迷茫地撒落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镰仓八幡宫前的那条长达半公里的樱花在两旁掩护着的散步道，就具有这样教人神往的韵味。镰仓的吸引人，不仅仅在那尊铜塑大佛与零零落落的小庙宇上，镰仓的美全在于它似在河畔洗衣的村姑，朴素自然。你在镰仓的任何一条小径走，只要周围没有游客，那就如走在刚刚出世的世界一样宁静，空气新鲜得无法形容。

京都兼具清雅美、肃穆美与邈远美。渡月桥下流水淙淙，远景是岚山的蓊蓊郁郁的树林。一上了山，悬崖绝壁有红叶，谷底雪白涧水映着淡黄的小花，真是一幅淡雅的写意画。京都五步一庙，十步一寺，但每一寺庙都具有本身的特色，什么是肃穆气氛，在这些寺庙里可体味一二。夜晚的京都的繁华街是迷人的，笔直的街道旁的商店的灯饰散发出来的光，透着浓浓的历史情调，呈现出一种邈

远美,使人流连忘返不舍得离去。

日本的美已融入文学、绘画、建筑等艺术中,要细细欣赏日本的美,不但要心平气和,而且如果对各部门艺术有些知识,那效果会更好。如果到日本只去百货公司购物,那就虚此一行了。



香港人在语言上的困境

法新社最近有篇介绍香港人陷入方言与英语困境的文章，很耐人寻味。随着香港归还中国的日子日益接近，华文在香港的地位日愈提高，教育部计划在所有小学里教导华语，另外有些教师则主张以广东话为中学的教学媒介语。在当前的现实里，则产生中层阶级在日常的广东话交谈中，屡屡穿插英语，或在英语谈话中，频频加进广东话。

几年前已有人为文批评香港的教育弊端之一是，一般民众在日常工作中所使用的英文，都是公式化的、粗浅的，且与香港市民的日常用语广东话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由于广东话不如华语有丰富的文字作后盾，民众也就不能由广东话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其结果是，民众只能以英语进行思考，致民众丧失了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

讲方言与学英语所产生的弊病，香港的惨痛经验有供我们参考之处。方言虽可通过华语不断吸收新事物的名词，但却比通过华文来吸收新词汇多了一层隔阂。香港中层阶级人士在用广东话谈话时得穿插英文，才能畅所欲言，就足以说明方言原有词汇无法表达所有的新事物。一种词汇不足以表达所有现代事物的语言，且又没文献作其支柱，以它来作为思考的工具，在效果上总比不上语文

具备的好。

自然,香港人会遇到广东话无法完整地表达新事物或专有名词情况,这与他们在中、大学的大多数科目都用英文课本有关。不过,他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是讲华语的话,则由于华人在引进新事物时已有约定俗成的译名,那么,在谈话中就可直接引用之,即使偶尔引用尚未有华文译名的英文名词,随着华文译名的出现,也就会以之作为标准的。

不过,香港人由于广泛使用广东话,又不能有效掌握英文,以致不能深入思考问题,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自然不能说不能以方言来思考问题,而只是说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法有效以英文作为思考工具的同时,我们若又广泛运用方言,致使不能逐渐深入了解本身的文化背景,那我们就会沦为缺乏深入思考能力的一群。

香港由于即将归还中国,致使英文至上地位受到质疑,华语地位受到重视,然而与此同时,广东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也受到鼓励。这种局面的出现,自与香港的特殊社会环境有关,与香港比较,新加坡由于提倡讲华语,说华语的风气已很普及,总有一天会达到绝大多数人在任何场所都说华语的目标,我们当前常遇到的现象是,在华语交谈中穿插不少英文词汇,以致破坏了华语的纯粹美。

隔着一层雾的欣慰

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执着地热爱本族文化，不可说不是
一种宗教信仰。我常常纳闷不谙母语的华人，忙忙碌碌于学习英文
以外的另一种外文，为的到底是什么？

对我来说，学习一种外文，是既艰苦且收效不大的事。虽然一
入学就学英文，且花了好几年的心血去啃读日文，但如今读起以这
两种文字书写的文章，仍还是感到似乎隔了一层薄雾，始终没法窥

见藏在文底的美好所在。要一览此二大民族的文化深奥，即使穷尽我所剩余的生命，我看还是徒然的。

人生只短短数十年，以外文为生活工具，又以外文为摄取精神生活工具的人，他们有什么遗憾吗？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文明终有一天会随着地球的自然死亡而毁灭，那以外文谋生者若能取得丰富物质享受，又何必斤斤计较于自己对本族文化一无所知与无所贡献呢？

这看法自然能自我解脱，但一个人在一生中若缺乏本族文化的滋润，难免要感到枯燥无味。在认识本族文化之后，再学外文，就往往能从外族文化中看到本族文化的不足，但也能因此体味到本族文化的优点来。这种从比较中体味到的欣慰，是比教徒在朦胧中看到天堂，更为具体与充实的。

我不知道以外文为第一语文，而又不通本族语文的人，是否也有这种欣慰。但从个人的经验来判断，却认为即使能有，那也是隔着一层雾的欣慰。总不比以母语为第一语文者所捕捉到的欣慰来得具体与可靠。我因此认为，没宗教信仰的人，不妨以热爱本族文化为其信仰。

1983. 11. 11

自我反省

一般人谈论华文的价值时，总爱以它能帮助我们保留传统文化或传统价值观为论据，这其实是很片面的看法。华文如果只有这点价值，那不只是华文必然没落的内因，连带地也会使只懂华文的我国民众，永远在生活上或思想上落后于懂得英文的民众。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还有各门各类的古典著作，固然是懂华文的人可吸取知识的源泉，但更重要的是，懂华文又兼懂外文的人，要能把欧美日等先进国的各个领域的最新知识介绍进来，这样做不只是能够向只懂华文的民众灌输新知识与新思想，也是使华文枯木逢春的作法。

如果我们舍此正道不走，而以落后的方法在故纸堆里钻研，或大力宣扬看风水、选黄道吉日等等落后思想，那就不仅仅是在窒息华文的生机，而且是在促使只懂华文的民众的思想更为落伍。

一个人的生命很短暂，精力也很有限，倘若他学了华文，只能阅读到一些古典文学或宣扬迷信思想的文章，又何苦来哉？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与其整天在感慨华文受冷落，何不自动反省，自己到底是在窒息华文的生机，还是在为华文开拓生存之道？

1983. 11. 22

时间因素

仔细观察我们的国民，大致上可划分为有忧患意识与没忧患意识这两大类。前者关心国家，关心母语的前途；后者则只关心个人的前途，家庭的前途。这两类人，若让他们各自发展下去，他们是会成为同一岛上的俨然是两个星球上的人。他们既永远不会有共同点，也不可能有精诚合作的一天。

然而，只要有忧患意识者能看得开，能在忧患社会大事的同时，也多注意做些自我解脱的工作，他们是会生活得较愉快的。我不是鼓励大家自私，而是认为在对待只有我而没别人的自私自利者时，我们不用过分痴情，过分操心。

时间有时是考验事物好坏的不可或缺因素，能预先看到将会出现的社会问题的人，若没能同时考虑到时间因素，那他们就会很苦闷的。因此，有忧患意识者的解脱苦闷之道是，在没忧患意识者还没有清醒过来前，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来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如果你认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要耐心等待迟悟者的觉醒，而在等待期间，与其焦虑万分，不如做些有利自己身心的消遣来打发时间，“躲进小楼成一统”，固不失为解脱之一道，到处去观光解闷，也是很逍遥自在的。

懒汉推论法

记录片《日本》在第五波道播映过了。这片子表面上看来是在赞扬日本的科技成就，其实是在讥讽日本人缺乏创造力，由文化到科技，要不从古代的中国输入，便是由现代的欧美引进。片子说明撰写人鄙视日本，是很能代表欧美某些拥有种族优越感的学者的心态的。

大和民族的确是有模仿性强而创造力弱的特质的。日本人的文字源自中文，词汇则中、英、德、葡等国的名词兼容并纳。日本从古到今，也还没出过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从这点来看，日本不只在科技上缺乏创造性，即在思想界也没创见。但如这部记录片那样把日本人的缺乏创造性，归咎于他们的使用汉字，却是武断之见。

不久前李约瑟在国大演讲时就曾指出，欧洲的封建制度是实行尚武的贵族政治的，其后资本主义抬头，而工业革命又爆发，因而推动了科技发展。但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家社会地位不高，受雇于高官显要，并随从高官到处奔波，因而中国科技落后了，但这绝不是汉字造成的后果。

李约瑟比一般欧美学者高明之处是，他能从社会制度与历史背景方面，来分析一个民族科技落后的原因。社会现象错综复杂，任取其中的一个现象，并用来解释一个大问题，固然也能自圆其

说,但难免要失之以偏概全。日本人采用汉字,竟然是限制了他们发展创造力的原因,这也正是懒汉式的推论法的论调。

1983. 12. 7

[illegible]

蝙蝠人

缄默是金，这西洋谚言未必全然正确，但对爱发议论而又没胆识者来说，却是必须遵守的座右铭。好议论者是无事不批评，无物不指陈是非的，不过由于本身的分析力差，又怕得罪权贵，有时就难免要露出奴才相来，在讨好权贵的同时，竟然骂起自己人来。

胆小议论者不同于歌功颂德者，但有时比后者更可恶。他不敢开罪名人，却又爱发议论。有时他的议论只是重复名人的伟论，但在引述时却又加入己见，表示比名人更高明，然而又怕因此得罪名人，在这情形下他就会倒过来骂骂自己人。兼具奴才的胁肩谄笑与名人的教训口吻，这是胆小议论者的可憎面目。

胆小议论者又爱出风头，在学历比他低，年龄比他小的年轻人面前，他会滔滔不绝发伟论，详述他的丰富见闻，藉此争取崇拜者。唯其如此，胆小议论者有时候会是年轻人的导师，原因是年轻人热情单纯，看不出胆小议论者的真面目。

但胆小议论者不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人，他的缺点是爱发议论，且在发议论时又把握不住是非曲直，往往在规避招惹名人的厌恶时，倒戈一刺而置自己人于死地。因此，胆小议论者给人的印象是非飞禽非走兽的蝙蝠，无以名之，就叫他蝙蝠人吧！

1983. 12. 30

地方戏剧有看头

看《百花公主》，听不懂海南话，但演员唱做俱佳，再看唱词与情节的简要说明，居然也欣赏得津津有味，可见地方戏剧到底是民间艺术，生命力强，能深入民众，富民族色彩。因此，我想即使新加坡华人有一天都不讲方言了，地方戏剧也不一定就会消失的。

地方戏剧的融歌、舞、唱于一体的特质，是它比话剧更能吸引人的地方。但本地的一些地方戏剧，走入以庸俗与低级趣味对话来哗众取宠的旁门左道，却无疑的是地方戏剧自寻末路的做法。

地方戏剧的戏目中，也有些是专门歌颂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这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但像《百花公主》这样歌颂爱国意识的戏目，却是万古常新，不分时、地都会受民众喜爱的。

好的地方戏剧是演员的突出演出，情节的紧凑进展与主题的含蓄呈现。欣赏一出精彩的地方戏剧演出，不只眼福不浅，耳朵所感受到的美感，也真是三日不忘。更重要的是，由剧中正面人物那儿所感受到的精神教育，似乎能使自己更有信心面对现实中的牛鬼蛇神。

我们不是在提倡道德教育吗？照我看，若能推广诸如地方戏剧的民间艺术，让民众从艺术中吸取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对道德教育的成效一定会有促进作用。

1983. 8. 6

惧怕外国人

单单从《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来看外国势力胆敢入侵清末的中国,与其说是殖民主义者的胆大包天,不如说是清廷皇帝与文武百官的颞顽无能。江山在手,皇帝不思发愤图强,而只想醉生梦死;大权在握,朝廷大小官员,不想进谏改革,只图混水摸鱼,安享天年;这样的国家怎能不灭亡!

把外国人称为蛮夷,以龙种自居;把外国的军火视若无睹,以血肉之躯去迎战;迷信邪术,迷信所谓的浩然之气,不在武器上现代化,清廷那能不割土赔款?

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大小百官,只会对自己的国民颐指气使,见到外国人,则惧怕万分。欺压自己人,惧怕外国人,清廷哪能不亡?

丢下老百姓,皇帝与大官员在千骑保护下逃离北京,到乡野避难。在危难关头不思救国,只想逃生,只想保护个人的荣华富贵,咸丰皇帝宁非自取灭亡?

1983.11.3

横的多点目标

造谣中伤是人的劣根性，也是妒忌心理的表现。任何人若无法摆脱妒忌的纠缠，他不仅生活得很苦闷，也永远不会力求上进。

看到别人有成就，不力图另辟蹊径以求自己有更突出的成就，却到处造谣中伤别人，这是弱者的自卑心理的表现。

善妒忌者仅只是看到纵的目标，还往往只盯着一点目标。目标既然只有那么一小点，一旦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善妒忌者就只有靠中伤别人来夺回目标，或自我解嘲。前些日子有人大声疾呼为死人登挽词，是显耀财富的恶劣作风；最近又有人中伤羽球教练写专栏，是为赚取外快；这些言论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其实说穿了，都是妒忌心理在作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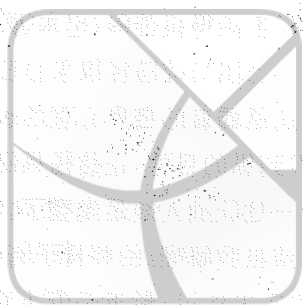
宇宙其实是很大的，人生的目标也多若星星。要是能从横的方面去看目标，则妒忌心理就不会产生。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发挥己之所长，必能在事业上或工作上有所表现，一味妒忌别人的成就，不仅夺不回别人已得到的目标，还会埋没自己的特长。

但环顾周遭，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认识与胸襟？因此，朋友反脸成仇，兄弟阋墙，同事互相诋毁，这种种现象的产生，其实都是只看到纵的一点目标，而看不到横的多点目标的弊病。

同行如仇敌，这是非常落后与迂腐的看法，也是造谣中伤的根

源。让我们跳出传统的、只看到纵的一点目标的藩篱，而从较广阔的，横的多点目标来看问题，这样做，我们肯定会生活得愉快点。

1984.5.23.



江山与爱情

《武侠帝女花》的剧情符不符合史实，那是史学家的考证工作。但即使剧情有不符史实之处，却不减我欣赏此套电视连续剧的兴趣。

在剧中两大女主角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长平公主较贤慧，而昭仁公主则较刁蛮。剧情进展到崇祯酒中下毒害袁若飞时，长平指责崇祯陷害忠良，自毁江山；而昭仁则用计救出若飞安置他在玄觉寺疗伤；我于此才明白长平的赏识若飞，为的无非想借重若飞保住大明江山；昭仁的喜爱若飞，虽属儿女私情，但却纯洁多了。

若飞犯上的错误是，误把长平对自己的赏识当作爱，而没看穿长平与崇祯在对待自己的江山方面，其实都是从可损人以保江山的利益出发的。

长平三番五次造访若飞，为的是要利用他来刺杀曹化淳，并非爱他，长平最后下嫁周世显，说明她爱的是在朝为官、能协助她父王保江山的人，而不是淡泊名利、尘土高官的江湖浪子袁若飞。

昭仁则三番四次不惜舍身救若飞，她并没考虑到若飞能不能协助她父王保江山。要说什么纯情，这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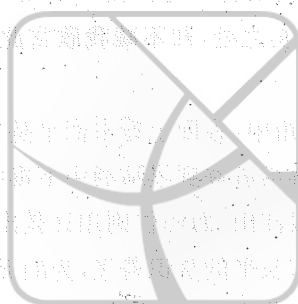
长平与昭仁使我想起薛宝钗与林黛玉。一个世故，一个纯情，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贤慧，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心胸狭隘，深一层剖

析下去,则谁是可爱的,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你是袁若飞,你应该毫不犹豫地与昭仁公主白头偕老。

1984.6.13

新城市



寂寞有时是成功的机缘

太过执着的人，往往会生活得很不愉快。对美好事物有执着的爱，这不能说是死心眼。但要看清周遭的人是否都有很高的认识，否则的话，若只一味希望别人也和你一样热爱美好事物，那是很痛苦的。

执着热爱美好事物的人，若没宗教信仰，在此时此地，他应把他所爱的事物当作宗教信仰，但与此同时，却不可像教徒一样向别人传教。不然的话，他就会有知音何处寻的苦闷。

想想郭沫若流浪东京钻研文字学的乐趣，想想鲁迅伏在书桌研究古碑的情趣，想想闻一多躲在小楼背古书的欢欣，寂寞有时会是你成功的机缘。看远一点吧，把你的成就呈献给全人类，这样你就会较开朗的。

不用随波逐流，这样做必会丧失掉自我。但也不用勉强别人爱你所爱的事物，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但历史有时是会错误百出的。倘若你无法改变历史，那只有在寂寞中做你应该做的工作。只要你的工作对全人类有好处，你就是生活得有意义。

多出国旅游是好的，但不单为解闷，而更为开拓心胸。任何人的成就，包括艺术文化与科技发明，都属于全人类的，你又何必为一小撮人的不热爱任何你所热爱的事物而长吁短叹呢？

1984. 5. 28

向往乡村生活

每每读到描写乡下生活的文章，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我的一位同事描写他在福建乡下的童年生活情景的文章，很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与我在五十年代的这儿的乡村生活很相似。除了气候有差异外，他与我的童年生活竟然如出一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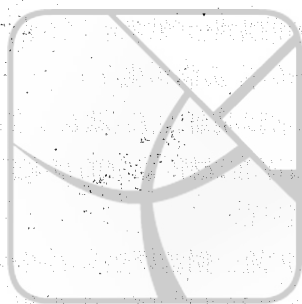
乡下的物质生活是较贫乏的，但孩子们似乎生活得很多姿多彩。最大的欢乐源泉来自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孩子们可藉着抓鱼捕鸟，采果子，在大水沟里学游泳，在番石榴树下吹笛子等等玩意儿来逍遥一天。

现在住在组屋的孩子们，物质生活是丰富多了，但自幼就承受功课的压力，又没机会与其他同伴在大自然里逍遥，最多只能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我不知道当今的孩子们的感受如何，但自忖他们是很可怜的。

人似乎是脱离不了大自然的，这应是动物的本性之一。都市化一个无可避免的后果是，把大自然美肢解了。肢解后的大自然美原本就够淡薄的，更可糟的是，在都市化的环境生活的人们，又很容易犯上功利主义的毛病。这结果就形成以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送孩子去学游泳是为了锻炼身体，学钢琴是为了提高身份，学

芭蕾舞是为了显示优雅。于是，孩子们的生活中就只有责任，而没玩乐的情趣，我为此向往我的童年。

1984. 5. 31



傲 骨

郁达夫的“江山也要文人捧，柳堤于今犹姓苏”诗句，的确是最能勾勒出文人对社会的无形贡献来的。但郁达夫生逢乱世，流落印尼时，也只好改名变姓，靠卖酒为生了。

不过，郁达夫之所以是郁达夫，就在于他有那一副傲骨，倘若郁达夫要卖身投靠日军当汉奸，以他的日文造诣，又何致于沦落酒肆，过店小二式的生活呢？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倘若郁达夫卖身投靠日军，他的荣华富贵就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风消云散，任谁也不会记起他来的。

由郁达夫的这两句诗句，我们真的可看出文人对社会的贡献来。但由郁达夫的悲惨下场看来，却又说明文人如果想作时代的谏臣，就只好牺牲个人的荣华富贵了。

而且，现实是很无情的。它竟然把文人的社会贡献与文人的傲骨相接合起来，从而使得文人倘若一舍弃傲骨，他也就会与草木同朽。

1984. 8. 16

长叹是抒情方式

哀叹并不一定是消极的，从艺术效果来看，悲剧对民众所起的唤醒作用，倒往往比托空的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喜剧更具教育意义。

华族喜爱大团圆，这种乐观精神固无可厚非，但若流于老套，就难免把事物简单化了，并从而产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只求精神胜利的没落思想。清末朝廷的衮衮政要，何尝不是以乐观精神把大好江山割让给外国呢？

比起带有麻醉作用的、不合情理的大团圆，我倒是更欣赏日本文学作品或电影的悲剧结局。一位研究人类学的朋友曾对我说，日本人是悲剧色彩很浓的民族。大和民族以樱花为国花，取的是它生命虽短暂，但却能大放异彩的特点，就很具体地说明了这点。因此日本人多以自杀来解除受辱，而不以忍气吞声来换取苟活。

华族以梅花为学习榜样，取的是它不畏严寒的精神，但若把此精神误解为苟且偷安的乐观态度，那清末的割土赔款事件将会层出不穷。长叹有时是时代的基调，倒不一定是坏事。屈原与宋玉的时代，要不悲秋，要不哀郢，能唱豪情万丈的歌吗？

在万马齐喑，寒蝉若噤的时代，哀叹是唯一的抒情方式，认识不到这点，就很容易在所谓乐观的温床上死去。

生活哲理

因为怕这次远游回来中国影片都映完了，这几天就拼命去看电影。结果有两点较新鲜的感受：一是观众似乎较中国电影考察团来新前多得多了；二是感到中国影片也能给我生活启示。

中年人不仅感情渐趋平淡，也麻木多了。写不出激情澎湃的诗，那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写散文，也往往是阐述哲理多过抒发情感。心情到这境界，是不容易被外来事物所感动的。但每次看中国影片，却不只为其中细节所感动，也似乎悟到人生的一些哲理。

《人到中年》触动我心的是刘医生夫妇离国前夕的惆怅情怀，我八年前离国远赴日本接任，就全然没有一点怀恋故土之情，现在则是安土重迁了，我似乎全然能够领悟刘医生的心情，是人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如果祖国太教人失望，那也只有远走他方一途了。

我看中国影片的内涵是深刻的，它的缺乏观众，除了电影行业已渐趋没落外，宣传的不足也是个原因。我常常因看中国影片而感到平静刻板的生活多了点涟漪，这绝不是画面的优美感动了我，而是其中蕴藏着的生活哲理激起我重新探索人生意义的热情。

1984. 10. 29

开 朗

与两年没见面的远方朋友聚谈时，发觉他很健谈，很开朗，和两年前的落落寡欢全然不同；深谈之后，才知道他身负数重任，每天由清早忙到夜晚，由于在工作中须接触到各种类型与阶层的人，又由于所担任的工作都很有意义，他不只一改过往的沉默寡言的作风，连带地精神也爽朗焕发了。

他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他可以相当自由自在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奋斗。当然，在工作中他也遇到不少困难与挫折，但足以使他感到自豪的参与感，使他勇气十足地解决一切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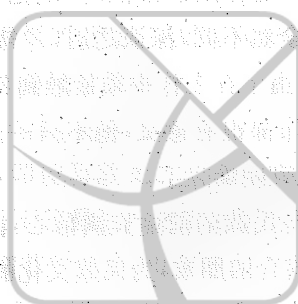
我们谈到飘泊异乡的落寞情怀来，那不好受的滋味，我曾亲身体验过。在异乡的心态，真有点像乘风归去时的凄凉而又飘渺，因而往往只有借酒后的朦胧感，才可使自己解脱。

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参与感的故乡，那孤清感还是和异乡的一样沉重，解脱之道，大概只有向外看出去，通过世界的绮丽风光与多彩文化来寻求慰藉了。自然，与远方朋友谈谈，从他的干劲十足的意气风发里，也多少可以解除落寞感的。

我由远方朋友的开朗神采中体会到参与感的撼人力量，但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失落。我想，在此时此地，除了向外望外，埋头苦

干,不太为周遭事物的变化而伤心,或许也是使个人性格开朗的另一妙法吧。

1983.11.8



旅 行

并不经常旅行,但心里想去走走的,却是欧美国家。不是说对邻近国家不感兴趣,而是觉得邻近国家几时要去都不成问题,而且发展中国家也较少可供我们大开眼界的事物。

旅游原本去观光名胜,但多去落后国家,却很可能在看到别人的落后面之余,更沾沾自喜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从而使自己的夜郎自大性格一发不可收拾。为此,我想蛰居小岛的人,应该多到先进国去观光。

看到先进国的美好事物而产生外国月亮较大的印象,那自然是很不好的。但对井底之蛙来说,却至少让他知道天外有天,这多少可挫挫他的自负心理。

我并没有因此就说不该到落后国家去旅行。倘若抱着了解这些国家的风光名胜、人情风俗或是社会结构的目的去旅行,那就别具意义了。

较厌世的人,如果到落后国家去旅行,是很可能找到类似世外桃源的宁静场所,来暂时避俗务的干扰的,只是这到底是消极的行为。

先进国的民众怎样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他们如何尊重人的

尊严,民众怎样通过报章表达他们对时政的看法,这一切不更值得我们参考吗?要增广见闻,提高认识,我想还是到先进国去旅行好。

1984.5.25



生活稍息站

读太多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会犯上这么一个缺点：藉遁隐山林以逃避现实。

古典文学中的诗词，对山川草木等大自然景物刻划得美妙极了，多读诗词的人，确实会比常人更懂得欣赏大自然的情趣。

可惜的是，东方人的宇宙观却是物我融为一体的。因此，展现在诗词或山水画中的人物，都属大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征服大自然的英雄。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宇宙观，加上老庄的清静无为思想，就是典型东方知识分子在恶劣环境中往往可找到解脱精神苦闷之道的的原因。

不是说西方人就没寻找寄托精神的场所，只是基督教的人本有罪说，较之东方人的哲学是积极多了。西方人的信仰宗教，我看大多是把它当作繁忙生活中的一个歇息站，稍息后就又积极投入生活战斗中去了。

东方知识分子的皈依佛教或遁隐山林，多少是当真就此不问世事了。说潇洒确实够潇洒，说清高也诚然够清高，但知识分子所看不惯的社会问题并不会因此而解决。

我总觉得老庄哲学或遁隐山林的思想是只可作为我们生活中

的稍息站，而不能作为避难所。作为稍息站可供我们在喘一口气或疗一下伤后，更精力充沛地投入生活火炉中去；但若作为避难所，则是消极的自杀行为，中国自古多腐儒，我看原因大半在此。

1984. 6. 22



可悲的人物

经常晨跑，也常常看到一位中年人在水沟里捕捉小鱼，不外乎神仙鱼之类的热带玩鱼。我看得出，他是以此为生的，至少是以此为副业的。

乡村已消失殆尽，水沟的小鱼从何而来，这我不大清楚。但记得以前这儿是农村，萍池处处，还有培植芦笋的沟渠几十道，小鱼会是萍池与沟渠残余下来的吧？

我想到的是，像他这样经常来捕捉小鱼，而没培育鱼苗，总有一天，小鱼是会被捕捉尽的，那他将何以为生？

我曾斜睨过他，他倒全然没我这局外人为他设想的担忧，他是很满足于现状的。

今晨我又看到他，还是那么起劲地在晨光里捕捉小鱼。他从没偷懒，但看来似乎也没长远的生活计划。至少，他这样靠现成的小鱼来谋生，是茫然活着的表现。

看多几次，我有点讨厌他，如果只顾捕捉小鱼为生，算是正当的职业，那他是勤劳的。但这么一个劲儿埋头捕捉小鱼，而不察看四周环境的变化，也不考虑将来的问题，这不是鸵鸟似的人生观吗？

我由他的身上看到我们周遭的许多人们，不也这样靠现成的

包装精美不是浪费

万千在其小专栏吃草篇中曾庆幸自己没生在日本，否则会給日本的包装精美而味道却平平的蛋糕气炸。其实，这论调是没体会到日本人凡事认真的态度才会发出的。

日本的包装，我看是世界第一的。普普通通的三几片肉，或三两尾小鱼，谁买回家都要即煮即食的，但日本人却包装得你舍不得打开来。这是浪费吗？表面上看来是，实际上却未必。

日本人事不分大小，都一切小心处理。表现在日常工作上如此，表现在保存古迹方面也如此。别说周恩来在岚山所作的新诗，已有诗碑竖立；鲁迅在仙台已有塑像纪念，聂耳在静冈也有遗迹可凭吊；即使是日本的断墙残瓦，只要有点来历的，即使在别人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他们也必会保管得很完善。

十分爱惜历史文物，并由此培养出认真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我看至少是日本人在亚洲有特别突出成就的原因之一。一些华人的凡事马虎态度，表现在日常生活上是小事糊涂，大事也不精明，表现在保留古迹方面，则不如日本人起劲。

日本人把平平常常的东西，包装得精巧美观，诚然是付出不少代价，但由此而培养出来的凡事谨慎认真处理的美德，却正是我们华人所缺乏的。

理 论

每一则名言或每一个理论，都是人类进展过程中由经验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总结者有其生活经历作基础，绝非妙想天开，但继承者若只囫圇吞枣，肯定就要触礁。

理论的概括性强，涵盖面也广，要想有深切体会，则必须插入本身的生活经历。这不只使理论具体化便于吸取，而且也是印证该理论是否仍然适合于此时此地的作法。

一般人的通病是，只背诵理论，又用它来乱套社会现象，由于对某一理论缺乏了解，在碰了几次钉子后，竟然怀疑起理论的正确性来了。

另一种人是把理论当作时髦服装来穿，并因此招摇过市，哗众取宠。这类人对理论也只是一知半解，他高谈阔论，往往不着边际，令听者索然寡味，但在一种思潮消退时，他却常常改腔换调了。

正确的理论可避免我们走冤枉路，而更快地达到目的地，但体验理论却是一门巧妙的艺术，而不是机械地继承。一个为掌握正确理论而囫圇吞枣理论的人，就如一个为摄取养分而吞食维他命丸的人一样，最终必会毫无所获。与其空谈精神生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不如教他去欣赏诗歌与音乐。不以本身的生活经验来具体化你想吸取的理论，就会一无所获，并责怪理论的华而不实。万福士以观察肚子来作为晨跑的动力，就是具体化理论的一例。

1985. 11.

赏 花

菊花似乎只有在秋风瑟瑟下观赏才够味，到裕华园看过菊花展后，就更相信这道理。那天的前晚下了一整夜的骤雨，天气凉快得似温带的初秋，但缺少秋风的凛冽，一盆盆的菊花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就显得有点憔悴不堪。

日本每年仲秋以后例必举行菊花人形展，菊花万紫千红，花朵又大又厚，在秋风下怒放，盎然生气把秋的肃杀都一扫而光。煞风景的是，日本人爱把菊花缀成武士形象，给人予不伦不类的感觉，把菊花的优美形象破坏无遗。

我较喜欢初春樱花含苞待放时节的花展，春寒料峭最撩人情绪，各种盛开的花朵或缀成花团，或单株展姿，都很吸引人，在此秋情景下赏花的乐趣是从容不迫的。

日本人对色彩的欣赏能力很高，悬挂在大街小巷的塑胶花色色泽之调和，教人心醉。唯独对菊花的处理，很是失当。在东京几年，春秋都为樱花与红叶所迷，独独惋惜每年秋天赏不到自然美的菊花，菊花人形实在是日本人处理花事的一大败笔。

在裕华园举办的菊花展，比较起来就较能显现菊花的自然美。可惜的是，天气太热，菊花憔悴不堪，使菊花的美减损不少，也就不能深刻体味到赏花的乐趣。

1985.12.7

时代苦闷

离开大学已十多年了，如果勤奋而又能专心一致做点研究工作，相信是会有点成绩的。遗憾的是心不在焉，东翻翻，西看看，没能对某个学科专心研究，结果是只写了些抒发性灵的小文章，汗颜之至，无以言表。

好友鼓励我应收其放心，努力作点研究工作。那早驾车上云南园，看到道路两旁的青翠树木，车窗前的晴朗天空，突然发觉自己的前途还是颇光明的，就下定决心要做点学问。

但我生性很怕不吃人间烟火的生活，在云南园四年固然很为那儿的风景沉醉，却也因此怕过学者的孤单生活，天天对着死书本，是很没情趣的，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想。

有一段好长的日子在东京度过，就怀念起云南园来了。现在天天有机会看云南园的树木花草湖水，却又再次惧怕过分恬淡的生活来了。

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安下心来做学问，因我深知自己的本性就是不太执着。但我想，时代的苦闷或许也是我不能安心研究一个问题的原因吧。

粉 红 眼 镜

早几年还很相信文学有改造社会的力量，近来则较想藉它来丰富个人的生活。文学的社会功能没人可否定，但仅仅有此认识，并不能担保你可终生从事文学活动。

热带的晨昏是颇有几分秋的况味的，在晨光中看一湖湖水随风荡漾，湖畔的树木倒映在水中的疏影横斜，凉风习习迎面吹来，偶而有几片黄叶飘落下来，因这而引起的苍凉感，真不逊在秋晨里看落叶的悲凉感。

黄昏在滨海吃海鲜，看太阳慢慢落山，把余晖撒在海面上，晚潮涨了，直把海岸拍得哗啦响，留在天边的那一抹血红，真教我想起秋的红叶之红艳来了。

别说四时景物的撩人情绪了，单单热带的晨昏与夜晚，就足教我心绪波动了。在下潇潇夜雨的晚上，要是与朋友在咖啡店喝啤酒，我往往会兴起邈远的感觉，仿佛古代茶楼的格调也不过如此罢了。

文学作品真如一幅粉红眼镜，它把我看到的事物都蒙上一层诗的色彩。在喧闹中，我能看到整齐之美，在宁静里，我能看到柔和的美，在平凡处，我能看到超脱的美。是文学把我的生活艺术化了，这力量恐怕更是我能坚持写作与阅读文学作品的原因。

1985.9.21

撒娇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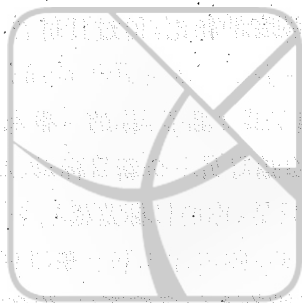
务实作风与实用主义应该有差别，前者以清醒的态度生活着，随时关心周遭事物的发展，也老想在实际上能为国家民族做点事，但与此同时，却不事事讲究功利，免使生活毫无乐趣可言。后者却从功利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可为利而忘义，生活单调刻板，毫无情趣可言，这种人喝酒是为了它能促进血液循环，有益健康，谈恋爱是为了传宗接代，找对象以高学历为主，为的是能繁衍聪明的下一代。

在我国的社会里，务实作风是求生存与求发展的生活态度。采取实用主义人生观，难免要遍尝机器人的枯燥生活的痛苦。但借宗教或退缩哲学以寻求解脱，却又会蹉跎岁月，一事无成。看清周遭的情况，远眺微露的曙光，以踏实的态度做点有益民众的事，闲来也不妨栽花养鸟喝啤酒，这样的务实生活方式，应该是最积极的了。

受传统华文教育者，是较不会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淖中去的，但却很容易以退隐作为解脱人生困境的途径。这种近乎撒娇的哲学在古代中国很吃得开，理由是天子爱清高之士，而且汉字到底是中国最主要的行政文字，隐士只要闭门好好读书，精通四书五经，复出的机会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的社会环境到底不同，万一撒娇而退隐，肯定的这个人从此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所以在这小岛上活着，一要多关注周遭事物的发展，二要多读现代的经、政、社的书，三要据理力争，总括的说，就是要有务实的生活态度，撒娇哲学在这儿行不通。

1985.9.13



更愉快

一谈到人生的理想，许多人都议论纷纷。极端市侩的个人主义认为，这是唱高调者的伟论；得过且过者则在窃笑，人生何必那么烦恼呢？

但不管你自觉或不自觉，你的一生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原有的目标达到了，你会追寻另一个新目标。人就是永远活在追寻目标的状态中，差别的只是，你的目标是极端个人的，还是与国家或民族有关的？

我不敢说极端个人的目标不好，但须付出较大的努力，失败时的痛苦也较大。与国家或民族前途有关的目标，由于是众人的目标，你所须做的只是点滴的工作，而且有众人参与，落空的可能性就较小。

混混沌沌过日子，在半醉中逍遥一生，不是更写意吗？我想这样的缺乏人生目标的生活，是空虚了点的。

我深怕个人目标落空后的苦楚，因此愿把生命献给与国家或民族前途有关的目标，这不是因为这样的目标不易落空，而是因为这样人生旅途会多了好多知己，会生活得更充实，更愉快。

1985.5.18

看海去

跟我学华文的一名澳洲人说新加坡年轻人很殉情，是由于我们的土地太狭小。这论调有点突兀，但却颇有道理。

住在这小岛上最苦闷的就是假期无好去处可逛逛，几个名胜一去再去的结果，是索然寡味，再也提不起劲来了。

有钱有闲到邻国走走，确实是增添生活情趣的好办法。但缺乏这些条件的人，就只好蛰居小岛纳闷。

居住环境对一个人的胸襟有好大的影响，许多专家批评日本人有岛国国民的狭隘心理，这不无道理，但比较起来，新加坡人的胸襟怕更要狭隘的。

胸襟狭隘，除不能容人、夜郎自大外，又经不起小小的打击。因此稍有不如意，就万念俱灰，萌起短见，殉情即其一例。

我烦闷时常常去看海，海浪的澎湃汹涌，往往教我体会到生的欢乐。因此，这半辈子除在大学时代差点殉情外，即使在最苦闷的时刻，也不会想到要死这回事。我想，这小岛四周尽是海，或许是我们不幸中的大幸。

没条件到海外解闷的人，在苦恼时不妨到海边看海去，这到底是我们能寻找精神力量的唯一自然景象。

插 花

日本使馆每年年尾例必寄来一个月历，背景照例是插花艺术。十二个月份附上十二个迥然不同的插花款式，外加一个封面也是插花艺术，使人一看再看，爱不释手。

插花是日本传统艺术之一，与茶道一样深入民间。插花，茶道与和服几乎和日本女性的温柔分不开。我颇不喜欢日本妇女说话时的嗲声嗲气，但却欣赏她们的优雅举止。如果性格美可藉艺术来表现，插花可说是日本女性内在美的最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插花艺术为处处是钢筋水泥的都市所带来的大自然美，是难以言喻的。我曾在日本的山间田野旅游过，在饱赏大自然的绮丽景致后，回到旅馆看到放在几上的一盆插花，就觉得它与山间田野的自然美一比，顿然黯淡无光。然而，在东京或大阪街边的咖啡座或餐馆，一看到摆在桌上的插花，那种欢愉之情无异于在旷野看到百花怒放，或在山麓看到红叶染遍群山。于此我才顿悟，插花艺术是自然野趣的浓缩与再现，但只能在都会里放出异彩，而不能在大自然中显露光芒。

以插花照片为背景的月历所能带来的艺术美感，自然远比不上真正的插花。但高超的摄影技巧，却又使插花艺术的美更为集中，无形中又弥补了照片的先天缺憾。

1985. 12. 25

盆 栽

买了两盆盆栽，一盆是茶树，一盆是雪松。就这样把它们搁在电视机架上，没去浇水，更不用说施肥了。两三天后，茶树的老叶开始凋零，雪松的针叶已呈褐色。于此才想起卖主所说的，盆栽也须时时浇水。

我们把生命力蓬勃的树木龟缩为盆栽，像古董一样收在室内观赏，对植物来说，原本就是戕杀生命力的罪行，只因植物不会出声，我们竟又忘了它们也须养料的浅显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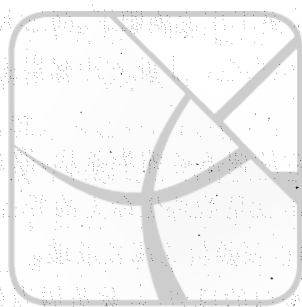
我曾在茶园看过茶树的风姿，盆栽茶树当然具备了茶树的一切特点，叶呈翠绿，也带微香，树根盘错，古意盎然。我也曾在高冈上看过松树的英姿，盆栽雪松也颇姿态婀娜。不看窗外野树，只看盆栽的娇小玲珑，也可怡然自得，慢慢也就懒得跋涉郊外去观赏植物了。

身居斗室，但以观赏盆栽为自足，这种生活方式本够狭隘的了，若又忘了盆栽也须养料供养，有一天是要连盆栽也看不到的。有时观看风扇吹刮盆栽，幻觉里竟然以为那是大风在摇撼巨松呢。生活环境对人的视野影响之大，有时竟至于此，能不教人警惕吗？

倘若在观赏盆栽的同时，又设想本身在干着伟大的事业，对周

遭景物不闻不问，且讥笑别人既不逍遥又没胆识，那盆栽的终会消失，就只是时间问题。

1985. 12. 30



家乡的水

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德国籍讲师很喜欢大自然，一有假期他就往日本乡间或山上去逍遥。问他西德有哪些名胜可游览，他说最值得去逛逛的还是波恩郊外的农村或小镇。

他年纪不大，娶日本太太，很会喝酒，与我们这一群学生年龄接近，每个学期一结束，我们就一大群去烧鸟店喝啤酒，吃串烧鸡肉。他例必分担账单的一半，余者由我们平分。

在东京有好多名胜可溜达，又有四季之分，我每个星期天或公共假期都与家人四处跑动，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又愉快。回来后少往外国跑动，蜚居小岛，既无春夏秋冬之分，又没甚名胜可玩，才慢慢体会到这名讲师喜爱大自然的道理。

人的确是无法脱离大自然的，忙忙碌碌了一个星期后，不到公园或海边去散散心，有时真是要熬出病来的。热带的树木花草少变化，确实是单调了些，但水波永远闪着光亮，却胜过温带的多多。有一年严冬，我在新宿御苑看到那塘池水冻得像老太婆皱纹层层，而又凝然不动的脸庞，才知道水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充满灵气的。比较起来，家乡的水常年水波荡漾，就更可爱了。也因此渐渐喜爱家乡的大自然来了。

多 情

与好友跟一位闻名已久但缘慳一面的诗人见了面，三杯下肚，这位已是中年的诗人在谈及文化问题时，竟然簌簌泪下，顿时使我悟到诗人多是纯真与多情的道理。

他目前在失业中，却忙于收集本地写诗者的稿件，以赶在八月底交由海外某出版社出版一本诗集。我不知道别人对他的行为有何评价，在这讲求功利，而又有些人自鸣清高的社会里，若有人在私下訾议他，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的。

我对他的认识并不深，但初次见面，我就喜爱上他的勤奋与纯真，他与自我标榜淡泊名利而又到处营钻者不同，他光明磊落说出自己奔波的目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点点要名留青史的愿望，但即使有，我也不认为他不可爱。

我们是生活在八十年代，而不是义不食周粟的封建时代，华文文学若不是害人的毒品，所有有作品面世者都应主动争取更多知音人，这不是沽名钓誉，而是使作品流传得更远些。

苟有迂腐者说我爱出风头，我愿担上这罪名。为文化建设多献出一份力量，为自己多觅一些知音。最足以教我的生命增添色彩。我欣赏这位新交诗友，我鼓励他蔑视一切闲言闲语，把工作做好来。

1985. 8. 30

改 嫁

《李清照》这部中国电影的拍摄技巧似乎并不太好，戏中的一些布景一眼就可看出是假的，整部电影的舞台味也太浓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顶喜爱它的。

研究李清照的学者都会碰到她到底有没有改嫁的问题，历代学者还有迂腐到把改嫁与她的人品混为一谈的，实在教人感慨封建思想对中国人毒害之深。

李清照的一生，幸福的日子并不长，颠沛流离与孤单的日子倒不短，她嫁给赵明诚自有琴瑟和鸣之欢乐，但她中年丧偶，在往后的漫长日子中，若遇到知音而改嫁，又有何不可？

学者研究李清照生平的，大多肯定她并没改嫁，这部电影也如此处理。事实是如此，还李清照一个清白，是绝对公平的。不过，即使李清照真的改嫁，却也丝毫不损她光辉的人格与卓越的文学成就。

中国历代的社會，对妇女的压抑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唯其如此，出现一两位光辉闪烁千古的女文学家，就特别教人注目。当代或后代的既嫉妒又迂腐的文士，若妄想以改嫁没改嫁来判定女文学家的文坛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可笑行径。学者在探索这问题时，抱着的应是求真的态度，而不是为李清照洗

脱罪名的用意。理由是,改嫁与文学作品的价值无关,更无损李清照的光辉人格。

1985.8.7

择 友

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如果不是我们择友的条件,他的人生观却是。在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人,有时是无法不认识他们的,不过朋友却应该有所选择。不能划清你所认识的人与你的朋友界限,生活上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与你所认识的人的交往,有时是一次性的,可能是对方欠你一笔人情,也可能是你欠对方一笔人情债,但很遗憾此后大家都再没机会见面,这样的人情债也只好搁在那儿,但我并不会为此而太耿耿于怀的。

另一种更坏的情形是,对方原本就是对你有所企图而才跟你来往的。这样的人常常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好处。表面上是关心你,内心里却不时想从你身上得到更大的报酬。倘若无法敬谢这种人送来的小甜头,我想在接受甜头后,你是应该适当转送他一些小利益,然后快刀斩乱麻切断关系。

我们的朋友至少应该与我们有相似的人生观,朋友之间不是没有矛盾,但他们不会互相利用,也不至于在对方身上投资并想捞回本钱。把朋友之间的矛盾,与你所认识的人的卑劣企图混淆起来,也是一个错误。

有什么标准可判断谁可成为你的朋友?我的看法是,不会损人

利己，活着不单单为个人，也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者都是我们可结交的朋友。

1985.8.14

从高中时代起，我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常读一些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这些小说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历史，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在高中时代，我曾参加过许多文学比赛，并获得过许多奖项。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热爱文学，也让我更加自信。在大学时代，我继续深造，学习了更多的文学知识。我参加了许多文学社团，并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在大学期间，我曾参加过许多社会实践活动，如支教、扶贫等。这些经历让我更加了解社会，也让我更加热爱国家。在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在工作中，我继续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为公司撰写了许多宣传材料。同时，我也积极参与公司的公益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将继续努力，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认同标帜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为何华人到各地定居，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除要吃家乡风味的食品外，还要学华文看华文。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只能举出南美洲每年有大批年轻日本人，到东京学习纯正日语来证明凡人都热爱自己文化的道理。

接受本身的文化，并不一定是狭隘的民族感情在作祟。自地球上有人类以来，各个民族都累积了本身的年代悠久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却深具本身的特色，这特色就是人们深爱本族文化的原因之一。

但移民他乡而想保留本族文化，就不只是生活习惯造成的，还在于抛弃本族文化并吸收别族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移民第一代因此老爱回头思念本族文化，即使是第二代、三代的移民，碍于身上多少还残留着本族文化的色彩，在面临不被别族认同的时候，也会回头探索本族文化的。

在历史上似乎还没法找到愿意放弃本族文化的民族，这应该不是人类顽固的本性造成的，而是说明文化特色是人类认同的重要标帜的道理。

1985. 6. 22

思想毒害

东方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尊重权威,从而也就强调维持现状的重要性。表现在政治上君君臣臣的那一套陈腐哲学,表现在思想上则是盲目尊崇名人的学说,尤其是古代名人的言论,更不可受到批判。

各种思想学说或教义,无论古今中外,都各有其超人处,也有其不足处,但党同伐异,并对异说口诛笔伐,却是东方人的特点。说穿了,这不只是心胸狭隘的表现,还是盲目崇拜名人或某一学说的后果。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若要打破陈规就须有对权威与既成理论质疑的勇气,也须有面对由于质疑而招来抨击的勇气。为了突破盲从的框框,我想遭人物议是无可避免的代价,也相信有质疑精神者拥有遭受抨击的勇气。

把名人神化,又为其思想学说润色,务必使其学说十全十美才肯罢休,这也是迷信名人学说者的恶劣作风。

但倘若我们不能以现代的观点来剖析古代学者、宗教家、思想家的言论的局限性,而是在盲目膜拜的同时,又对质疑者横加抨击,这就是深受古人思想毒害的无知行为了。

1985.6.5

生活充满记忆

“记忆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之一。对心灵，它有时是沉重的负担，有时又是无法估价的财富。人们有时不能没有它，时而又十分稀罕。它能冲破时空局限，使生活从平面变为多棱角。”

萧乾此段文字，真是像诗一般教人激赏。人自然不能老生活在记忆里，但人生的多姿多彩却在于人拥有不少记忆。不管这些记忆是辛酸的也好，是甜蜜的也好，它至少说明你曾经喜爱过或憎恨过某些事物。

过去也许你曾在樱花盛开的春天，与好友偕游，而今人各一方，那段记忆就种在天涯海角，那么虚无飘渺，但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以往你可能在雪花飘洒的夜晚，与友好把酒话前景，于今时过境迁，各奔前程，再也难得聚首，但有那段美好的记忆，人生不是美丽多了吗？

我常想，有记忆的人是个敢恨敢爱的勇者。没有强烈的爱憎情感者，是不会有难以磨灭的记忆的。因此，缺乏记忆者，往往也是生活浅尝即止者。那样的生活是乏味的、单调的、枯燥的。我愿自己的生活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记忆，这至少证明我曾经踏踏实实地，敢憎敢爱地生活过。

滋 润

对极端讲求功利的市侩来说,在此时此地学文学或哲学是最没出息的了。但事实是,由人类社会发展史看来,文学与哲学却是促使人类远离动物阶段的两大要素。

人类的伟大处在于能作逻辑的思考,理智的判断,抽象的思维活动,哲学则是这些思维活动的产物。哲学既探讨人生的意义,也提高人类生命的素质。人类社会若没了哲学,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沦为动物一样。

文学虽为感性的产物,形象思维的结果。但一切创作其实都是痛定思痛后的产品,因此文学作品实际上已渗入作家的理性认识了。文学题材是生活经验沉淀后才浮现上来的,作家在取舍题材时,已作了理智的抉择。

哲学可说是逐步把人类生活境界提升到纯净阶段的要素,而文学则是不断丰富人生境界的不可或缺色彩,前者较偏重净化生活,后果则较着重美化生活。人生若缺乏此两大要素的滋润,我们的生活与动物有多大差别呢?

1985. 2. 11

抒情流行曲

我常常感到生活中有好多苦恼，想甩掉却无法做到。在偶然的境遇中，又有教人难以忘怀的偶遇之情，这固然为平静生活增添了色彩，却又困扰得人烦恼不已。

我曾尝试以老僧入定的心情来对待生活，却发觉那刻板得像清教徒般可怕。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寻找到一份情趣，我为此而感到生的快乐，但也因感情的过于丰富而忘不掉偶遇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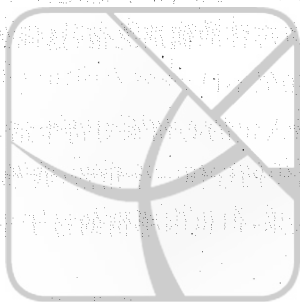
有时闭目静思，觉得自己或许应该活得像一首艺术歌曲那么高雅。可在现实中，我却欣赏充满哀怨情绪的流行曲。周璇、龚秋霞、紫薇、吴莺莺、潘秀琼等等歌星的歌，才能拨动我的弦。

或许是秉性如此吧。我的情操无法高到欣赏艺术歌曲，就只能听听流行曲调。我不向往天堂，那太虚无飘渺了，我也不沉迷于酒色中，那太糜烂了。但喝点酒后，漫步在异乡的巴黎街头或东京小巷，在不经意中听到周璇的一两首抒情曲，对我来说，就是最罗曼蒂克的享受了。

大马某报总编辑前年在东京遇到我，很惊讶谈笑风生的我，竟然就是调子低沉的《樱花飘落时节》的作者。我后来想想，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的我，在骨子里，我的这一生是注定只能是一首很抒情的

流行曲,可能是哀怨如《街头月》,也可能是淡淡如《绿岛小夜曲》那样凄清,但绝不是情操高尚的艺术歌曲,更不是歌颂主的圣歌。

1985. 3. 6



代 价

到现在还不皈依宗教，也不阅读有关禅的书，为的是人间充满情趣，大自然洋溢着生气。人是不能不咀嚼一些哲理的，但总以为宗教是消极的。

骤雨过后的清晨，看湖畔的杨柳青翠欲滴，九重葛鲜红可爱，湖面一平如镜，水波不兴，心情就宁静得像在仙境里一样。这时就想，大哲学家的心态也不过如此吧，倘若自己又皈依宗教，岂不在冲淡人生的乐趣？

世间万象，原本没有一套哲理可涵盖尽的。各种宗教固然都尝试从本身的观点来阐述人生，但似乎都不若哲学的涵蓄而广阔。哲学也有各派系，但至少没那一层神秘色彩，比较上来说，它就能阐述人生的意义。

我想，一个人若能从复杂的人间寻到情趣，又能在大自然中找到美景，再从欣赏文学艺术中提高人生境界，他的生活应该很充实。

我又常想，宗教或禅学是一个人的心理空虚无法填补时的镇定剂。若信服某种宗教或学说，则一个人看待人生就难免要流于既定的框框中去，不若探索哲理者那样能够灵活从各个角度来发掘生之意义。皈依宗教或许确实能减少彷徨，但窥探人生的角度就单纯化与狭隘了，这是个不小的代价。

人生境界

排遣寂寞的最佳途径是充实生活，生命怎么说到底是个体的，知己或好友只能帮助你打发一些空闲时间，充实自己的生活内容，才是真正解闷的途径。

人生有一两位知己，是幸福的。但知己所达致的生活境界，并不能通过语言传达给你，开拓生活境界得靠自己的努力。

文学、音乐、绘画等等艺术形式，都是丰富生活内容的媒介。这些艺术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要素，你欣赏艺术的能力越强，动物性就越小，否则，你的生活就会与动物相似。

提高生活素质与内容，并不是禁欲主义理论的演绎。有丰富生活内容的人，并不一定是卫道者。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是传统封建礼教道德的叛逆者。

不过，生活内容丰富的人，他们的情操会较高尚，他们的心胸也较广阔，他们所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与民族问题。他们并非没有个人的烦恼，只是比较起来较轻微罢了。

情操高尚者在遇到生活的挫折或打击时，往往并不会因此消沉下去，而是能克服困难并开拓更高的人生境界，这种毅力是常人所缺乏的。

1985. 3. 27

指 点

我这半生还活得充实，真要感谢文学所给予的精神滋润作用。有时情绪浮动得很厉害，就随手抓一两本好的文学书来读，往往就这样把情绪平伏了。有时觉得活得很空虚无聊，就拿起笔来涂鸦一番，过后又认为活着是很有意义的了。

我是到中二还不知道自己该学文科还是理科，反正文理科的成绩都不赖，就这样全面发展下去吧。后来得到一位华文老师的鼓励，才一转而向文学进军。有一段日子，我几乎一天读完一本文学书，虽然自己在高中念的还是理科。

一进入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就全心全意向文学进军了。此后为谋生，虽也啃读经政与其他杂书，但真正能丰富自己心灵的，却还是文学作品，能使我感到活得充实的，靠的也是涂写些文章。

我不知道，在这功利社会里，我走文学的路，是得还是失。但文学在精神生活方面所带给我的充实感，却使我时时缅怀起中学时代的那位华文老师来。若没有他的指点，我这一生走的很可能是另一条路，物质享受也许比目前我所得到的还要丰富，但精神却难免要空虚的。这么一想，我很庆幸自己在很年轻时，就得到良师的指点，至少我省却了走不少冤枉路的麻烦。

伤 感

最近有机会读了一些年轻人的习作，发觉他们似乎特别伤感，生活也很孤单寂寞，和我青年时代的生活全然不一样。自己的年纪和这批年轻人大约差十多岁吧，但生活感受竟然如此不同，实在使人感到有点惊异。

论物质生活，他们肯定比我当年的好多了，说娱乐方式也较前多姿多彩了，大众传播媒介更是空前发达。那他们为何还彷徨，还感到生活单调呢？

会不会是生活缺少了个理想造成的呢？若然，那什么是这批年轻人的共同理想呢？国家已经独立了，民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还有什么崇高理想可教他们向往的呢？

提一提文化建设好不好？总不能像动物一样为生存而生存，为建设国家文化而努力吧，这也总算得上是个崇高的理想。

年轻人太伤感，不能说是好现象，但事实又是如此，该怎么办呢？

1985. 6. 26

揶揄者

写文章的人不一定得有济世抱负,但至少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信口开河,或毫无原则地把好的事物说成坏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对绝大部分读者来说,并无损害,但对作者自己来说,则是在损害本身的人格。

负责任的撰稿人不只要对所评的事物有所了解,也应本着爱护美好事物,揭露黑暗的原则来处事。自己对某一课题既没深入研究,又以揶揄态度来说长道短,以聊博一粲,那实在是恶劣至极的行径。

小丑的嘻皮笑脸,固然不比大棍子戕杀美好事物之剧烈,但他撒在美好事物上的唾沫,却也是教人厌恶的,因为他这么做,不只侮辱自己,也把别人抹黑了,而其结果却只是博得少数认识浅者的一粲而已。

遭受这种揶揄的人,一不用太过动气,二不用气馁,而应鼓足勇气,本着自己的正确立场继续做有益大家的事。

揶揄者的可恶不在于他的无聊,而在于他自以为高明。但只要明白揶揄者本身并不高明,而只是虚张声势,并装扮鬼脸以哗众取宠,那他就会自讨没趣而退。但揶揄者的出现,却也说明低趣味的东西,依然有市场。

1985.10.21

渔 翁

一半由于职业的关系，一半却由于年岁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渔翁。刚学写作时期，还是个主持钓竿的垂钓者，上钩的鱼儿不多，但一钓上鱼就兴奋得很，那时享受的是垂钓之乐。

进了报馆，因为工作上的需求，我的脑已经是张大网了，事不分巨细，一概先网进来再说。网进来后再分筛过，于是有评论文章，有小感触，偶尔也有抒情散文。

大概多少已患上职业病，每天都要涂写几百字，才觉得生活充实点，因此随蒸随卖的文字多了，精雕细琢的作品少了，渔翁留下来做咸鱼的，大多是不太新鲜的鱼类，新鲜的大鱼小鱼，渔翁都是在当天脱手的，我的情况也一样。这或许是靠文字谋生者的悲哀，他们实在不能储藏素材，原因是他们天天都得去发掘新的写作素材，一储藏就会多得无从下手。

细雨纷飞，坐在树荫下垂钓，看池面泛起千万朵雨花，看浮萍的浅蓝的花在雨中颤抖，听鱼儿跃出水面的声响，那是童年乡居时的美好回忆了。初学写作时，便是以这种毫不在乎的心情来搜集作品的题材的。

有时想到市场上每天都得有新鱼供应，单单依靠业余垂钓者是不行的，因此也就对自己扮演渔翁的角色感到释然了。

1986.12.23

朴素的愿望

看中国影片除常被其中所蕴藏的主题感动外，也往往被戏中主角的朴素愿望所感动。《人生》的女主角希望有个温暖的家，《乡音》主角的愿望就更朴素了，她只想看一看火车。一个远亲来信说，3个孙子在读书，每年费用约八九十块人民币，他们为此颇伤脑筋。我想自己只需少在外用餐就有办法帮助他们，于是汇去。

我不是说人应该永远满足于朴素的愿望。而是由此看到自己的愿望是相当“豪华”的。表面上都是远大的理想，拆穿了，所谓与群众利益有关的理想，只不过是包装的彩纸，骨子里想的还不是名史？

一次曾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原罪感，生下来就认定自己有罪，应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来赎罪。在中国那样朴素的社会，我相信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是表里如一的。

我自己扪心自问，似乎就没那么单纯，如果有人说我爱名，我想我不敢不反驳。如果有人问我会不会为什么理想而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我不敢说一定做得到。心里想的是一套，嘴上说的又是另一套，这是大都市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特色，我相信自己已多少沾染上了一些龌龊。

我多希望自己拥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但这正如艺术创作要由绚丽趋向朴素一样的不容易，那到底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比 赛

小女会考放榜那一天，陪小女到学校领取成绩单，看到好几位会考成绩不理想的小女孩在暗泣，很有感触。

由小学到大学这一段学习过程，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赛，考试就是赛程中的障碍物，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只是我们的似乎多了点，也较难跨过去。

但我的感触倒不在这点，而是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好像都把这场比赛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了，这是很悲哀的事。

在赛程中的青少年，由于潜心于功课，在分数高低的欢悲中度过日子，虽然无暇旁顾周遭的事物，从表面看来，日子也过得颇为充实。但一旦毕业离校到社会工作后，许多人便感到精神空虚了，除了工作外再也没什么其他具体的事可做。

我们把比赛看得太重了，以致下一代把比赛当作人生的一切，在完成比赛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不要说他们茫然，我们也回答不上来。

人不是泥土，不是原料，不能任由别人捏来捏去。人生是多姿多彩，无比丰富的，比赛应该参加，但沿途应观看闲花野草，不用死盯着终点不放。孩子是无知的，但他们误把比赛当作人生唯一目标，却是整个社会的错。

1986. 12. 10

共赏自然

在这都市连花草也要钱买的，他苦笑着说。乡村的花草到处都是，是免费的。他回忆着往昔的那一段村居生活。有一天我在朋友家的窗前看到一棵枝叶茂盛的树，把他家的厨房掩映得颇为青翠，我才又拾回久违了的自然情趣。他眼里泛着欢愉的神采。

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文艺爱好者，酷爱大自然的热忱并不亚于我这个曾经沧桑的中年人，我的喜爱大自然，一半原因是没宗教信仰可寄托心灵，另一半原因是平常忙忙碌碌，星期天到宁静的场所闲坐半天，头脑会显得特别清醒。这青年会不会与我有同样的原因呢？我没问他，也就不甚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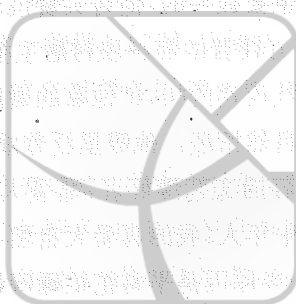
他突然说要到忠邦村去走走看看，还谈及应不应保留忠邦村的问题。即使忠邦村要保留，居民的居住与卫生环境也须改善才行，然而这么一来，却又是高级住宅区了，升斗小民就住不起了，我这么回答。

都市化后的大自然已被肢解为一小块一小块，而且是大家共赏的对象，能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与花园的，已是有钱阶级的权利，而不是升斗小民所敢奢望的美景。

在非常人工化的景物里找回一点自然乐趣，这是都市人无可奈何的心态；只是长久没机会接触一望无际的平原，或高耸入云霄

的峻岭，人的心胸会不会狭隘起来。真想到处去看看崇山峻岭，无垠的平原。

1986. 11. 25



求 变

已搬来住上两年的新镇，我以前是未到过的，对它当年的风貌也就无从想象。清早有人驾着广告车来卖鱼菜，接着有位老印度人推着辆载着个四方箱的脚车来卖面包，再接着是位中年华人，推着脚车来卖蒸花生，黄昏时分则是菜农以必甲载着鲜菜来卖。我由此知道这儿以前必是个宁静的农村。

我的邻居们大都彼此相识，经常看到他们坐在楼下的石椅上，聚谈甚欢，看情形是老相识了。居住环境改变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不变，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显然已改变了，我由卖面包的、卖花生的、卖鲜菜的生意的奇差可看出。我曾留意过他们的动向，除了菜农经常有三五名顾客外，我从没看过有人向那两名小贩买过面包与花生。

组屋楼下不只有小商店，还有小型巴刹，鱼肉鲜菜，面包早点，应有尽有，居民哪还会向流动小贩买早点或零吃呢？唯一例外的是，偶尔来的一名贩卖罗杂货的，生意真不错。

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这些低层的小人物的命运是教人怜悯的。他们或许不知求变，或许无能力求变，但不管是由于哪一个原因，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将渐渐变得更小，终至于完全消失。

因此推广来看,这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若不能在创作手法与取材角度方面有所变新与扩大,会不会也遭到流动小贩一样的命运呢?

1986. 11. 13

多读报章

踏入报馆六年，最大的收获是阅读范围广泛，每天须泛览数份报章，使我的思想不致僵化，对许多事物也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不会执着于小争论而看不到大方向。

以文学来说，我固然可以看到反映现实之作，也可读到极端个人化的抒情之作，前者未必都好，后者也不一定都坏，文学到底是艺术，讲求作者感情的真与表现手法的灵活。空有正确的主题思想，而没生活感受，没较新颖的表现手法，那是干巴巴的说教文字，哪会感人？

在结交朋友方面，也比较不那么注重人的言论，而较看重他的表现了。每个人都为三餐忙忙碌碌，自己的三餐没解决而能关心群众事业者，不是说没这样的人，但到底只是少数，是属于圣人烈士之辈，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三餐已解决而还能关心一点大家的事。这样的人就是我想结交的朋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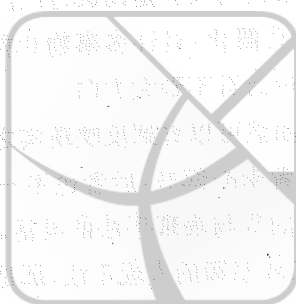
不过，我要想交的朋友是见闻广一点的。我听说现在有人极端到不读报章，像这样的人我想自己就难于和他来往。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难道全世界的人的智慧竟然比不上不读报章者？

要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既定的规律可掌握，那该多好，遗憾的

是我们在许多事物上还找不到规律,该怎么办呢?我想多阅读报章不失为寻找规律的途径之一。

1986.11.6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自由”二字）



三 多

一位日本学生这么对我说，新闻从业员只要遵守“三多”原则，就能在工作上有突出表现。他的“三多”是：多读书，多旅行，多和别人谈话。我不知道这是他从哪本书得来的见解，很显然的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立论。

《朝日新闻》的封面版每天总有一小栏笔调轻松的随笔式评论，叫《天声人语》，由一名博学之士撰写。据说自该报创刊以来，迄今为止的执笔者为第五位。单单每天都得挤出一小篇评论的能耐，就足够教人钦佩的了，何况作者兼具博古通今之才学，实在是难得的人才。

《日本经济新闻》的晚刊，有个专栏叫《明日的话题》，撰稿人不限一名，但都很有来头，大学教授，商社老板，文学评论家，著名作家，都来参与其事。此栏与《天声人语》较不同处在于，后者多就时事而发议论，偶而也援引古诗文为立论之依据，前者则行文更为奔放，作者往往会把本身最近的旅游经验以抒情之笔叙述出来，夹议夹叙，读来如坐春风，很是舒服。

日本报章的专栏不少，我较喜欢上述两栏，原因在于，它们既能体现作者的博学多识，也能增添读者的生活情趣。

多读书，多旅行，多和别人谈论问题，是否真的就能把新闻工

作做好,我不太肯定,但有此三多,却至少能写好专栏,该是毫无疑问的。

1986. 10. 28

“我那时是二十岁，刚离开家，到上海去，在上海，我认识了……”

平天瀾湖內綠藻爆發嚴重，造成大量魚類死亡，損失慘重，造成大量魚類死亡，損失慘重，造成大量魚類死亡，損失慘重。

喝茶

因为患了肠胃消化不良症，最近不喝啤酒，而改喝保健茶。喝西洋茶是我一向来的习惯，每到咖啡站要不喝啤酒，便是喝杯乌茶。在自己的感觉里似乎是满肠胃都有脂肪，喝了乌茶浑身轻松。但喝中国茶却绝少，一年前开始喝一种“问荆茶”，味道平平，有医学常识的朋友说这茶有益健康，也就这样天天喝它一大壶，慢慢也喝出味道来了。

夜晚我是喝惯啤酒的，近来却也喝起茶来，而且颇有情趣。我上了啤酒瘾至少有十年，夜晚喝它一大瓶，不只精神特别好，看起周围的景物也朦胧含蓄，这简直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

但为了健康，我只好舍弃这种朦胧美了。这些日子来，夜夜喝茶，却也喝出另一种情趣来。喝啤酒若能享受到浪漫美，喝茶则能品味到清净美。喝茶时刻看人生，不但清醒，而且洒脱，把一切都看淡了，很想追求古代隐士与山水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

隐约里，似乎悟到这么一层道理：喝茶而能喝出味道，至少应在阅尽人世沧桑的中年之后。真的，我年轻时是颇有去国离家飘泊天涯之思的，只有到了这中年时期，看透了这世态之后，才能安静下来品味人生。

能在平淡且略带苦涩的茶味中品味出情趣来，这得有平静的

归隐大自然

闲坐并非只为冥想，有时也为消闲。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周，身心交瘁，多睡不但不能解除疲乏，反而会周身乏劲。在这样的時候，最好早起晨跑，而后到大自然中去闲坐休息。看看海浪也好，看看湖景也好，即使是静坐公园里，也会头脑空灵，思絮飞翔，体会到平日无法感受到的美感。

喜欢艺术者固然不能不为人生而艺术，但若能把艺术化为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更能学以致用，在大自然里浸淫，又把平日里从艺术中得到的意境投摄到大自然上去，那人生就真的无处不艺术了。静坐大自然里，有时也幻想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种与之相融合的快乐，真是罄竹难书。

偶而到较低层民众常去的热食摊走走，便会发觉为一日三餐而奔波者，也大有人在。像我这样有闲情逸致静坐大自然者，到底是少数。然而一想到个人力量有限，足以教我关怀的事物又真多，而我无能力事事都关心，倘若能在文化方面增添一两点色彩，也便心满意足。这样一想，也自认为闲坐并非罪过。

步入中年心情与青年时代截然不同，自信对现实并非不关心，但隐约里似乎较能欣赏大自然的恬静美。以往读到一些指责古诗人如王维、白居易等人晚年逃入大自然寻找解脱的文章，心里很信

游 园

裕华园、星和园与万礼胡姬园已被伦敦出版的《环球名园》列入世界六十名园之列，这是我们的光荣。在许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本地名胜有什么了不起，多半原因是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结果。

胡姬园我还没去过，其中之幽美环境，无法形容，也无从想象。裕华园去的次数多些，星和园则好几年都没去了。游花园似乎以春秋最富情调，盛夏处处是绿，就单调多了。我国不幸终年皆夏，花园景致难免逊色点。我因此较喜欢在雨后才去游园，至少雨后的清新空气与更青翠的树叶，能令人精神一爽。

我想裕华与星和二园较世界其他名园逊色的另一原因是，它们缺少历史情调与随之而来的艺术气氛。历史古迹或文物没法尽速创造，只能慢慢累积，只是逢年过节，举办一些文娱活动，为花园增添一点艺术气氛，这不失为花园增添色彩与气氛的好办法。

当局正在计划为裕华与星和二园造起一座桥梁以连接起来，这是个好主意。此后我们若有兴致，便可一回游完二园了。

1986. 2. 19

聚 会

我原以为这些年轻人忘了我，与他们聚会，才知道他们还惦记着我。骤雨后的夜特别凉快，庭园的草绿得真醒目，远处人家的灯火昏晕而富有诗意，这样的夜，即使清淡到天亮，也不为长。

翻阅这批年轻人的诗歌合集《诗的新苗》，再咀嚼他们略带伤感的谈话，我明白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本能，是不分时空的。童年与少年是在较安逸环境下度过的他们，并没失去追求艺术美的热情，也没缺乏关怀民族文化的胸襟。

文学原是较个人化的创作活动，然而有一批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经常讨论一些问题，互相激励，也总比独往独来的寂寞生活有生气。我在《诗的新苗》中看到清丽的独语，豪放的抒情，清醒的苦闷，无奈的伤感，这都是有意识活着的人必有的特征。

知音何处寻，也是他们的苦闷之一。我只能说，把眼光放远点，把自己当作整个人类的一分子，不是在岛内，也应在海外寻找知己。在创作中寻找生命的欢乐与不朽，也在创作中提高人生的境界，这样才会有信心地坚持本身的信仰。

1986. 3. 17

封 笔

多年不曾见面的一位大学同学，最近与我攀谈了一阵子。她说我依然很激动，我所写的文章即使她不看署名，也能从笔调中辨认出来，我听后感触良深。

我至少已经整整五年不写诗了，自以为这是感情平淡后的必然现象。但我的文章中若又有激情，则自己的想法显然又错了。

在很多时候，我真想多找一两个嗜好来度过余生，不再写一些既得罪权贵，又不能对己有利的东西。最后始终没这么做，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对这社会还没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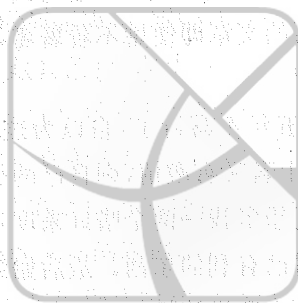
另一位初次见面，然而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对我说，我若继续写东西，一定不得善终。那是他颇喝了几瓶啤酒后的话，但也吓得我冷汗直流，酒意全消。我于今还时时刻刻以此为警惕。

不过，也有批评我不够胆识的朋友，他们以为我闪闪烁烁，不能单刀直入剖析时事，因而也就缺乏冲击力。

写东西的人在很多时候与马戏团的走钢索者并无两样，没惊险镜头观众例必大喊倒胃，过于冒险以致跌伤或跌死了，部分观众不只不同情，还会訾议你不小心。杂耍的难于讨好观众，与写文章的不易获得读者谅解，都是一样教人伤心的事。

我若还没封笔,就说明我对社会国家还有爱,于此也就可感触到我的激情。我想我那位同学是了解我的,到底我们同班四年。

1986.7.1



精神家园毁不得

这世界有时显得多姿多彩，我看与作家和艺术家很有关系。人间要是没了艺术品与文学作品，人类的生活将是何等沉闷单调？

缺乏哲理的文章不耐读，缺乏感情的作品又干巴得不能卒读。人生也不例外，太理智地活着，生活多乏味，太感情式地过日子，生活又匆匆不留一点痕迹。

我因此认为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家园既种感情的花朵，也栽理智的香草。世界如果只有政治家拟出的模式，那是非常单调的。政治家倾向于解决民生问题，在草拟社会蓝图时，会偏重于物质建设，而忽略了精神建设。

中国史上也不乏具文人氣质的政治家，但他们往往并不能治好国家，可见治国者不可过于感情化。若要有平静的日子过，像李煜那样浪漫的治国者，千万不能要。

那样一来，这世界就似乎出现这么一个趋势：治国者绝大部分是较硬邦邦的，而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者多为艺术家、作家。这两类人尽管用心多良善，理想多美丽，到底不是大权在握，对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只能假之于作品与理论，而不能借之于行政手段了。

外电报导，西方一个调查研究显示，作家与艺术家多有自杀倾

向,大半原因在于“精神家园”崩溃了,这很教人感慨,但也让我们知道,大权不在握的艺术家与作家,不可过分执着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否则,看不开了,便只有自杀了之。从历史角度来看,一时的胜利者,未必就是拥有真理者,艺术家的“精神家园”受到压抑,自然很苦闷,但看得长远点,把自己的“精神家园”当作全人类的一个目标,不就不会急于在自己有生之年来完成吗?那在缺乏条件建设“精神家园”时,既不须毁灭家园,也无须自杀。

1987. 6. 17

“此情可待成追忆”

四月中旬的东京，天气渐渐转暖，但嫩寒欲去还留，尤其是在缠绵春雨淅沥的日子，那薄寒就更教人感到春的料峭比秋的萧瑟还要教人颤抖。观赏了在细雨中纷纷飘落的上野公园的樱花，沿着那条植满常青树的小径走着，在雨丝扑满面的寒冷中，想起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顿时就有股苍凉感涌上心头。偏偏在这时，对面那间中国餐馆竟飘出周璇的哀怨歌声，唱的竟是《天涯歌女》。人在异乡，又是细雨斜，樱花飘落时节，在这时听到周璇的歌声，真是百感交集，也就当场走进那间中国餐馆吃饭，聆听这能挑起我怀旧之情的歌了。

那是严冬的一夜，在枝桠都是光秃秃的银座的街边走着。银座的古色古香的街灯，在严寒的夜街散发着凄清的光。夜相当深了，好多餐馆都关门了，只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酒吧与咖啡座，还是人客拥满。冬的可怕，不在天气的冷，而在冷风的凛冽，没风的时候，走在街上，看那幅冬的凄清景物，就颇能体味到日本的情调美，是只用凄美一词，就能概括殆尽的。很不巧那夜在银座施施然走着走着，天竟下起鹅毛雪来。因没带雨伞，就近走进一间地下咖啡座，在暗淡灯光下饮咖啡时，竟然听到《情人的眼泪》这首流行曲。在异乡雪夜地下咖啡座，竟能听到华语歌曲，这无异是他乡遇旧雨，一

时也被那哀怨的歌声逗得情绪波动,不能自己。

在异乡特定的环境下听流行曲所兴起的情绪波动,使我得出流行歌曲是特定社会的特定环境的产物这结论来。撇开全然受欧美流行曲影响的、以呼叫为主调的流行曲不谈,华语流行歌曲所抒发的,除了少数是歌颂农村风光、自然景物的创作之外,流行曲的内容多是男女偶遇之情,邂逅之意。人是感情的动物,偶遇之情在所难免,社会道德紧紧地束缚人们去表露偶遇之情,可是这情既已激起,就要有所依附,现实中既不许你去依附,便只有寄情于流行曲了,这是流行曲特别流行的主因。

问题是,男女偶遇之情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境界。如果过分沉迷于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肯定家将不家,国将不国。肯定偶遇之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生没有其他境界可开拓。人生的境界是无比广阔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一境界,“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是一境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一境界,“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也是一境界,“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更是一境界,可见得人生是没有必要执着于偶遇之情的。不过,流行歌曲唯一的作用,也许是你从偶遇之情的境界,带到另一更高人生境界的媒介。只是别忘了偶遇之情是只待成追忆的,而不能让它拖住你前进的脚步。

1982. 5. 8

河水日日流

晨跑时望着河水日日这样流着，忽然感到人生实在短促，在云南园织梦好像还是不久前的事，但一往前看，这一生所剩的能有所作为的日子也不太多了。

有时就私底下在计划，老年该怎样打发日子。继续钻研文学是必备科目，游山玩水是另一项目，阅读有关宗教的书会不会言之过早？不过看来是不会的。

我相信生命只有一次，而且不会有来生，西方乐土与天堂都是海市蜃楼，这样的看法使我很珍惜今生。我的晨跑不只为保持健康，还在于晨跑使我感到生命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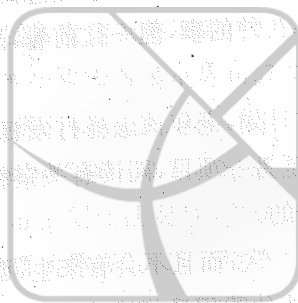
在书海中畅游，就感到个人很渺小，写不写作与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毫无关系。我还在动笔，并非全为文字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大半原因在于写作能充实我的生命，使我的生活多姿多彩。

看《八仙过海》与《济公》，很向往归返自然的逍遥生活，在此中年时期当然不应如此消极，晚年却肯定走这条路的。

人生若缺乏艺术，世间就会贫乏无味，因此很欣赏艺术家的美化人生。在鉴赏了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之后，心中一有感触就涂写下来，希望能为世间多添一点色彩。老年会不会写作，就得看心灵。

会不会枯竭而定了。我的生命就像河水那样日日流去，在这过程中能激起几朵浪花，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

1987. 3. 17



勇往直前

前些日子读同事写的一篇厦门之行的感受的文章,对文中提到陈嘉庚无私办学的精神很是感动。日前再读到《朝日新闻》晚报的一篇特写,谓包玉刚花费两千多万美元兴建宁波大学,也颇有感触。

三不朽或许是相当陈旧的观念,在这社会更受人冷淡。但凡对大众有积极贡献者,都会永远教人怀念,看来一点也不假。只是自认为对大众有贡献者,而私底下却是为谋个人福利着想,这样的人在有生之年或会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一旦撒手西归,权势不在,人们就会慢慢忘了他。

谁真正为大众做过事,历史会记载他。谁假公济私,历史也会批判他。历史的无情,正是人类历史无论怎样曲折迂回,最终总会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有一点须注意的是,在历史潮流中,个人的意志若不够坚强,眼光如不够锐利,往往会被历史浊流冲走。历史事件的是非,躬逢其盛者并不易下判断。拆资兴学到底是有先例可资借鉴的,其他事件就没那么容易当场论是非了。

有没有一些准绳可资参考,我想应该有的。凡对民族国家有利

的事,虽有人在一旁品头论足,应可鼓足勇气去做。即使在是非颠倒的时代,在众人讥笑中,依然要勇往直前。

684

短 视

旅居日本的一名庆应大学华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幅度很大，因而历史巅峰期若以抛物线来表示，其弧度并不高，美国建国迄今只有两百多年，历史幅度很小，因此巅峰期的弧度很高。

该教授说这些话时，已与我对饮了数杯日本酒，但头脑清醒，豪情万丈，显然对中华民族寄有厚望。假设中国有希望重新崛起为亚洲强国，则此教授的观点就很值得我们参考。

美国在战后成为超强，除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外，在二次大战中它没遭受战火蹂躏，显然也是个主因。美国又借各国外来的人才，把科技发展推向高峰。美国国富民强，英文也成为世界通用语文，设若世上没有美国，则英文会不会这样流行，就是个疑问了。

语文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语文在世界上地位的高低，与使用该种语文的国家的国势息息相关。一种语文的易学难学，与该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无绝对的关系。这些年来，由于日本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全世界学日文的人数以百万计，而日文的难学程度，与中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语言学的范畴里，日文是个孤儿，并无兄弟姐妹，比中文的少兄弟姐妹还要孤单，但学日文的与日俱增，可见语文受人重视，与使用该语文的国家的国势有密切关

系。

身为华族，我们或应懂得，在历史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民族总有兴衰旺弱的更迭的道理。当中国积弱时，华文自然少有外国人问津，当中国富强时，华文自然有人趋之若鹜。在中国还未富强时放弃华文，个人或许会得到一些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不只指经济利益而言，也包括整个文化在内。若为了眼前利益，只学英文而不学母语，那是短视的作法。

1987: 7. 1

现实照片

在各种文体中,大概以散文最能窥见作者的心态与动向,也因此,读者往往会误以为写惯散文的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其实这与事实不符。

无论是长篇巨制,或短小感触,当作者把作品写出来时,那已是他痛定思痛的事了。所以任何事件,无论当时曾教该作者多么激动过,在他决定写出来时,却已是往事如烟了,与听来的故事并无两样。唯一不同点是,他对亲身经历过的往事有切身的体验。

作者在创作时,是全身投入的,即使所写的并非自己经历过的,想象依旧会把他带入作品中的意境去。但创作完成后,作者就会回到现实中来,与常人一样生活。因此,我们若以为作者时时刻刻都如其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生活,那是错误的。

现实中的事件是残缺不全的,互不关连的,自然的美也是支离破碎的,作者在组织文章时,由于要使客观事件与环境为己服务,偷天换日就是个不可避免的手法。因此要从作品中去寻找作者的实际生活的影子,有时是要失望的。即使是多么写实的散文,也一定夹杂了作者的夸张与想象,再也找不出一模一样的事实来了。

我们应该准许写作人说“谎话”,作者若没这点权力,则其作品将是拙劣的现实照片,再也没艺术的感人力量了。

1987. 1. 11

深思的水滴

有时我们会像大海上的一滴水，身不由己地在浪涛中上下浮沉，日子就在喧闹与不自觉中消失了；有时我们又会像岸边的一洼积水的水滴，在阳光下深思，而发出富有哲理的光芒来。

大约十年前，我在东京的一家旅店与柳舜见过面。那是夜晚，在咖啡座朦胧灯光下，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真面目。

那天在安国旅店与他再次见面，是故乡酷热的五月天，小谈一会，很以为他是个活泼可爱的中年人。

然而这几天我把他的新著《MD 是这样选出来的》小说集读完，开头想每天只读一篇，在放工前半小时读。哪知一读之下，竟然欲罢不能，二十二篇小说在一周内读完。

我不禁要这么说：柳舜是波涛汹涌的海上的一滴水，他身不由己地在海中浮沉，但身手灵活的他，却又时时从浪涛中跃出，到岸边去晒太阳与深思。

玩世不恭者的即兴之作读得多了，读到要呕吐了，不期然接触到柳舜的小说，才恍然大悟在这社会也并非人人都醉。

人为什么活着？对吃饱太空闲者来说，这是个多余的问题。柳舜是忙碌的，他的装聋作哑，苦中作乐，似醉实醒的生活作风，使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机智的中年人，怎样在生活的海洋中随波逐浪的

同时,而又能从容脱身到一旁深思的可爱。

爱思索问题的文艺爱好者,我想应该读读这本小说集。

1987. 7. 23

[illegible]

诗般的生活

早晨六点乘船出港钓鱼，八点回港，到旅馆泡温泉浴，而后散步，看山看水，逍遥自在。一日三餐有人供应，生病有专医治疗，这样的生活胜似神仙。最近读《读卖新闻》的一篇特写，知道热海的一所老人院的老人生活就是这么惬意的。

热海是温泉胜地，我前后去过三四次，也在那儿的旅馆住宿过。洗温泉浴固然教人回味无穷，但更难忘的是流泛在街道的悠闲气氛。每次到热海感受此种宁静美时，我就会觉得人生短促，无谓的纷争无聊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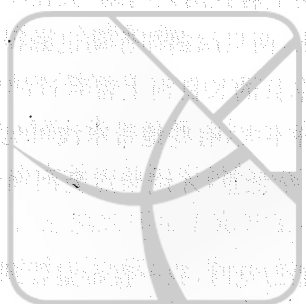
金刚怒目的年龄已过，这是细细品味人生的阶段。生活境界无比广阔，每开拓一寸就多了一层快乐。品尝之余，偶有所得，我就会把感受写出来。不是没哀伤，只是把它糅入生活感受中去，希望能激起大家的深思与探索。

毁誉由人是我的哲学，我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谓的朋友的背后一刀，时日久了，也渐淡忘，但不会原谅。文学是艺术，艺术不是谩骂、喊口号、刺伤别人。越来越发觉含有哲理的小品文耐读，它至少让你看到作者对生活真正的体会。

品味生活与关心时事并不冲突，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美，并把时代的哀伤糅入其中，这便是艺术品成功的要素。夕阳无人挽得住，

但与其在晚霞里逢人吐苦水，不如把山光水色连同自己的悲伤写出来。我欣赏热海老人的充满诗意的生活，他们若能提笔为文，肯定能写出感人的作品来。

1987.8.22



两只鸬鹚

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两只鸬鹚，关在相当大的一个笼子里，笼里还放着假山与水，两只鸬鹚却连动也懒得动，只蹲在那儿打盹。

我在日本岐阜县的长良河上曾看过鸬鹚捕鱼的精彩景况，于今难忘。长良河并不大，有些地带水浅可见河床，这大概是主办方要等日落薄暮、夜幕低垂，才烧柴点亮河面，以教鸬鹚表演捕鱼的原因吧。

在漓江上坐船游览时，我一直希望看到鸬鹚捕觅的情景，可惜始终没看到。漓江之晨，山青水绿，略一转弯，景色就变，游到半途，又下起潇潇雨来，此时若有渔翁提绳控制鸬鹚捕鱼，那情景就是画了。我想象得到，黄昏在漓江泛舟，若看鸬鹚捕鱼，那份诗情也是毕生难忘的。

展览会上失去山水衬托的鸬鹚，黑溜溜的，看去就像乌鸦一样丑陋，又不会捕鱼，简直就是废物。

搞艺术者不能离开他的乡土，因为家乡民众的生活就是他创造的源泉。离开乡土而以为还能为他国民众作出贡献，往往是要落得像展览会上的鸬鹚一样，别说原有本领施展不出，就连供人观赏的价值都没了。

1987.9.22

鹭江苍茫厦大情

暮春三月，厦大的晨昏依然春寒料峭，夜里校园内雾气尤重，迷蒙一片，为厦大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

由于万多名莘莘学子都寄宿校内，加上数千职员及其家属也都住在校园里，厦大无论早晚，偌大的校园四处都有人群在活动，显得生气蓬勃，与泉州华侨大学的校园宁静气氛成为强烈对比。

我们在校园内漫步时，总感到那是个充满生机而又没沾染上市俗的庸俗习气的场所，是个可以献出一生，为某种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安乐窝。

在文化上好像属于吉卜赛人的心态的我，更在厦大看到当年南大的景象。厦大的好多幢楼都是校友或民族资本家捐建的，厦大的教职员绝大多数是校友，这些特点使得厦大的凝聚力更为强大，而我也从中看到厦大生与南大生有相似的热爱母校的精神。这种精神应是建设社会的动力，多少年来，我们这种精神却无所附丽，想起来令人感慨万千。

厦大的人工湖湖畔柳丝飘曳，湖面水波不兴，与远处的飞檐古楼相映成趣，那是一幅绝难描绘的佳景。面向运动场的一排古色古香的楼阁，更教人想起南大行政楼及其前面的云南园的格局，是否有借鉴厦大的构想？

厦大校园内竖立的陈嘉庚与鲁迅塑像,说明这是尊重历史与培养民族脊梁的场所。这种发扬正气的作风,加上校友热爱母校与回报母校的精神,使厦大无庸赘言是前途似锦的。这与南大生的只能以天涯为家,而在遥远的地方热心关怀母校的存亡,其辛酸滋味又怎能与厦大生的幸福感相提并论呢?作为已无巢可归的劳燕,我不难从厦大校园内的景致。从其周围的事物中找到我在南大所失去的感情附着物。

闽江迂回流贯全福建省,武夷山风光可媲美桂林,鼓浪屿空气一尘不染,鹭江江面烟波苍茫。福建省内千山万壑,悬崖绝壁何其多,这山山水水,树树木木,何处不可系住我这拥有吉卜赛人心态者的情感?我感慨的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何止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塑造与建设?相比之下,南大生的落寞情怀与要献身而无处可施展抱负的哀伤,又何足道哉?更何况说,南大生要在鼓浪屿、钱塘江旁、西湖畔或故宫里逍遥度过残余岁月并不太难。

南普陀寺的紧邻厦大,无形中为厦大增添几分宁静美。寺庙之美与橙色木棉盛大花朵,又为厦大添上妩媚之美。称得上地灵人杰的厦大,只要加快开放门户,多吸收外国人才并学习外国大学的优点,厦大何愁不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

我由厦大生黄昏时分在篮球场上打球运动,清晨时分在湖畔或南普陀寺苦读的情景,隐约看到当年南大生的影子。俱往矣,当年南大生的此情此景,我只能从厦大生此时的奋斗情景中去追忆。

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岁月会把真理磨得更光辉夺目。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固然更能洞明过去的是非曲折,但对那不可挽回的事故,却难免要感到扼腕的遗憾。我看到厦大的锦绣前程,也哀伤南大的英年早逝,这两种复杂而又交叉在一起的感情,使我这在厦大短暂漫游的过客,对厦大产生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触。

大隐应可隐于鼓浪屿

春雨飘洒中在渡轮上看远处的鼓浪屿，迷迷蒙蒙一片，真有人生如梦之感。

绵绵春雨停歇后的鼓浪屿，空气显得更为清新，从郑成功塑像竖立处远望过去，鹭江苍苍茫茫，水天相接处烟波浩渺，台湾海峡波涛汹涌，顿有人生在世瞬如烟雾之叹。

我此次到福建一游，并在鼓浪屿漫步，是比预定中的日子早了十年左右。我原本打算在退休后的晚年，与亡妻葆梅携手遨游大江南北，鼓浪屿自是我们朝看旭日、晚观夕照的最佳地点。然而世事确实难以预料，她竟于三年前因病逝世，而今与我偕游的，是我新婚的娇妻。

鼓浪屿的美全在一个静字，一上岸向左转向郑成功花园处走去，庭园式的楼房依山势逶迤而上，周遭静得似乎连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微寒的空气里，流泛着一种鸟鸣山更幽的诗意。我若利用剩余的岁月的若干时日，徜徉于此小岛上，应是一大快事。

鼓浪屿总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地势陡斜，地面全用花石或石块铺成，洁净如洗，山路绿树掩映，鲜花盛开，空气很是新鲜清凉，使人精神异常愉快。

日光岩并不太高，但它踞全岛中央，站在日光岩上鸟瞰鹭江，

海上诸景全都映入眼帘，海天一片空阔，人顿有脱俗之感。

菽庄花园临海的那一角，若值涨潮，一边在夕阳下把酒观潮，一边回看百花盛开，人生有此享受，真的夫复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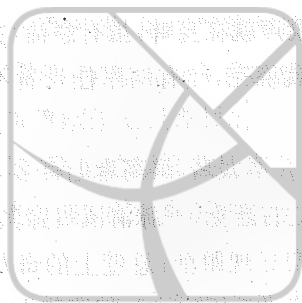
鼓浪屿那几条出现餐馆与小商店的街道，隐隐透露出几分商业气息，也掺杂着几分文化情调，但那文化情调似乎稍嫌古拙了点，缺少了精致文化的优雅感。

其实何止是鼓浪屿缺乏精致文化的幽雅情调，作为福建省南方都市的厦门，若没厦大与南普陀寺的坐镇，恐怕也会被商业气息所淹没。厦门的几条主要街道古朴，与厦门市场上贩卖着的好多外国产品的繁华景象，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既说明厦门的基本设施的建设远追不上经济的迅速发展，也透露出一般市民在经济开放政策中难免会有几分迷惘感。

与厦门只有一水之隔的鼓浪屿的居民，除了远眺对岸矗立的几幢高楼大厦而得到可赚点旅客的小钱的灵感外，他们基本上还是相当纯朴的。如果说近山者仁是有根据的论断，那住在占福建土地百分之九十的福建山区的人们，其基本个性就是忠厚的，这点我从福州、武夷山、泉州以至厦门所接触到的人们身上，得到了印证。与上述这些地方的人们比较起来，鼓浪屿的人们好像更纯朴了点。我与太太因离队登上日光岩，虽准时到达渡轮码头的集合点，却又因找不到同团旅伴而焦急不安的神情，让年轻的轿夫看到了，他竟再三安慰我们，并告之他并未看到同团旅伴抵达码头。他那种不求酬报，关心别人的诚恳态度，在厦门这开放了的都市，无异是颗闪闪发亮的水晶。

鼓浪屿也可说是厦门旁边未曾沾染上尘埃的一粒珍珠，它是“大隐隐于市”者的理想场所。从鼓浪屿乘渡轮只须几分钟即可抵达厦门闹市，在那儿你可到豪华旅馆前尝咖啡，或到街边小店吃福建小吃，然后再搭十多分钟的巴士，即可到厦大或南普陀寺。

与武夷山相比,鼓浪屿有它的宁静,但却没有过于清冷的缺点。我想一个人若把他的生命中的若干岁月掷在鼓浪屿,并到厦大去寻找一些资料,思考并整理一些与人类前景有关的课题和理论,那应是一件很惬意的事。鼓浪屿靠海处的那些房子,至今仍是厦大教授们的居所,这就足以说明它是“大隐隐于市”者的梦乡。



武夷山水涤尽我尘埃

游武夷山的总体感觉是清凉透剔，山就在眼前，水就在脚下，竹筏顺流而下，溪声就在身畔，虽有急流，并无险滩，十里长的九曲溪，一个多小时就绕完，颇有两岸佳景看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

武夷山诸峰并不太高，最高者七百多米，余者都在四五百米上下，但峰峦岩壑左右矗立，一脉清溪贯穿其间，人在竹筏上坐着，水流筏移，两岸山峦尽现眼前；悬壁上的奇花异草，“悬棺”、“钓竿”、“虹桥板”、“仙机”、“千年稻草”，都历历在目。武夷山之美像个坦率的人，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心事都吐露出来，而且是这么地贴近你，使你一下子就看清了它的真面目。我不知道在细雨飘洒的时刻，武夷山的景致会是何等模样，但在阳光明媚的早上，它的确像个坦率的性情中人，让你一览无遗的看穿它的一切。

我曾在中秋又飘着细雨的早晨游漓江，漓江极像蒙上面纱的美女，美是够美的，但太神秘了，太恍惚了，太遥远了。它又像是个梦，很美，但当你要走近看时，它又消失了。它更像是一幅渐渐淡出的山水画，意境朦胧得有点凄清，也美得教人窒息，但你只可远观，绝对无法捕捉住它的真面目。

漓江的美，美在虚无飘渺，武夷山的美，美在眉清目秀，美在一

览无遗。武夷山的九曲溪像条彩带，环绕着武夷诸峰而流去，人坐在竹筏上，筏移景变，悬崖绝壁就迎面而来，山峰又不是非常高，崖上的一切东西，自然都可清清楚楚看到，武夷诸峰的美因此历历在目。

武夷山自古就是儒家学者设坛讲学之地，朱熹创办的武夷精舍遗址尚在。武夷山市这山城也相当清洁秀丽，但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我想武夷山并不是个理想的隐居场所。武夷山只可作为稍息处，让你澄清一些杂念，让你思考一些困惑的课题，但绝对不可在那儿终老。

福建省山地和丘陵占其总面积百分之九十，境内崇山峻岭不计其数，黄冈山高达两千一百多米，但论气势与神韵，还是以武夷山为最。武夷山的夜是宁静的，宁静得有点荒凉感。武夷山的空气是异常清新的，清新得像世界刚刚出世那样的一尘不染。上武夷山的路并不短，在此修路时期，路上的颠簸更是难受。但沿途看到的长排树木，山坡上的粉红色桃花，流水奔泻的水坝及闽江岸畔的景致，也足教人倦意全消。

朋友说，游了武夷山和鼓浪屿，才算得上是游过福建，我想这很有道理。游了武夷山，我不仅领会到福建名山的独特神韵，浑身尘埃也被洗涤得一干二净。

初步印象

——韩国纪行之一

下午飞机一飞离台湾，天气就转为晴朗，因台北阴沉的天而滋生的抑郁心情，在看到万里碧空时，就立即转为开朗。早晨九点半新航机长发现原班机的一个机器有小毛病，全体搭客被迫换机。延到二十点半才起飞，那种焦急不安的感受，在进入韩国领域时，在黄昏七点半还能看到暮霭，精神立刻为之大振。韩国，这宁静晨曦中的土地，我到底有机会一睹你的丰采。

迎接我的是新闻官赵君，年三十一，一年半前才加入韩国海外情报服务署。他为人很忠厚，有点木讷，但很爱国。车子甫离开机场，他就幽幽地对我说，韩国有千千万万家庭被人为地拆散。这样地对一位陌生人作披肝沥胆的倾诉，着实令我诧异，但接着下来的几天，与其他官员接触后，才了解到韩国人对南北统一的渴望是非常的殷切。

车子渐渐进入市区，我发现汉城的建设的宏大，三年的南北韩战争，把汉城变成一个废墟，战争结束后的李承晚时代，韩国基本上还是处于动荡不安中，一九六二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十九年来，汉城已由废墟发展成东亚区域一个大都市，那高速公路，决不比东京的逊色，那高耸的摩登建筑物，那蜿蜒的地下的火车，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满街驰走的汽车，都在说明汉城已成长为一个

大都市。

车子经过汉江，一股异味从车窗涌入，赵君立即吩咐司机金先生关上车窗。我事后知道，那是汉江江水受污染而散发的臭味。这原来是件小事，但赵君的行为，给我很大的感触，在庆州时，他尽量详尽地对我讲述新罗文化。其实也不仅仅是赵君，在参观“新村运动”时的那位讲述员韩小姐，在参观大雄殿时的那位导游员金先生，都是很爱国的。韩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一半是由于教育普及，高级知识分子参政，另一半我看还是由于潜伏在韩国人心里的爱国意识促成。

我小时候曾读过一篇批评韩国人懒散的文章，这样的事，在今天的韩国已成为历史。抵达旅馆已是晚上八点半，但旅馆对面的工人，还在昏黄的灯光下孜孜不倦地建设地下铁。翌晨八时，工人也早已开始工作了，汉城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人民都很勤劳。

汉城市内

——韩国纪行之二

韩国多山，山地占全面积的 67%，平原占其 23%，可耕地只占 10%。自李朝起就是韩国首都的汉城，也处处是山。从旅馆往外望，汉城三面都被山围住，因为山多，汉城的格调有点像香港，但比香港更多雾，早晨九点多，小山上还是迷迷蒙蒙。在这多山地带，要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就不是一件易事；汉城的规格比东京小，就因为山多，发展受到环境极大的限制致然的。在与副总理兼经济计划厅厅长的高级顾问金基桓博士交谈时，金博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新加坡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亚细安的中心，而汉城则能成为东亚区域的中心，这不能说是没道理的梦想，但汉城处处是山，要发展成为东京那么大的都市，就非移山倒海，假以时日，是难以如愿以偿的。不过，韩国自一九四五年摆脱日本三十六年的统治后，人民悔恨在日治时期，本身没机会接受良好教育，所以现在即使变卖土地屋子，也要让下一代受完大学教育。三十多年来，韩国出现了一批饱学的年轻一代。韩国现有 222 间大学及学院，单单汉城就有五十八间大学或学院，博士对韩国人来说，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衔头。带领我到处观光的李先珪先生，除在台湾受过四年的正统大学教育外，还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但在韩国海外公报局里，却只当个顾问，饱学之士的众多，是造成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不能鹤

立鸡群的原因,但也正由于饱学之士的众多,韩国过去二十年来才能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

汉城不是没有夜生活,但宵禁影响所及,购物中心未及八九时都关了门,市中心入夜车辆就少了,寂寥的格调倒和日本长崎市有点相似。

但是,汉城的早晨却很有气氛,在高耸建筑物的背后的横街窄巷,你可看到一摊摊的小贩,摆在大商店门口的街道,人参,腌菜,陶器,电器,甜品,小零食,应有尽有,你尽可慢慢地沿着斜斜的马路走下来,从容不迫地采购一两项你喜欢的物品,在这儿,你就能感觉到,汉城的生活节奏,到底是比较悠闲的,和东京上野公园旁的横巷的那一种喧哗气氛,或新宿火车站的那种嘈杂一比,汉城的气氛就优雅多了,宁静晨曦中的土地,在汉城横街窄巷里,你就能感受一二。

出了汉城中心,你可以看到好多低低的二三层建筑物。汉城目前还只有两条地下铁,另两条目前正在兴建中,市外低矮的建筑物,说明汉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力。随着另两条地下铁的完成,汉城市周遭低矮建筑物必然被拆掉,另建高耸的楼宇,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汉城的发展是会受到多山的阻碍,但汉城还有好多待发展的潜能。

板门店去来

——韩国纪行之三

从汉城到板门店只有六十公里，初夏天气，汉城的早晨气温是摄氏 15 度，汽车沿着宽阔的公路北上，一路晨风送嫩寒，田野水稻漠漠，小山丘青翠一片，古雅的农舍和摩登的农家相映成趣，与向导李先珪先生谈谈笑笑，不到一点钟已到了自由桥。自由桥是用木头搭起来的桥梁，宽度仅能容一辆车子通过，本来，还有另外一座桥与自由桥平行，但在战争中被炸毁，现在只有桥墩还残留着。

自由桥建在临津江上，临津江水清澈，又是初夏，水草碧绿，岸树葱郁，微风轻拂，水波荡漾，人到此处，心情颇为舒畅。

临津江畔建有一座临津阁，守卫的韩美军士问明我们的身份后，车子就沿着自由桥驰去；过了自由桥就是缓冲区，缓冲地带处于北纬三十八度，阔四公里，南北各二公里，在缓冲区内，有一个统一村，住着百多家农户，据说这儿的农民享有特权，不必服兵役，也不用缴纳税务，每年的平均收入较一般韩国农民为高。在缓冲区内放目远望，但见远方崇山峻岭起伏，近处丘陵、原野、树木、桥梁，在灿烂的初夏阳光下，显得一片平静与安宁，但缓冲区并不是真正的这样安详，在听取了韩国边疆守将金少校的解释，再观看历史性的幻灯片后，看到韩战停火签约地点的荷枪实弹的兵士，你就能想象出卅一年前南北韩战争的残酷。

停火签约地点的这方是和平楼，旅客可登楼远望那方的朝鲜的板门店，南北韩各方的兵士就站在签约地点的边缘，彼此监视着。

停火签约地点有一间简陋的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长桌子，中央划了一条线，据说这条线就是划分南北的准则，桌子的两边各有五个座位，北方的除朝鲜代表外，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南方的则有美韩军代表的座位，南北谈判会议不时举行，但毫无结果。

在板门店，当你看到那个“不归桥”时，你就会有无限的感触，“不归桥”的两头设有各自的检问站，双方在这里交换俘虏，谁一过了这座桥，无论由北南下或从北上的，都不能改变主意走回头路的，在这儿可以看到朝鲜的国境，他们的村落上空，飘扬着一面旗，南北国土，近在眼前，却又是那般远不可及。

到板门店，我们还参观了地下通道，据韩国军方官员说，自1974年以来，韩国连续发现了三个地下通道，每个通道都可同时让三四人并行。韩国军方官员说这是朝鲜挖掘的，想利用这些通道入侵韩国，朝鲜则说这是韩国自己挖的，意在污蔑朝鲜的好战，朝鲜说在这核弹时代，朝鲜若有意入侵韩国，又何必劳师动众挖掘地道呢！尽管双方各执一说，对第三者的我们来说，却认为与其浪费精力去挖掘地道，不如用这精力去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世界上除了南北韩的分隔，还有东西德、台湾与中国。但一位韩国官员对我说，无论东西德或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没有比南北韩对峙的严重，韩国有六十万大军，朝鲜据说有七十万大军，势均力敌，双方要通过和平谈判以求统一，就非要更大的努力不能达成的，韩国与朝鲜的统一，是双方人民殷切期望的，但这统一就像汉城上空的一朵云，看来是这么地近，实际上却又是那么遥远与不可捕捉。

宁静的庆州的夜

——韩国纪行之四

由汉城乘火车到新罗故都庆州须四个多钟头，时序是初夏，农民栽种的秧苗都半尺高了，青青翠翠的，偶尔在水田里还可以看到几只白鹭鹭，逍遥自在左顾右盼。我们四人同行，带领我的是赵君，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的纳南拉惹及其带领人朴先生。

一出汉城，就可以看到许多相当新颖，而又古色古香的韩国式的屋子，屋子都有高出人头的土墙围住，一派宁静又安详的农村景色，加上风趣健谈的朴先生，谈笑间庆州已在望了。

一进庆州，沿途就看到许许多多高高的掌状杨木，像迎客人似的，在风中摇摆。据说这是韩国的典型风光，但在汉城，在釜山，我都没看到杨木。风自南方来，杨木的叶子就向北斜，远看去，屏风似的水田、远山，就俨然是图画了。

借宿在朝鲜旅馆，凭窗望下去，一湖碧水，波光潋潋，湖畔遍植柳树，游人坐着天鹅舟在环湖逍遥，偏左是仿新罗时代格调与色彩的建设物群，就是贩卖民艺品的场所，但建筑物的讲究设计：一个耸立在古色古香建筑物群中的五重塔，飞檐回廊，鬓香衣影，还未前往参观古迹，庆州立即就给我一种历史的芬芳。在这儿我忆起已十年没上去的云南园，也想起曾三度造访的京都。庆州，云南园，京都，我隐然体会到中、韩、日三国的文化是那么的血肉关连。

丢下行李，跳上汽车，到庆州古坟场已是下午三点半，庆州是新罗朝的首都，新罗统治韩国三百多年，留下很多历史古迹。庆州城内外约有三百座新罗朝帝王及王公大臣的坟墓。每个古坟都高约六十英尺，呈抛物线状，像个小土丘，据庆州市的金向导说，凡有两个坟在一起的，那个较低的就是皇后的；古坟都种上草皮，修剪有致，古坟场又栽了好多松树，人在绿色丛中走，心情就很开朗。

朴先生说，由于韩国每年都得把35%以上的财政预算花在国防上，发掘古坟的工作只好缓后，目前已挖掘出来的只有天马冢供人参观。天马冢内有许多新罗时代的文物，诸如古剑，玉饰，瓷器，王冠等等，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那顶金王冠，据说全是用纯金做的，冠顶又缀以翠玉，整个王冠的设计是重叠“山”形，所以从上面看下去，单层是山，双层成“出”，三层即是“王”了。

看完古坟，在赶往吐含山佛国寺途中，我们又从车内看到一个据说是亚洲最古老的天文台，天文台像个火炉，共用三百六十五块石砖砌成，据说古人在司观天象时，要攀登这天文台，既可看台下水池中的星辰倒影，又可看天空的星辰，现在只剩下那个天文台，用栏杆围着。

佛国寺的规模宏大，两旁有两座石塔飞檐雕栋，甚为美观，据说佛国寺在十六世纪，当日本浪民入侵庆州时，被夷为平地，日本人被赶出后，当地人民重新将它建立起来，今日所见到的佛国寺，外形与原物全然一样。

夜晚在一间典型的韩国餐馆进膳，几位女招待都很文雅，听说是大学生，晚上兼职赚取生活费，可惜她们除了韩国话外，外语不行，只好苦了我们的朴先生，又忙着喝酒，吃饭，又忙着翻译。与京都的女孩子一样，我觉得庆州的少女也较斯文端庄，当晚谈谈笑笑到十点多才回旅馆。

翌晨我七点起身，赶紧跑到湖畔去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匆匆赶去蔚山参观浦港钢铁厂。

上浦项下蔚山

——韩国纪行之五

因为要参观浦项钢铁厂，我们在早晨九点就离开朝鲜旅馆。几十公里的路程，约莫四十分钟就走完，浦项钢铁厂研究室设在一个小丘上，我们在那儿观看了一部介绍该厂历史、操作、组织的幻灯片。浦项钢铁厂占地近九百万平方米，雇员一万四千八百名，第四个也是最后的一个炼铁炉在今年二月完成，目前的年生产量可达八百五十万吨。该厂组织严密，有自己的学校，由幼稚园到高级中学，技术学院，都用以供雇员的子女攻读，但也不排斥非雇员的子女就读；它也有自己的组屋提供给雇员居住，只收象征性的维修费；它既有自己的医院诊疗所，也有自己的运动场、音乐厅、图书馆、百货公司，一句话，浦项俨然是个小王国，在坐车去参观钢铁的生产过程途中，我们路过该厂的雇员组屋，学校，医院，那清幽的环境，真有点羨煞人也，难怪负责讲解的金先生很自豪地说，该厂雇员的辞职，几乎绝无仅有。

钢铁的生产程序，由高炉，炼钢炉，到铸钢块，热间压延，冷间压延，到产品完成，都是由电脑操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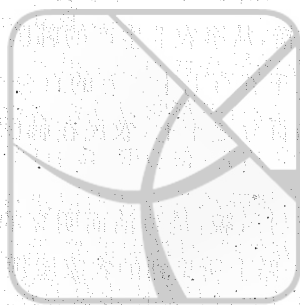
由于下午两点要参观“现代造船厂”，我们又由浦项返庆州南下蔚山市。“现代造船厂”是“现代集团”属下的十个公司，“现代集团”计有廿五个公司，从事各种轻重工业品的生产。

“现代造船厂”是韩国最大的造船厂之一，除建造普通的货船外，也建造超级巨型油槽船，兼修补旧船，我们参观时，有好几艘大船，都在接近竣工的阶段。

该造船厂拥有一切最新设备，又引进优良的管理方法，据说工人们很勤勉很认真，目前该厂已是世界有名的造船厂之一，订单来自世界各国，由发展中国家如中东诸国，到先进国如英美等。

为了赶搭飞机返汉城，我们在下午三点就匆匆离开造船厂，南下釜山。

1981.6.30



“新村运动”

——韩国纪行之六

到韩国观光而没去参观“新村运动”，就像到日本游玩而没上富士山一样令人惋惜，从事农业生产的韩国人计有四百七十多万，占全国就业人士二千五百七十二万的百分之十八，韩国农产品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农民在韩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

今日的韩国农村风貌，是整洁而明亮的，由汉城南下庆州，又由庆州南下釜山，一路上所见到的农家屋顶，有红瓦的，有蓝瓦的，有绿瓦的，也有灰瓦的，都盖得整整齐齐，很现代化。据说五十年代的韩国农村是陈旧破落的，农家都是用稻草盖顶，自从两个五年计划在六十年代初期实现以来，韩国经济突飞猛进，人们认识到只要努力苦干，就能获得成功的道理。但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工业，结果出现工业增长率甚高，而农业增长率过低的现象，城乡人民的收入差距甚大，造成大量农民涌向城市。长此以往，农村就会凋敝，有鉴于此，政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即强调工农业的均衡发展，以二十亿美元投入农业发展，可是原本根深蒂固于韩国的，强调礼节与仪式而轻视劳力者的思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因素，而独立后的韩国，从西方引进的又只是放纵，堕落，贪污，虚荣及浪费等恶习，这也是会妨碍社会进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村运动”于焉

展开,“新村运动”宗旨在鼓励勤奋、自助及合作的精神,通过这些美德来改善生活水准,从而建立起一套新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平等。

新村的基本单位是农户,我到离汉城二十多公里参观的一个新村,是由八十户家庭组成的,在这个新村里,有两位村长,一男一女,都是众望所孚的人物,每个新村每个月至少开1次会议,商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也召开临时会议,讨论紧急问题,村长是义务的,而新村的费用来自该村妇女会经营小商店生意所赚取的盈利。负责讲解的韩小姐告诉我,该新村共有十多架耕田机,九个公共电话,两辆小货车,维系着新村的是守望相助的精神,例如有人要到城里去买东西,其他农户就可托他买,由于是大宗采购货物,价格便宜了,时间也节省了。

早期的新村运动目标集中在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上,如修葺屋顶,改良卫生设备,藉此培养自助精神;接着是鼓励农民遴选领袖,呈献改良乡村环境的计划,如造桥,灌溉系统,水利设备等,通过这些活动来使农民获取组织与合作的经验;第三步骤是鼓励农民实现能增加收入的计划,如集体耕种,饲养家禽,设立共同市场,建立新村工厂等,整个运动是由内政部长主持的一个中央咨询委员会负责审定方针,遵循着这些方针,每个新村发展委员会可自定发展计划。

自1970年实行以来至今已有十年的新村运动,据说收效甚大,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由1970年的每户农家的收入的七百四十七美元,增至1979年的四千八百美元。新村运动不仅深入到农村的各角落去,现在连城市居民,也吸取这种精神而成立他们的“新村运动”或自助委员会,由1973年到1980年已有一万三千多名外国人参观过“新村运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告别汉城

——韩国纪行之七

由东京起飞，横过日本海，在两小时之内，就可抵达汉城，距离不可说远，在东京又呆过五个年头，我竟无缘北上一睹韩国风光，这次承蒙韩国文化暨公报部的邀请，得以在韩国溜达一周，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的由北到南，又由南北返汉城，所见所闻，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厚颜地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与其说是反映了韩国的国情，不如说是我对韩国的观感。人能从印象归出结论来，但只有反复印证过的印象得出的结论，才能较符合事实，走马观花看一个国家，而又得报导，则这报导就只能是观感，而不一定尽符事实。

从飞机上下望汉城，但见群山环绕，及至随车走入汉城，但见高速公路纵横贯通，高耸建筑物林立。地理环境的恶劣，并不能阻碍汉城发展成为东亚一大都市，人定胜天的理论于此获得证明。而韩国人的强烈爱国心及不屈不挠力争上游的精神，令人钦佩。

及至南下庆州，见到古坟古文物，庙宇重塔，仿新罗朝的建筑物，湖光山色，翠杨碧柳，才又发觉韩国人的精神力量，却也是有深厚的文化为其根基的。外敌的入侵，惨痛的历史经验，对一个民族的折磨不可谓不大，但也正由于有痛定思痛的悲伤，才能激发一个民族的勇往向前。韩国的五十年代是一无所有的，由无到有，由落后到摩登，由贫困到富裕，靠的就是一份爱国心，一个向人看齐的

理想。汉江的水污染了,那是工业化的代价,但这代价却为韩国赢得汉江的奇迹的美誉。

由北面南下釜山,由釜山而北上汉城,沿途在漠漠水田上看到一两只牛在耕田,据韩国人说那是他们爱护动物的一种表现,而非想藉牛来助耕。在餐馆吃饭,只要不是中西餐,照例都有一小碟腌菜,这当然也不是下饭物,而是一种对传统食品的喜爱的表现,人而无根,就会到处飘泊,国家而至无文化,就容易被外敌入侵,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期三十六年,而能长期不屈地抵抗,就因有文化的根在支撑着。

到韩国是一个短暂的偶然,在偶然里我不曾在一杨二柳的枝梢上留下任何痕迹,但在偶然里我却发现韩国文化与中国及日本文化又何其相似,从这相似我又想起根的重要,有根深蒂固的文化的韩国,其前途是光明灿烂的。我们将何去何从呢?在飞机首途东京时,我兴起这份惆怅,但无人能回答我的思索,只有一轮渐渐西沉的落日,把余晖洒落整个汉城,告别了,你这宁静晨曦中的土地上的一颗珍珠,你的文化的芬芳将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哪一天我有机会重探你的风姿。

1981.7.2

野史传说 堪足玩味

如果撇开史实不谈，还在电视台上演的连续剧《大内群英》，是一部颇有看头的好剧本。整出剧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年羹尧与曾静。年羹尧是可悲的人物，而曾静却是个颇为可爱的人物。

年羹尧最可悲的地方是死心塌地地为雍正卖命，结果却落得个恩赐一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年羹尧是个汉人，为满州统治者效命，他的聪明才智，军事才干，确是高人一等。春风得意时，他智

解十四阿哥的兵权，为雍正除去心上一大隐忧，也帮忙雍正镇压汉人。论功劳，简直可与天比高，但终于失去雍正的爱戴而横死，归根结底一句话，是年羹尧的奴才性格致然的。

年羹尧的错，错在以雍正的意旨为天下人的心声，而不是以人民心声为心声。由于以皇帝的喜怒哀乐为处事标准，年羹尧的所做所为，并不是为了争取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讨雍正的欢心。为了讨雍正的欢心，年羹尧就经常打边鼓，由于浑然沉醉在打边鼓的境界中，以致边鼓走了调还不自觉，结果触怒了雍正，而告自杀了结一生。年羹尧的下场，诚然教人同情，但仔细想想，却也是咎由自取，说穿了，是他利欲熏心，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致然的。

比较起来，曾静就可爱得多了。曾静的武功与聪明才智，并不比年羹尧差。曾静只要把效忠的对象变一变，他何愁没有高官做。可惜的是，他过于效忠十四阿哥了。十四阿哥的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既是他不能成器的主因，也是造成曾静终生落魄、空有才华无处施展的主因。但曾静较年羹尧可爱的地方是，他看得破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他想扶助十四阿哥为皇帝，是希望十四阿哥能照顾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因此当他发觉十四阿哥是个阿斗时，他远离宫廷，结舍在海滨渔村，看浪花，看海景，在清风与明月下逍遥过日子。曾静这种受器重时“夜里挑灯看剑”，受冷落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胸襟，确实教人赞赏。可惜的是，曾静在十四阿哥遇难时，却又重返宫廷，以致招来杀身之祸。曾静的错，错在不能忘怀，错在涉入宫廷的权力斗争中去。

宫廷斗争，原本就是皇亲国戚之间的事，既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曾静就不该在皇亲国戚相互射来射去的弹林中奔走，因为这与国家利益扯不上关系。曾静不自觉地奔走在弹林中，而致招来流弹击中毙命，这下场也令人歛歔不已。

当然,《大内群英》是根据野史与传说而编就的电视剧,但野史与传说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蕴藏着民众的爱与恨,悲与喜,褒善或贬恶的是非标准,而且这种是非标准,往往又是万古常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内群英》的歌颂曾静与贬抑年羹尧,正是民众爱憎分明的具体表现。

1982.5.4



文化素质与地方戏剧

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摄冶在谈及新加坡的文化时曾说,如果我国人民不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当成是他们的文化素质,那无论怎样好的演出,观众都无法欣赏,他也说由于生活紧张,我们慢慢失去了上一代交给我们的美德,因此文化部除了鼓励演出外,还推动文化团体去搞能表现我们已经有的,但被冲淡的美德的演出,邝部长更提及地方戏剧的故事家喻户晓,台下的观众看了有亲切感,因此各民族文化团体搞演出的时候,应以表现他们本身文化的素质为大前提。

邝部长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地方戏剧戏目中所宣扬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思想,确实是能在民众中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尤其是际此我们在推行儒家思想教育的时刻,地方戏剧若能继续为民众所接受,那儒家思想就更能深入民间去。

但是客观环境的发展却呈现两大不利于地方戏剧生存的因素。一是随着老一辈观众的日渐消失,地方戏剧恐怕难以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二是随着讲华语运动的日益收效,二十年后的我国恐怕将是华、英语的社会,方言会渐渐消失,那地方戏剧也就没人听得懂了。

地方戏剧吸引人的地方很多,戏目中所宣扬的思想与我们的

传统有关连,是最主要的因素。戏目内容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也是个重要因素。此外,地方戏剧由歌、舞、唱于一体的表演形式,更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这三大因素中最容易丧失的,是戏目内容,原因是年轻一代的国民,由于华文程度低,就不可能去阅读家喻户晓的故事。年轻一代既有可能不熟悉地方戏剧戏目中的内容,那地方戏剧对他们来说也就会和外国戏剧一样陌生了。

这种局面如果出现,我们就很可能要面对一段青黄不接的、年轻人既不能欣赏外国戏剧、也不能接受地方戏剧的真空年代,在这年代里,消费文化恐怕会大行其道的,这是个教人担忧的局面。

地方戏剧既然在主题思想,故事内容与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可取处,我们是否可考虑把地方戏剧中的名戏目,简化为“折子戏”,通过歌、舞、唱形式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就能吸收到地方戏剧的精华。

地方戏剧当然不是文化的全部,但却是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地方戏剧面对的存亡问题,也是其他文化形式会面对的难题,我们要何去何从呢,现在应该是我们坐下来深思的时候了。

1982.7.13

书法不是消闲艺术

对学中国画的人来说，书法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技术，一幅无论多么精彩绝妙的中国水墨画，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说明画意的诗句，并以带艺术风格的书法来衬托出画的意境，那该幅水墨画就会黯然失色。其实，书法的功用，也不只限于与中国画有绿叶牡丹、相得益彰的好处，更精确地说，传统的中国画是不能没有书法的烘托的，但书法却能岿然独立。从这一点来看，书法的生命力，恐怕比中国文人画还强呢！

书法也不单单是文人雅士的嗜好品，以我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说，东京的浅草之美，周遭情调之柔和，除了是日本音乐的渲染，红灯笼散发的光的酝酿外，日本书道的柔美，也是个要素。在日本，书道已深入到民间的各个角落去。在嘈杂的东京都内，你随便钻进较具传统味道的日本餐厅，情绪往往都会被悬挂在壁上的书道镇定下来，有时还能读到张继的《枫桥夜泊》呢！在日本的度假胜地的旅馆，庭园的假山流水的潺潺，杨柳的摇曳生姿，远山的含翠，本已够你沉醉的了，看倦了，你把视线收回来投在室内，赫然发现有两幅精巧雅致的书道，又使你感到室内也是春意盎然。

书道在日本已是大众化的一门艺术，就和插花艺术与茶道艺术是日本妇女的必学艺术一样普及。我看有 90% 以上的日本男女

所写的汉字,都非常端正。我的感觉是书法对日本人的性格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他们无论做什么事,即使是芝麻小事,也是尽心尽力,谨慎异常去处理上。因此说书法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起着协调作用,已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我国独立十七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过度强调工艺科目的学习的结果是,人民过于注重物质生活,而忽略了文化修养的重要性。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除了求温饱外,还要求能有精神生活享受。由精神生活中培养出来的既优雅又坚强的性格,不只是人类异于禽兽的特点,也是人类能持续创造物质文明的原动力。因此,在取得高度经济成就的现在,我们要鼓励人民从事文化建设活动,确实是及时的措施。

但对功利思想很浓的人来说,所谓优雅情操的培养,总不比即时能收到物质享受的功能来得更有吸引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引导人民喜爱艺术,尤其是作书法这种无利可图的艺术,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因此麟记区国会议员欧进福博士在全国书法比赛颁奖会上建议,教育部在修订美术科的教学内容和会考纲目时,应把书法列入。这不失为一个可推广书法的可行办法。昨日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先生透露,教育部已决定把中文书法列为美术科的课程之一,这么看来,书法或许还不致于在我国消失了。

1982. 9. 4

说话亲切 态度悠闲

法国著名小说家法朗士对文艺批评所持的态度是，“维持着亲切说话的语气与闲游缓步的态度。”这颇可供文艺批评者参考。

翻阅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文人与近代文人和他们同时代的文人之间的争吵，对我们来说，往往是不可理解的，是多此一举的，但这种争吵，对当时的文人来说，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对一位文学批评家来说，他应具备的，就是后代文人对前代文人之间的纷争所持的那种超然态度。

要具备这种超然态度，文艺批评家就要有就事论事的风度。他走进文艺的花园，若发现一种花虽红艳，但却含有毒素，就明确指出，而不用涉及各个园丁之间的恩恩怨怨，或支持这个园丁，或打击那个园丁，除非他们当中有一个园丁是别有居心者，那又另当别论。

园丁种出来的花树，开出来的花是美是丑，是香是臭，是婀娜多姿还是乏味单调，这是文艺批评家应该提出的。文艺批评家可以提供意见，说这朵花不够鲜艳，那是由于肥料不够，他也可以说，那朵花色彩较淡，那是由于阳光不够致然。但他不可把这朵花的种植者与那朵花的种植者相比，并从而抹杀掉那朵花的所有价值。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字朴素的文人，就爱指陈文字清丽者

的不是,说后者的文字宜抒情而不宜说理。文艺批评家却千千万万不可以己之所好,来贬抑己之所恶,他要能容纳异己,要能承认白花也是花,而且花园的美,正因为有白花在衬托着红花。

文人的创作原本于冲动的创作欲,文人对自己的作品也就难免有敝帚自珍的感情,这正如母亲总爱说自己的孩子最聪明最可爱一样。文艺批评家则不妨充当婴孩健康比赛的医生,他要以科学的批判观点,悠然地走在婴孩群中,理智地评判到底哪一个婴孩最健康,他不用细诉母亲申述她比别的母亲多花费了多少精力,才把婴孩生出来,他也不用考虑母亲缕述她花了多少心血才把婴孩养成这个模样,他该做的是判断眼前的婴孩哪一位最健康。

作家若是产妇,批评家就是医生。作家若是花卉种植者,批评家就是园游人,园游人当然有权利品评花草,但他应该体谅到园丁劳作的辛苦,因此说话要亲切。园游人既然是来观光,他就不应该涉入园丁们之间的纷争中去,而要以闲游缓步的态度来赏花。法朗士对文艺批评的见解使人心服的原因在此。

1982. 10. 22

客居他乡作家的悲哀

本年度文化奖得奖者之一的我国著名作家吴宝星，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曾提及他在异乡九年的所见所闻，只能激起他的同情，而无法促使他全面投入生活。因此，他虽然曾经写好一部以英伦为背景的小说，但始终没出版，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作品，不会有真正的价值。他也提及作家不应逃避现实，自我放逐，因为作家是不能脱离现实的，这些都是很独特的见解。

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他有认同感，只有当一个人将他周遭的事物内摄为本身的一部分，并在思想感情上与这些事物挂钩，他才真正算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分子。这种认同的最基本单位往往是家庭，家庭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喜怒哀乐，能感同身受，就因为此成员已把其他成员内摄为自己的一部分致然的。由家庭所取得的认同，加以扩大，即是社会认同，再加以扩大，即是国家认同。社会或国家认同，除了大体相似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而外，还往往有相似的价值观作其基础。

人的思乡，人的对家乡景物特别怀念，人的对家乡的民众命运的关怀，都是根源于认同感的。但对国家的认同，却非短期内能树立的。因此一个已拥有原国籍的人，他到了他国，即使在法律上已脱离原国籍而进入新国籍，由于他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文化

背景的差异,在感情上他也无法在他国立即取得认同感。这种感情疏离感,正是文学作品最大的致命伤,即使像聂华苓、李黎,或於梨华这么著名的留美华裔作家,她们的作品也只能引起流落美国的华侨的共鸣,而未能在其本国或本土拥有众多的读者群。

作家的生命根源,是深深地根植于家乡的土壤中的,正如社会学家要对他当地的社会病态进行研究,才能提出解决该地的社会病态方案一样,作家一定得深刻了解他的乡土,才有能力反映当地的生活风貌,民众的心声。而且,文学作品比社会调查更复杂的是,作家必须本着爱护他所描绘的对象的用意,才能写出感人的作品来。在这点上,流落他乡的作家,即使在理智上有与他乡民众认同的要求,但在事实上却遭受别人排挤,这就使作家在情感上未能摆脱落寞阴影的笼罩,表现在文学上,也往往是自怨自艾的成分,多过爱护别人的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说,自我流放的作家,纵使有丰富的文学才华,他所写出来的作品,却只能引起与他一样有落寞感的国际游民的共鸣,这种局限性,正是客居异乡作家的悲哀。

1982. 11. 11

构思奇特的“不夜天”

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旅游业时，只想通过乱草、三轮车、肮脏街道、贫困的景象、富封建色彩的风俗等等落后事物来吸引旅客，这个国家就不只会失去国家的自尊，更严重地说，它还会间接地延缓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

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旅游业时，只顾兴建大批现代化的旅馆、餐馆，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来吸引旅客，这个国家的旅游业必然会陷入困境中去。理由是，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建筑物与交通系统，都是千篇一律的，旅客花钱到外国来，看到的景物，若与故乡的大同小异，那又何必舍近就远到一个对他来说历史是生疏的，而景物却一样的国家游玩呢？

所谓历史情调与地方色彩，到底都是抽象的概念，能使这些抽象概念具体化的，是民间手工艺品，是民间艺术，是独具风格的建筑物，是民间音乐，是活生生的人与他们的服装和举止。

把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形象化的建筑物勾勒出来，并在那儿展示民间艺术与手工艺品，又在那儿售卖独具风味的饮食，使旅客一到这样的场所，便能约略窥见这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脉络，这就是成功与突出的旅游胜地的构思。不夜天企业所设计出来的，有关发展新加坡河畔为旅游胜地的计划，便是属于这样的巧思。

不夜天计划的独特,在于它能把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安置在深富历史意义的河畔,从而既表现出该民族文化的内涵,又赋该文化于丰富的地方色彩。不夜天的民间艺术,楼台花园,食亭画舫,可以是华族式的,但新加坡河散发的气息却是本地的,而非外来的。

不夜天计划把看似平凡的一条河,与看似毫无存在价值的民间艺术与行业,巧妙地配合起来,既为这外表平凡的河制造出不平凡的景象,又为民间艺术与行业提供自我更新的生存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不夜天所呈现的景物,将是民众精神力量的来源,也是国家意识酝酿成熟的场所。

不夜天计划,是摆脱了以低级趣味、落后、贫困与肮脏来吸引旅客的框框旅游发展计划的圈圈的例子。它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加以提高并使其产生现代感的奇思宏图。更可贵的是,它不是宋城的复古,也不是古宫的怀旧,而是古为今用的巧妙安排,它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它坐落在铜臭味很浓的商业中心,却放着优雅的芳香。它是现代化城市中的一个文化城,是国家意识形成的酝酿所,也是国际旅客必到的观光地。

1983. 5. 10

美术能丰富人生

随着特选音乐学校计划的推行后，教育部又将于明年开始推行特选美术学校计划。这两大措施，如果再加上廖国斌先生建议的，在学校强制教导建国史计划的落实，那我们可以说，我国的教育内容是越来越全面与充实了。

历史悠久或发展中的国家的普遍教育现象是，课程偏重文科。这现象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更是普遍。过分偏重文科所带来的好处不少，但坏处更多。最明显的一点是，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准低，然而，吟风弄月之辈不少，舞文弄墨的人更多，其结果是民众愚昧，而所谓的“读书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全体国民生活在科技落后、工业落后而思想麻痹的状态中。

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我国者，在建国过程中，强调科技教育，是正确的。这样做，不只会加速我们的工业化速度，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且由于科学知识的引进，民众的迷信观念也会日渐消失。久而久之，国民的物质生活不仅能有所改善，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

然而，人类到底是高等动物。除了饮食男女和领袖欲外，他们还要创造精神文明。因此，过分强调科技教育，又会引来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方式。我国目前的部分民众沉迷于滥赌与糜

烂的物质生活中，部分原因在此。挽救之道，只有从根本上去提高民众的精神生活。音乐与美术的列入学校课程，并受到应有的重视，是很明智的措施。

人类是不能脱离大自然而生存的，但大自然的美丽，却需要艺术的渲染才会显现。艺术不只是大自然的反映，它是大自然之美的提升。艺术的对大自然之美的歌颂与渲染，是激起人们更热爱大自然的要素。

不过，人类虽然生来就具有鉴赏大自然之美的能力，但有系统的训练却能提高人类的鉴赏与表达美的能力。这便是为什么越先进与越有文化的国家，它的艺术大学也越普及的原因。而且，无论美术、音乐或文学，它们都能攫住大自然刹那间的美，而把这美集中地、永久地表现出来，从而提供人们丰富的精神生活享受。

一个能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生存下来的国家，其国民必是兼具科学知识 with 艺术知识的一群。单单有科技知识而缺乏艺术知识的民众，会使其国家流于庸俗与浅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就犯上这弊病。民众既有先进科学知识，又有深厚文化根基，则其国家必是根基深厚潜能无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有这优点。因此，教育部决定推行特选美术学校计划，可说是朝向稳健建国道路迈进的一大措施。

1983. 7. 30

宗乡会馆的新时代使命

宗乡会馆在殖民地时代与建国初期对我国的经政的贡献,并不能保证它们今后就能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此中原因有二。其一是,宗乡会馆一向来的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符合这时代的要求。其二是,宗乡会馆以地缘与血缘为号召力的作法,已敌不过以业缘,娱乐,宗教为号召力的其他社团。

摆在宗乡会馆面前的困难既然这么大,它们如果要求取生存,就非得自我更新时代使命并扩大活动范围不可,这样才能吸引年轻有为者加入活动。

宗乡会馆以地缘与血缘为接纳会员的特色倘若不能全然丧失,为了加强生存能力,它们却须改变其狭隘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组织特点。开放会员籍给其他种族,可能是过高的要求,但招收不同血缘与地缘的人士为准会员,却是应该容易且必须做到的。

放宽招收会员的条件只是宗乡会馆继续求存的最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会馆还须多主办文化活动,多开设教育课程并出版文艺刊物。只有在文娱与教育方面加强活动,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团体。会馆才可能与其他的非以地缘与血缘为根基的社团争一日之长短。

要展开多元化活动,从资金上来说,应没问题,问题在于人力

与人才的不足。因此,较小的宗乡会馆不妨考虑在维持本组织的特色的同时,也与其他会馆相互合作,同搞健康的文娱与教育活动。

宗乡会馆的团结基础基本上是植根于封建色彩,母语教育的式微已逐渐削弱这团结基础。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社团组织,就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它们的活动内容比会馆的多彩多姿,也更具吸引力,这就更削弱了会馆的竞争能力。因此,会馆不只须及时检讨本身的组织宗旨,且须扩大本身的活动范围,这样才可突破困难,继续求存。

在当今的会馆中,晋江会馆所走的先进路向,不失为其他会馆的仿效对象,尤其是那些资金丰富,会员众多的会馆,更应在晋江的成功基础上吸取经验,把会馆搞得更有声有色,为其他规模较小的会馆指出一条新生之路来。

会馆负责人应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看到本身所遭受到的时代挑战,他们更应深谋远虑,拟定长远的发展计划。只有这样做,宗乡会馆才能突破客观现实存在着的重重困难,而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来。

1984. 11. 26

是宗乡会馆行动的时候了

引人注目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终于完满地结束了。今后该重视的是，拟定具体的全盘发展计划，以供全国大大小小会馆作为行动的指南。

由分组研讨会所得出的结论是，宗乡会馆一向所保持的地缘血缘特征应保留下来，以作为维系关系的枢纽。与会代表都表示，活动应可开放给非地缘血缘人士，藉此招收一些准会员，以加强宗乡会馆所扮演的时代角色。

从研讨会所提出的这两大课题，可看出宗乡会馆负责人，其实早就在寻求新生之道。会馆应扩大活动范围以加强生存能力，这原则若肯定下来，则各宗乡团体要开展活动，搞文娱演出，就非得一个联络中心来协调与协商不可了。

宗乡会馆今后可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是整理先贤的史料，把他们的丰功伟绩有系统记录下来。此外，会馆也应搜集其各先贤的文物史料，创立史料室或文物室以供后人瞻仰。一是配合国家社会需求，积极展开各项文艺活动，藉此提高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促进新加坡文化的发展。王鼎昌部长建议会馆考虑配合华族传统节日，联合策划并举办大规模的文艺活动和文娱演出，就是个非常具体且可行的方案。

但宗乡会馆除了搞这种常年演出与活动外,也应策划长期性的文化活动,例如开设儿童绘画班,学华文班,舞蹈班,华乐班等等,这些都是可考虑的课程。开办这些班级是为了扩大会馆的活动范围而其效果则是,年轻人被吸引过来了,从而也就加强了会馆的生存能力。

宗乡会馆一向来所搞的春秋祭,颁发奖、助、贷学金以及互助会等等活动,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时代的变迁,已要求会馆扮演更重大的角色。会馆若在主观上也认识到本身须负起更大重任的重要性,那在联络中心的协调与协助下,许多新颖且富有社会意义的活动即能展开了。

概括地说,宗乡会馆使其活动多元化,不只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作法,也是自我更生的途径。由出席研讨会而又即席发言的代表的谈话看来,会馆本身其实已在不同程度上寻求突破与求生之道,此次研讨会既提供各宗乡会馆一个互相协商与探讨问题的机会,那么今后只要大家坦诚相待,共谋对策,相信必能寻找出一条新生大道的,研讨会的结束,应是行动开始的时刻了。

1984.12.4

杂志副刊相辅相成

台湾诗人痖弦说报章副刊所能发展的是轻文学，因此须靠文学刊物来带动纯文学的发展，这可说是一针见血，独具卓见的论据。由于本地华文文学一发轫，即与报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关连，因此一般人的看法是，报章副刊是带动本地华文文艺的火车头。这不能说是错误的见解，但却难免有失诸片面之嫌。

副刊一向来是发表华文作品的最主要园地，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副刊带动了华文文学的进展，这也是史实。但报章与生俱来的随读随丢的特点及副刊受到非常有限版位的局限，却是它不能容纳篇幅较长，或者学术味较重的文章的原因，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限制文学的全面发展。从这观点来看，或许我们真的必须考虑创办一份较有分量的纯文学刊物，来弥补报章副刊的不足。

王鼎昌副总理最近曾倡议设立文艺基金，若此建议得以实现，我们首先该考虑的应是动用此基金的一小部分来办文学刊物。此文学杂志可由报馆主编，也可由文艺界知名人士主编，但宗旨要以发扬纯文学为主，编辑人员应是受薪的专业者，撰稿人的稿费也应优厚。编辑人员的心胸应宽阔，不分派系地采纳各家各派的力作，使此份刊物成为本地华文文学的权威杂志。

文学杂志应可与报章文艺副刊相辅相成，副刊可刊载短小精

悍的杂文,也可刊登抒发性灵的小品文,或短小诗歌,杂志则可收集戏剧创作,长、中、短篇小说,或报告文学等等。只有这么做,文学才能得到全面的健康发展。

文学杂志是长期培植文艺树林的园地,副刊则是栽种文艺花朵的土地,我们既要能天天见到鲜花怒放的盛景,更想看绿树成荫的远景。如果此二景俱备,那文艺就会大放异彩。

我国今后十多年的发展重点即在塑造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文艺会受到当局的重视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抛弃一切可能的成见与歧见,团结起来为文艺的发展寻找新途径。创办文学杂志,以弥补报章副刊的不足,只是其中的一个途径而已。我们或许也可考虑成立全国写作人协会之类的组织,藉此共商推广文艺的策略。

由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所带来的激励,应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不只是春风吻脸式的稍纵即逝的记忆。

1985. 1. 14

兴建有文化气息的商店街

旅游促进局与牛车水区基层组织计划创办的农历新年年货市场,及其一系列的节目,可以预料必会吸引不少外国游人与本地民众前往观赏。在过年过节,以这类性质的活动以吸引顾客,实不失为促进旅游业的良策之一。但如果能从长计议,建设一两条如东京的浅草,或大阪那样深富文化气息的商店街,就更能塑造文化吸引旅客。

日本的商店街,无论大小,都深富情趣,比较起来,我们是很缺乏这样的购物场所的。当局应可考虑物色一理想场所,兴建一条长长的、挂满灯笼与塑胶花等装饰物的商店街,并在那儿常年展卖传统民间工艺品,倘若节日到来了,则不妨增设加浓气息的活动,使整条街更富有文化气息。

在这条长街上,除了贩卖各种美食外,也可让民间书法家与画家在那儿展卖他们的艺术品。整条长街应播送传统的,但曲调轻柔的华乐,以加强文化气氛。

这富于华族文化色彩的长街,若与马来村及小印度相配合,就能给旅客予我国多元文化的强烈印象。我国快速发展的结果是,街道整洁,建筑物崭新,但与此同时,原有古老建筑物的独特风格却荡然无存了。蕉风椰雨的情调与东方文化的色彩,若随着古老建筑

物的消失而消散,那我国对外来旅客的魅力就会大减。

日本处处充满文化气息的特点是,它把古老的、传统的艺术融入现代化建筑物中去。因此,在日本,在繁华的街道旁的摩登建筑物群中,往往可看到古色古香的庙宇与之相映成趣;在现代化的小餐馆内可看到小巧玲珑的假山假石与流水,一幅浓缩的天然景物的情趣流泛其中,在百货公司里则经常可看到世界名画展或陶器展。

把文化艺术带入日常生活中去,是日本特别吸引外国游客的原因,这样的境界,我们或许尚须好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但先计划兴建富文化气息的商店街,却是确实可尝试的构想。

先把文化艺术气氛凝集在商店街里,不只是吸引旅客的好办法,也是培养民众喜爱文化艺术的良策。从长远来看,对我们所刻意要塑造的有教养的社会,也大有裨益。

1985.1.15

增添传统节日的热闹气氛

近几年来,在新春佳节的舞狮舞龙活动似乎更为活跃,也更为普及。舞狮舞龙的锣鼓声响,很能弥补禁止燃放爆竹的寂寞,也为节日带来热闹的气氛。可以说,倘若缺乏了舞狮舞龙活动,华人过年的气氛就要大减的。华人新年若沦为只向长辈或亲朋戚友拜年,那这节日就会慢慢失去意义的。

但幸而有识之士似乎早已觉察到这点,旅游促进局、本报与裕廊环境工程私人有限公司所主办的一些活动,就为这节日增添不少热闹气氛。

旅游促进局在牛车水那几条古老的街道张灯挂彩,吸引了很多外国旅客与我国民众前往溜达与购物,为节日带来更多喜气洋洋的气氛。这的确是很有意义与颇具远见的措施。

在裕华园举行的园游会,既为民众多提供了一个假期消闲的好去处,也使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能更普及民间。

在幅员狭小的我国,既缺乏名山胜水可供民众消闲,开拓生活深度就是丰富精神生活的唯一途径了。如果培养民众喜爱艺术是一项长远的工作,那加深民众对节日意义的认识,却是能较轻易、且能及时收到成效的工作。

新年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欢庆节日,都蕴藏着感人肺

腑的故事或传说,把这些故事加以形象化,使它们在节日里重现光彩,不只能使民众增添生活情趣,也能令民众在无形中培养起坚强的国家意识。

在新春前牛车水演出的地方戏剧之受到人们的喜爱,这说明古老的艺术形式还依然有生命力。假使我们能去芜存精地保留各种古老艺术形式,使它们为现代社会的民众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精神生活,那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文化的创造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需要一段很长时期的累积,尤其是文学艺术更是如此。但作为较具普遍性与传说色彩的节日,却也应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发扬光大节日的积极意义,虽并不等于创造文化,但却是提供了文化种子萌芽的肥沃土壤。

从经济观点来看,发扬各传统节日的积极意义,使节日更充满热闹气氛,其实也是吸引旅客前来观光的好办法。日本北海道每年冬季举行的雪节,吸引了成千上万旅客前往观赏,那是个明证。因此,官方机构,私人机构,宗乡会馆,应可各尽其力,各出其招,把庆祝各种传统节日的活动办得更热闹与生动些。

1985. 2. 25

出版社区图册意义重大

《甘榜格南——一个社区的精神面貌》图册的出版,其意义是很重大的,值得其他社区仿效。

我国历史浅短,市容变化又很大,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时间内,某一地区的风貌就会彻底改变,再也无法教人辨认出它当初的蛛丝马迹来。由于有此二特点,后来者就无法从新市容中辨识该地区的沧桑史,而所谓发思古之幽情的历史感也无所依附。

出版社区图册的第一层意义是,它至少能让该区市民从中窥见以往的市容,使他们知道该区曾经哪些沧桑,而这有两个好处。其一是,市民会对该区的发展史有个粗浅认识,从而会更珍惜现有的成就。其二是,由于对该区历史的认识,一种热爱乡土之情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而这对国家意识的巩固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出版社区图册的第二层意义是,它能较完整地保存该区的历史点滴,而这是意义重大的。理由是,倘若每一社区都仿效甘榜格南而出版其社区图册,那这些图册对今后的历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时,会有很巨大的辅助。历史学家至少可以不用再花费同样的精力,去收集各社区的图片与史实。

出版社区图册在我国算是创举,在外国则属平常的事,它其实是与地方志很相似的小型地方性历史书。日本东京计有廿三区,每

一区都出版其历史书,图文并茂,而市民也把其社区拥有的历史古迹引以为荣。

除了其他社区应可效法甘榜格南出版其社区图册外,有关当局应考虑在全国各处较有历史价值的地点,竖立说明板以阐述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或该地点史实的来龙去脉。由于是地方性的人物与史实,我们的选择标准不用定得那么高,只要是对该社区有贡献或有意义的人或事,都可立板介绍。

我们一直在强调培养国家意识的重要性,我们也一直在担心年轻一代不会真诚地喜爱这个国家,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只要他对自己的居所拥有历史感,他就会很自然地爱上它。把民众居住地的历史告诉他们,就是很能培养国家意识的有效途径。甘榜格南公民咨询委员会已在这方面作了一项很有意义的领先工作,其他社区领袖宜不落人后,也搞一搞社区图册的出版,这到底是一项与建国大业有关的工作。

1985.3.19

报章评论的社会贡献

报章的功能至少有两个，一是为民众提供及时的讯息，使民众能拥有丰富的各方面的知识，并知道自己处身何处，二是反映民意，使为政者知悉民众对所有政策的感受，并由此纠正某些政策的偏差。及时传达讯息与及时反映民意，是民主社会中报章所扮演的最重大角色。

然而，报章所评论的都是此时此地的事件，这就难免要触及当局的逆鳞。唯其如此，报章评论在民主社会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评论员的胆识、见识以及当局的气量问题，这两者缺一都不行。

有深度的评论员除具备各方面的广博知识与过人的胆识外，还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者，他既不用过分担忧自己的言论会触怒当局，也不应迁就一般民众的粗浅看法，而作出讨好民众的姿态来。拥有这些条件的评论员，他所撰写的发自内心的评论，是否能对国家有所裨益，就得看他的眼光是否独到而定了。

有气量的当政者应当接受有责任感的评论员的建议性意见，它应当明白控制报章言论无疑是杜绝反映民意之路的道理，同时也会因此失去民众对报章言论的信任程度。

对评论员有过分的期望是不实际的，世界之大，学问之多，专

家学者之众,使得评论员只能对自己熟悉的事物,相对说来能有较突出的见解,而对其他本行以外的事物,就只能作一管之见的议论了。

但不是因此就说评论员的一般性评论,就全然没供当局参考的价值了。恰恰相反,由于评论员与其他民众一样,都是一般政策的承受者而非制定者,他的较一般民众有系统的感受,正是民意的集中反映。即使评议员的评论平平无奇,单单他那点承受政策的感受,就可供当局参考了。

在地理位置微妙,历史因素复杂,而社会结构繁复的发展中国家中,评论员更应对自己的言论谨慎并负责。在民众认识有待提高的社会里,任何危言耸听或哗众取宠的言论,长期来说,都会危害到国家的利益。但当局对偶尔犯上片面错误的评论员,却也只须晓以大义就行。唯有这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作风才能兴起。

如果报章的报道是在累积现代史资料,那评论员的评论便是评价现代史的史论了。与其在数十年或数百年后,才从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去吸取教训,不如及时从能反映民意的报章评论文字中去纠正政策偏差,这应该是评论文字对社会国家的最大贡献。

1985.4.1

艺术节获得热烈反应

艺术节秘书处四天来所收到的订票表格已达一千八百份，看来民众对艺术节的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艺术节自然不是推广艺术的日常活动，但却是提高艺术创作与鉴赏水平的季节性演出。自然，比较起来，我们更应当注重日常的推广艺术活动，但艺术节的演出受到民众欢迎，也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最妨碍我们展开艺术活动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太过注重功利。急功近利也使我们的社会缺乏研究风气，在学术界如此，在艺术界也不例外。这不是学术人员或艺术家的过错，而是社会的过错。社会不注重研究，从事研究的人不只会备受冷落，连生活都会成问题。

任何先进的国家都不会单单以可见的物质成就为满足，它还会注重精神方面的建设。我国拟设立美术馆与文化宫，可说是没忽略艺术的重要性。但只靠国家来推动艺术，是很不够的，民间团体也应鼎力相助。文化机构得注意营业情况，原则上并没错，但文化机构若也像其他机构那样一味追求利润，就不是太健康的现象了。最近有一家公司愿意把其大厦内的剧院，提供给年轻画家展示美术作品，便是大力促进艺术活动的作法，值得其他大机构，尤其是文化机构仿效。

会馆的当前要务

尽速培训文娱人才

会馆联委会成立了，它应是所有会馆活动的咨询与策划中心。它的成立，既使得以往会馆与会馆之间少通信息的局面结束了。同时也打开会馆与会馆之间今后通力协作的途径。规模较小的会馆，在过去若遇到什么工作上的困难，往往只好孤军应战，有了联委会，就有了给予支援的对象了。

但联委会到底是不是咨询与策划中心，它并不能越俎代庖为会馆搞活动，它所能给予会馆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也只是暂时性的。在自我更新使命或任务的过程中，会馆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娱人才的短缺问题。因此，当前所有宗乡会馆的急务应当是，赶紧培训自己的文娱人才。

会馆的传统性活动，诸如春秋祭，新春团拜，颁发助奖学金等等，都应可继续下去。但正如联委会的活动宗旨所指出的，加强新加坡人民对华族文化与传统的认识，是会馆今后的最重大任务所在。要完成此巨大任务，各会馆都必须有本身的文娱人才、文化活动，才有办法展开。晋江会馆已开办的彩墨画班与文学写作讲习班，实在是培训文娱人才的有效作法，其他会馆应可效法之。

另一方面，有些现有的文娱团体，由于场所或基金问题无法解决，而陷入难以展开活动的困境中；有充裕活动场所的会馆不妨与

它们取得联系,把会所借给它们活动,同时要求该团体团员为会馆训练一批文娱骨干分子。有了骨干分子,就不愁培训不出文娱人才来。

认识到会馆必须自我更新时代任务,是会馆能否维持下去的最基本因素,但单单在理论上有此认识,而没有实际上采取相适应的措施,却也是挽回不了会馆走向穷途末路的命运的。联委会所指示的宗旨是很崇高的,但实现此目标所会遇到的困难一定很不少。只有所有会馆从今天起立即着手培训文娱人才,联委会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会馆必须主动地,积极地采取具体步骤,来肩负起推动文化活动的重任,而不能一味寄望于联委会。联委会所能提供给会馆的支持,应只是原则性的指导,技术性的协助,一切具体的文化活动,例如编纂先贤事迹工作,展开戏剧、华乐或文艺活动等等,都须各个会馆全面地去进行筹备。只有当每个会馆都拥有其基本文娱人才,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文化活动才有办法展开。因此,尽速培训文娱人才,可说是会馆的当前急务。

1985. 4. 17

新加坡河发展计划的意义

新加坡河畔发展计划看来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此计划一落实后，不只会吸引大批外国旅客前往观光，即使本地民众也会多了一个美好的假日去处。集旅游商业活动住宅与行政于一区，是此计划的基本特点。新旧建筑物的和谐并立，是此区的将来特色。后一点自然并不是我们的创举，但我们的热带风光却不是其他先进国旅游区所能拥有的，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发展此旅游区。

由此计划及最近旅游促进局陆续公布的一系列计划看来，我们或许可以说，当局的发展旅游业重点，似乎已放在强调本地文化色彩这方面来了。这样做有两层好处，其一是，地方色彩原本就是吸引旅客的最有力因素，其二是，本地民众也能由集中且有形的文化表演中，感染到文化气息。

发展旅游业，不外乎声色犬马与文化特色两条途径。澳门与拉斯维加斯是前者，日本或中国则属后者。发展声色犬马的消闲活动，难免对本地民众有不良的影响。长远来说，对国家必有不好的后果。发展文化特色，要立竿见影地吸引旅客，并非易事，但对我们这个历史尚短，文化建设尚待努力发展的国家是会有良好的影响的。

此计划并没与我们的都市发展计划相抵触,保存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也是世界各国的一致作法。在河畔设渡口,供游人乘船遨游,或设音乐厅,舞台,民艺品中心,都是创造特殊气氛与地方色彩的措施。尤其是夜晚灯光灿烂,游人在这具有历史情调区漫步,更是一种精神享受。

我们过去所着重强调的,似乎是购物天堂的美好形象。近年来这形象已逐渐丧失,这未尝不是个教人惋惜的现象。在强调地方色彩的同时,我们也应尽力挽回购物天堂的美誉,旅客到底是有各种各样嗜好的,有些人并不喜爱文化,而热衷于购物或品尝美食。因此,继续创造购物天堂的形象与发展美食中心,也是不容忽视的途径。

由旅游局当年以落后事物吸引旅客,到目前的有计划发展地方色彩的措施看来,我们不仅看出旅游业今后仍然是我们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也可看出我们在这行业上的成熟表现。我们不是为讨好旅客而毫无原则保存落后事物,而是藉发展特点来吸引旅客。因此,新加坡河发展计划,就不只能吸引旅客,也是丰富本地民众生活情趣的措施,长远来说,它对工化建设也有一定贡献。

1985. 9. 10

设法使旅客多逗留几天

澳洲矿业及冶金学会大会会长佛特斯说,新加坡地点优越,又拥有先进的会议设备,且是双语社会,因此是举行国际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话一点也没夸张或溢美,争取成为本区域的国际会议中心,早已是当局全力以赴的目标。新加坡每年能吸引超过三百万名旅客到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绩。

最近翻阅一些资料,知道1978年日本才取得一百万名旅客的目标,1984年到日本的外国旅客也只有二百一十多万名,与日本比较,我们能吸引三百万名旅客到来,不能不说是奇迹。然而资料也显示,一般旅客在日本的平均逗留期为11天,在新加坡的旅客则平均只呆了三点九天。也因此,新、日旅客每天的平均花费虽然相差不大,日本每年由旅客身上赚取了约六十六亿新元,而我国却只能取得三十六亿新元外汇。可见继续争取更多旅客前来新加坡,固然是我们的要务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使旅客多在我国逗留几天。

日本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史迹,名山胜水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吸引旅客的有利条件。不过,日本保存史迹与名胜,最大目的并不在于吸引旅客,而在于保存文化财产,为国民制造多一些消闲场所。名胜史迹吸引来大批旅客,多少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后

果。我们在发展旅游业方面，一向循着健康的道路进展，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似乎也犯上一味迎合外国旅客口味的错误，以致在兜了好多圈子后，才又发现最吸引旅客的，原来是深具东方色彩的虎豹别墅与牛车水。

日本的外国旅客不比我们多的原因，很明显是它的生活费很高。但到日本去观光的旅客居留期约为到我国来的旅客的三倍，却又说明日本有许多吸引旅客的名胜，日本近年来的旅游业发展趋势是这样的：不只大都市如东京、大阪、京都能吸引旅客，一些小城镇的旅客也与年俱增。这说明发展本身独特的文化色彩，才是吸引旅客的有效途径。

我们很难说我们再也没有其他潜在魅力可吸引旅客多逗留一些日子，发展虎豹别墅只是其中一例而已，设立马来文化甘榜，保有小印度，重建牛车水，都是可吸引旅客多逗留的办法。每年旅客多达三百万名，已是我们不易达到的一个目标，既然我们已经达到此目标，今后的重点应是挽留旅客多呆三两天，理由是由此而赚取的外汇将是异常惊人的。

如果情况允许，我们也不妨与马印发展合作关系，来我国观光的旅客若想续往马、印遨游而能在新加坡多逗留一两天，那我们的旅游收入也必会因此而大增。

1986.5.14

外人评语 良药苦口

日本第一精工公司的高级职员三品这么批评我国工友：新加坡的年轻人很真诚与坦率，但过于自信与天真，他们在求职面试时，都说能做这做那，尽在宣扬己长。他们以为什么都懂，只因他们阅读过一些书。但一旦受聘用，却又未能实现己诺。而且，他们把在工厂的一切差错，统统归咎于机械有毛病，而不自认己过，他们善于找藉口。不过，三品也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加坡人，很是能干，女职员与男职员一样能干与机警。

像三品这样具体而详尽地指出我国工友优缺点的外国公司职员，要不是绝后，也是空前的。他人的评语，尤其是外国人的评语，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面镜子。既照出我们的美，也反映出我们的丑来。从这角度来看，对三品批评，我们应当感到高兴。不过，三品批评，却也说明，日本文化背景与我国基本上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形成国民性格的不同，表现在行为上，很自然地就有差别。

三品说我国工友过于自信，这是相当正确的评语。我们的年轻一代，大多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一群。西方思想的特点之一是进取心强，表现在应征工作面试上，就是样样都说会做的特点，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三品说我国工友在工厂出差错时，总归咎于机械，

总为自己找藉口，这就不是好的作风，而是东方思想中不承认错误的死爱面子观念在作祟。

三品也说我国工友不够谦虚。不谦虚与爱面子可说是一对难兄难弟，由于不谦虚，自以为比别人聪明，自己不懂的事物，就不请教别人，但又由于死爱面子，不懂的也强说懂。这两种缺点相互影响的结果，就会出现只会夸夸其谈，而不求踏实的作风，这其实是阿Q精神的表现。

这么看来，我们似乎可以说，我们的年轻一代，在这十七年来经济高度成长的佳境下，信心十足得有点趾高气扬，加上传统观念中残余下来的一些糟粕，就形成一些年轻人具有浮夸的作风。

儒家思想讲求谦虚有礼，讲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美德，都可供年轻一代参考。因此，在推行儒家思想教育后，随着社会风气的日渐转移，年轻一代的不谦虚与死爱面子等恶劣作风，就有可能渐渐消失。

日本是一个在吸取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哲学后，而还能保留东方美德的国家，生活在这种人人既谦恭有礼，又有真才实学的三品先生，对我国年轻人所作的批评，应该是服苦口良药，足供我们深思与反省。

1982. 9. 20

应该为朋友的成就欢呼

一名在籍学生投函到《海峡时报》，说明提高生产力的要素是合作精神与集体协作。但很不幸的，这两大因素没法在学院里找到，理由是一些学生的自私心理和自我中心观念太强，经济较好的学生，不参与集体讨论，怕的是给别的同学占了便宜。有些自私的同学，则有时偷窃同学的笔记，有时又从图书馆偷来的书中撕掉一些篇章，目的都在使别的同学受难。

这名学生的投函，的确是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的关键。自私与自我中心，确是生产力的大敌。但更可怕的是，由自私引发出来的妒嫉心理，其破坏生产力的威力就更大。妒嫉最大的危害是，拥有这种心理的人，往往是不但只看到个人的利益，而且看不到团体的利益，他常常还会破坏别人的所作所为。

由于妒嫉心理的作祟，这种人既不会承认别人的成绩，又会一味在别人的工作里找瑕疵。这类人中的较善良者，经常站在一旁说闲话，通过闲言闲语发泄他的妒嫉心理。德行更恶劣者，不只讥笑别人的所作所为，还会暗中诅咒对方，待到对方不慎摔了一跤，他就在私底下庆祝。

妒嫉、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确实是提高生产力的大敌。该名生因此建议政府展开一项反自私运动，以配合目前正在展开的

生产力月运动。这建议深具意义，但到底只是治标的办法。一个人要做到一点私心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要做到事事物物都以集体为主，个人利益为次，却是应该可以办到的。只是这种美德，要从小就培养才行，到了学院学生这阶段，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大体上已定型，要改造已不很容易了。

比较起来，从正面向人们灌输集体合作的重要性，是会比消极地提倡反自私来得有效果。我国幅员小，人口也不多，如果再分为好几个集团，集团里又再分为小集团，小集团又划分为小组织，那我们就只能是没有凝聚力的散沙。如果大多数人都明白了团结的重要道理，接着我们要知道的是，人活在这世上，无论他做什么有益于人类的事，他的真正敌人是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而不是与他一样有双手双脚和一对眼睛的人类，除非那个人是个大坏蛋，那又当别论。

这不是在唱高调，事实是，许多人活得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他太自私，太以自我为中心，也在于他的妒嫉心太重。要活得快乐，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作的一切有利于人类的工作，既在解决个人的生活所需，也在为将来的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人类的一切活动，确实是在创造更理想的生活环境，事实既是如此，我们就没理由妒嫉别人的成就，因为别人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机构，或组织，或社会，甚至是国家做贡献，你能不为他的成就而欢呼吗？

明白别人的成就，是提供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你还要妒嫉他吗？明白了这道理，你就没理由妒嫉别的同学学业成绩比你，因为他将来的成就必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国家的进步与繁荣你也分享得到的。这么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集体协作提高生产力，也是促进国家繁荣的途径，因此我们也就应该积极支持集体协作。

1982. 11. 15

大学毕业生与职业

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了，大学生在寻求职业方面不再是天之骄子，那是顺理成章的。我国的大专教育，还远远说不上已普及，但事实上却也已在逐步推广中，而今又碰上世界经济不景，今年的大专毕业生就没能像往年那样在寻求工作方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接受高等教育，对一个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那是一种权利，一项提高精神生活的工作，而不是寻求高待遇工作的资格。我们一向以为大学毕业生一定要找到工作舒适而待遇又高的职业，那只是发展中国家实施有计划的精英教育的结果。这现象或许是发展中国家在前进途中所无法避免的，但却肯定不是永久的现象，否则一个国家就永远无法进入先进阶段。

无论科技多么先进的国家，它也无例外地有好些较不高尚的工作等待人们去做，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先进国，受过大学教育而从事在传统观念上并不高尚的行业者是比比皆是的。这种在发展中国家不能为民众接受的事实，可说是先进国大专教育极端普及后的必然结果。这结果不只使先进国的国民素质大大提高，也使各行业的生产力或服务水平逐步提升。

我国的大专教育并不像先进国那么普及，但在逐渐推广过程

中却碰巧遇上世界经济不景,致使大学毕业生在职业上再也不能过于挑剔了。这现象的提早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专教育此后不须再继续推广,而只是提早让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尝到大专教育并非为高尚职业而设的滋味。因此,我们不应放缓推广大专教育的速度,但与此同时,却不妨让学生更深入了解受教育并非单单只为觅职的道理。

林文兴议员预测,由于不甘起薪低,部分大学生将成为我国第三代企业家,这无疑也是今后的大学生的另一出路。不过由于学生的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的限制,此路肯定并不易走。对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应尽早认识到受高深教育并非为觅高尚职业的道理,而是为促进国家更快地发展起来。

受过高深教育者来担任并不那么高尚的工作,是国家进步的一种现象。这不仅能提高各行业的水平,也会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否尽快发展,也与此息息相关。以我国当前的大专教育推广程度来说,我们的大学生实不应有难找工作之叹,但世界经济不景却提早促使此现象出现了,这对大学生来说,自然是一大打击,不过我们的推广大专教育政策却应继续下去。

1985. 10. 22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必须踏实

最近几天来有关学生功课压力问题,又再度被提出来讨论。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快捷课程学生所面对的功课压力,比普通课程学生来得大。他们须面对过重的功课,同学之间的竞争与家长的监督和关心的三大压力。一些部长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并不全然否定家长监督子女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学院调查研究学生所面对的压力问题,也并不否定家长监督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该调查还认为应该让社会人士知道学生面对哪一些压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以免出现弊病。我们没有一点天然资源,充分发展人才就是我们的求存之道。

注重子女的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不是个新课题。不过,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家长并不知道子女接受完整教育的重要性,或者虽然明白那道理,却不晓得怎样去协助子女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在低收入的家庭里,由于父母所受的教育大多不太高,居住环境又不尽理想,孩子们也就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这类家长中有些会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因此也就极其严厉督促子女学习,以致忽略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龙成凤的道理。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万一不能如父母所愿达到目标,往往就会被指责为没出息,以致终身抬不起头做人,或甚至成为反社会体制分子。另一

些家长则日夜忙忙碌碌于求取三餐之饱，从而也就没密切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使子女未能充分发展他们的才干，甚至沦为流氓。

希望并督促子女好好学习，使他们充分发挥其所长，为社会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不只是做父母的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之道，也是国家繁荣前进的原动力。可见得重视子女教育，只要不是矫枉过正，不但不是坏事，还是社会繁荣的要素呢。

不过，对子女的期望须踏实才行，过分高的期望，不只会使自己失望，也可能严重伤害到子女的自尊心，使他们终生在郁郁不乐中度过，甚至索性走上歧途去发泄愤懑。越是进步的国家，教育就越普及，民众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也越大，在更激烈的竞争下，有好些在较落后国家中原本可担任较重要职位的人才，在比较进步的国家中只好担任较次要的工作了。日本大学生当司机的满街都是，就最足以说明大专教育普及后，整个国民素质提高了，在职业上的竞争也就更激烈的道理。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在前进，大专教育也在逐渐普及中，望子成龙的家长得认识到上述道理，才不至于在恶梦中感到幻灭。

1985. 11. 26

让学生了解国家利益

由此次的大学先修班研讨会与会学生代表的谈话看来,年轻的学生是颇不乏既能言善道而又会独立思考的。但若再深入剖析一些学生的言论,却又发觉有些学生既犯上夜郎自大的毛病,也有唯西方价值观马首是瞻的偏差。

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说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孰者为优,但在对西方思想一知半解而对东方思想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就一切以西方思想来作为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却是要不得的。

如果说以本身较熟悉的思想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是无可避免的,那以夜郎自大态度,把一切问题孤立起来看待,并过分自信地坚持己见,就是非常幼稚与可悲的行为了。与此比较起来,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孰优孰劣,就是个较次要的问题了。

部分学生对一些敏感问题穷追直问,座谈会主讲人却因种种原因,而有难言之隐,这现象的产生是教人担忧的。年轻学生对周遭环境与区域政治缺乏应有认识,不管其原因是什么,都是不健康的现象。缺乏从全面来看待问题的视野,除了容易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外,也往往会坚持自己的一管之见。

这些偏差的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也应该与我们较偏重科技知识的传授,而没能较全面灌输文史知识有关。对区域地理与

历史缺乏全面的认识,就会把一些枝节问题放在生死存亡问题之上来看待,且会在自己的不全面的意见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演变为意气之争。

研讨会的举行,对年轻学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它所能起的作用,到底是有个限度的。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至少应该是,让绝大部分学生对我国的处境与邻国的关系,有个较清晰的概念。这样一来,他们在分析国内外问题时,就能面面俱到,且能抓住要害来谈问题,而不致本末倒置,但这样的目标,研讨会是肯定达不到的。

年轻学生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他们热忱,有正义感,不计较个人得失,敢说敢做,这些都是铲除黑暗,追求光明的原动力。不过,万一他们所思所想,所言所做,并非协助推动社会前进,而是宾主倒放,误把枝节当生死课题来处理,那由此而产生的副作用就不小了。

年轻人的敢怒敢言性格是无法压抑的,如果他们的所怒所言与国家长远利益有所抵触,解决之道并不是教他们不怒不言,而是给他们以正确的知识,使他们能透彻了解国家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国家的长远利益又是什么,这才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于建国事业的良善作法。

1985. 6. 18

培养人民力争上游的精神

日本的社会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在日本历史上并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日本在文化上曾深受中国的影响,士农工商观念在幕府前的日本社会是盛行的,只是在幕府时代大名地位提高,武士也受到重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教育制度又有了大改革,加上战后高度工业化的结果,才使士农工商秩序有所改变。我们或许可以笼统地说,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教育制度的变更,社会的变迁,是日本民众能摆脱儒家强调的士农工商观念的原因。

与其他先进国一样,日本蓝领阶级的薪金比一般文员的为高,这是打破人们轻视工人的最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有关机构每年颁发的奖状,奖赏人士范围之大可说已到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程度,真正做到奖励各行业的状元。国家把民间的艺匠当成国宝,电视节目有系统地介绍各行业的杰出人才,即使是暂居日本的外国人都会觉得日本人是尊重各领域的人才的,这是日本人都敬业乐业,做好分内工作,并力争上游的社会条件。

我们基本上还是东方社会,人民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士农工商观念有其市场;我们又是个商业社会,人民重视眼前利益,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因此一些专业如医生、律师特别受到人们尊重,

社会地位甚高,其他行业人士的社会地位就没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结果是,幸运能走进受人尊敬的行业者,不只生活富裕,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那些在不甚受人尊敬的行业谋生的人们,则社会地位不高,这就会产生自卑感,以致不能充分地敬业乐业,并力争上游。这种现象既会产生坐这山望那山的后果,也会使人民不安于现状,并产生妒忌心理。

要改变这种社会偏差,显然并非易事。比较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在教育上强调行行出状元哲学,在社会上仿效日本的做法,奖赏各行业的杰出人才。这些年来,有关当局已逐步在这样做,民间组织也有些正在起步,例如“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即是一例。但在思想教育上,我们似乎还没努力去做,而这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忽略的。

要使各行业人士在其工作中精益求精,力争上游,除改善待遇外,在精神方面的鼓励也是顶重要的。但像这样重大的,移风易俗的工作,民间甚难自动自发地进行,这得依赖有关当局通过各种途径,长期坚持地来做,才可收到实效。尽管日本的历史经验与我们的有所不同,它处理这问题的途径,却足供我们参考。培养人民在其行业中富有敬业乐业,力争上游的精神,应该也是促进我国更趋繁荣的工作之一。

1987. 8. 19

防止人才外流更加重要

署名黄泰桥的读者在本报所写的那篇《为“钱途”而移民》的文章，在读者群中颇引起一阵议论。一名老朋友在电话中与我闲谈时就说，他现在至少了解到专业人才移民他国的一些背景与原因。自然，专业人才移民外国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在本地无法施展才干才这么做。不过，我国幅员很小，国内市场不大，外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我们不能说此后我们的经济就不会再出现什么波折。如果每一次的经济波折都导致一批专才外流，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南北越的统一，以及其后越南的入侵柬埔寨，曾为本区域带来不安的气氛。不少学有专长的专才，就在那时期移民外国。倘若这种外在的、偶发的事件，并不是我们能力所能阻挡的，怎样加强防止人才外流，却是我们应当时刻关注的事。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防止人才外流可说比吸引外国人才更为重要。一个在本地土生土长，并在此接受过完整大专教育的人才，他无论在思想感情上或生活方式方面，都能与本地民众取得认同与和谐的关系。本地人才往往是民众景仰的对象，他即使无法带动群众参与什么建设社会的工作，民众依然会以他所拥有的专门学识为己荣。深究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本地人才是加强社会凝聚

力与国民意识的要素。

世上绝对没有一个国家乐意看到它的人才不断外流，这不单单因为人才培育须花费大批财力物力，还因为一个国家即使有足够吸引力吸引外国人才，后者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很不小的缘故。最明显的一点是，外国人才常常会使同一领域的本地人才感到本身处境岌岌可危，或至少也有喧宾夺主之感。其次是，外国人才要数年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深入了解本地情况，在此期间，外国人才与本地民众绝对不可能有水乳交融的关系，甚至还会产生互相排斥的副作用，这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关系的。再其次是，任何领域中的外国人才的比例越大，则该领域所出现的偏差就越大，这在文教艺术界尤其明显。外国教师可能在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对学生有不太积极的影响；艺术界若为外国人才所垄断，则我们的艺术就有可能沦为某一国艺术的扩张地盘；其他领域若为外国人才所把持，虽然没文教艺术界那么明显的弊端，但对社会凝聚力与国家意识的巩固，都有不可忽视的削弱作用。

我们并不因此全盘否定吸引外国人才的必要性，而是在此强调阻止本地人才外流的重要性。我们在吸引任何领域的外国人才的一个原则应该是，以加强该领域的实力及不削弱它的当地独特色彩为准绳。吸引外国人才如果沦落到只是为弥补本地人才外流的空缺，那就不是积极的做法了。

我们是无法挽留那些择善而居的人才的，但对诸如那些在建筑业萧条时期走投无路、无法施展才能的专才，我们却须设法加以挽留。我国幅员小，没多大潜能可供我们的人才无休止地谋求发展，某些领域在某段时期出现人才过剩现象是势所难免的。怎样把这些过剩人才组织起来，并协助他们寻找新的、可能是在海外发展的领域，看来是大家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国家发展部不久前颁布的，准许测绘师与工程师设立联营公司，可说是协助专才寻求

海外出路的先锋。其他领域的专才,也应受到类似的照顾。

挽留本地人才与吸引外国人才并不冲突,只是何者为主,何者为副却须界限分明。外国人才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固国之本。如果一位本地人才外流,导致吸引外国人才只为弥补空缺,那是不幸的做法。我国发展到现阶段,某些领域是有可能出现人才过多的现象的,如何协助这些人才到海外寻求出路,而又不放弃原有国籍,看来真的是有关当局必须深入探讨研究的迫切课题了。

1988.2.22



官民同心协力解决问题

一家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预测,后年我国旅店住客率将跌至50%以下,与此同时,政府也有意削减开支15%,这两项消息对原本在短期内已相当暗淡的我国经济前景,更投下一道阴影。

自今年初我国经济开始显露弱点以来,有两种非常不好的现象出现,一是惊慌失措,以致感到前途茫茫;一是官民相互埋怨,致使局势更为混乱。这种现象若不能及时纠正,再加上可预期的坏消息还会继续出现,就会使局面更难以收拾与调整。

经济委员会成立已有相当时日,其属下8个小组的报告书也将在两个月陆续发表。最近发表的一些报告显示,小组的有关人员对其所研究的课题都有深刻的认识,所提出来的建议也具真知灼见,值得当局深入研究并酌情采纳。

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机缘与挫折。美国战后能崛起为超级强国,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二次大战中没遭到沉重打击。日本的经济在六十年代能迅速起飞,与韩战越战大有关系。我国的经济自有其先天性的弱点,但在朝向高科技工业发展过程中,却碰上世界经济不景的打击,就使其弱点更快暴露出来了,经委会的成立既在检讨我国经济的短期问题,也在修订长期策略。在检讨期间,官民都应该心平气和地找出病根所在,并寻求对策,互相怨

恣是于事无补的。

由小组透露的一些报告书梗要看来,我们过往的某些政策不能说全然没偏差。小企业报告中呼吁当局保护本地企业,教育报告书建议发展我国为教育中心,旅游咨询公司提议发展牛车水,这种种建议都有可供当局研究的地方。

事实上旅游促进局已在逐步调整其偏差。发展虎豹别墅,兴建马来文化中心,保留小印度,都是其荦荦大者。陈庆炎博士倡议的“中国宝物馆”,更是深具创见的。综观旅游局最近所采取的步骤,我们似乎可以说它的目标已较以往明显多了。发展我们的独特特色以吸引旅客,总好过为迎合某部分旅客的口胃而丧失自我。

自然,小组报告书的建议不一定都行得通,但诸如发展我国为区域教育中心的建议,却肯定是非常可取的意见。各小组的特色是,研究有关课题者都是该领域的内行人,凭着这一点,小组的建议便值得当局再三研究了。一句话,由世界经济不景所带来的经济呆滞现象,正好给官民一个冷静思考与研究的机会,希望借此能寻出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大家同心协力解决的时刻,而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

1985. 12. 19

真正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经委会报告书摘要很全面且深入地剖析了我国当前及今后经济发展的难题,报告书基本上是为我国将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一幅蓝图,但它对解决当前经济困境所提的建议,却不只是应急的药方,而是打好将来经济发展基础的有利因素。

我国当前所遇到的经济困境,固然有部分原因是政策偏差所促成的,但更大原因却还是外来的因素影响致使的。国内建设,尤其是建筑业的过于迅速发展,是我国经济自去年起呈现衰退的一大原因。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几乎和发达国家的一样高,但教育水平的过低与经济结构的不够成熟,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障碍。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中方兴未艾的保护主义以及由于原产品与石油价格暴跌而影响我们的邻国经济发展等等,都是外在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由于种种偏差而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比不上薪金的增加的弊病,已使得我国经济目前处于非常微妙的阶段。这微妙的特点是,生活水平是发达国家的国民水平,但国民教育水平与生产力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的水平。报告书所提出的,今后的薪金增加不能超越生产力的提高幅度这原则,是我们非遵守不可的。如果削减雇主公积金缴交率,是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手段,那节制加薪则

是提高生产力的必备措施了。习惯了大幅度加薪与高水平生活的我国国民,在今后数年内对生活再也不能存有过高的期望,这是非常教人扫兴的事,但却是我们求生存求发展所必须忍受的残酷现实。

报告书所提议的种种复苏经济措施,如果是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方案,那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就是完善发展经济的长远目标了。教育部决定在今后 10 年内增拨 30 亿新元来发展教育,可说是我们挤入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为我们的邻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会趋向缓慢,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所筑起的保护主义堡垒,也将进一步限制我们的经济发展。报告书因此建议我国一方面应寻找非传统国家的市场,一方面也应在国外寻找投资与发展的机会,这是非常正确的方针。

综观国内外因素,我们可以说新加坡若想在经济上继续有所发展,国民除须拥有上述所提到的认识外,也须拥有更良好的工作态度。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已较一般发展中国家走先几步,当前我们的竞争对象,不只是新兴工业国,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而且我们是处在不利的条件下与这些国家竞争。这场竞争如果失败,我们只有沦为发展中国家的份。为了争取胜利,我们须放低期望,改变挑剔工作的不良态度,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微妙阶段,而真正步入新兴工业国或发达国家行列中去。

1986. 2. 15

历史是人类前进的灯塔

一个国家能否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继续生存下去，发展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该国国民的爱国意识来决定的。这点对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不例外，但对历史短暂的国家来说，就更为重要。从这角度来看，文德区国会议员廖国斌的建议教育部须研究规定，在学校强制教导建国史，就是个很合时宜的见解。

比起早已塑造出国家意识，而又不曾沦为强国的殖民地的国家来，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尚有待进一步巩固。因此，如果客观评论殖民地官员与南来移民、土著在建国过程中对新加坡所作出的贡献，便是编写我国历史的第一要素；而这也正是我们必须亲自编写我国历史的原因。

任何编写史书的人，都难免以他那一集团的利益为取舍史料的标准，唯其如此，英国殖民地官员编写的新加坡开拓史，除单方面夸大官员的聪明才智与功勋外，为了达致某一立论，他们也会舍弃一些不利于他们的言论的史实。如果我们不在学校里教导观点客观的建国史，不仅会使下一代对我们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一旦他们阅读了外国人编写的新加坡史，还会引起自卑感来。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由少数杰出领袖、爱国者与广大群众创造出来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情操和思想，一定是广大群众的情操和

思想的具体集中的表现。这些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往往是一个国家国民的学习对象，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他们是国家有难时，群众会挺身卫国的精神源泉。

因此，对于建国不久的我国来说，除了忠实地评价殖民地官员对新加坡的贡献外，我们实在有必要广泛收集史料，编写出一套反映新加坡民众中杰出历史人物功绩的史书来。本地杰出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既能激起我们的自豪感，也是下一代学习的模范。

批评历史，用的是正确的历史观，而不是功利的观点。因此，以成败来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太正确的。在编写或教导建国史时，我们应该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到。我国是从怎样艰苦的困境中，走到今日的顺境来的。

在学校内强制教导建国史，是不应再拖延的事。但在编写与教导建国史时，我们不能忽略两大原则，一是不可单方面强调殖民地官员的丰功，而要强化本地的群众与杰出历史人物的伟绩。二是不可以成败论英雄，而该以客观的态度指出失败的历史人物所犯上的错误何在。

历史是人类发展途上的灯塔，它记载着前人走过的阳光大道，也记载着前人踏着的陷阱。它给我们自豪感，也给我们以警惕性。因此把建国史列为必修科，是正确的作法。

1983.7.28

改革教育

一个新颖的构想

吴作栋副总理前天针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所透露的让部分学校在一两年后少受管制而自行发展计划，也是个大胆与深具想象的构思。全国学校的统一化，固然消除了以往各源流学校各自为政的弊病，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突出的名校已失去它们原有的风格，学生非常注重考试成绩，以致缺乏创造性和批评好问的精神。在全国学校统一化，而利弊互陈的此刻，让部分好学校自行发展，以培养出更突出的公民，可说是高瞻远瞩的措施。

自行发展并非彻底抛弃国家的教育政策，这点吴副总理说得很清楚，这些学校仍旧要遵守诸如双语政策的教育方针。我们可以说，新措施是希望在全国学校统一的基础上，能寻找出更灵活更具效率的教育途径，为国家培育出更多具独立思考能力的英才来。

吴副总理只提出自行发展的学校可自订聘教员条件，自行编订课程纲要，少受教育部管制等等原则，其他详尽细节则尚未拟定。但我们的目标若是想尽速实现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社会，那加强母语教育与道德教育，就是条非走不可的途径了。

在自行发展的原则下，校长的职责必然会相对的加重。不过，为培养学校的独特风格，少受管制原则却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这

种较自由的气氛下,学校风格才有可能形成。相信在只须遵循教育部的大原则的前提下,有魄力的校长必能为自己的学校培养独特的校风。

先进国家都是私立学校与政府学校并行不悖的,这好处是公立私立学校都有其独特风格,它们所培养的学生也不是从一个模型印出来的,而是各具特殊性格与专长的一群英才。教育是建国的百年大业,教育事业由国家统筹统办自有其优点,但过分的严厉管制,却也会产生所有学生都是由一个模型印出来的缺点。因此,吴副总理的新颖构想,是值得赞扬的。

每个国家都应有各方面的人才,这国家才能顺利地成长。让部分学校自行发展,就必然会产生某些学校偏重文科,某些学校又强调理科的良好现象,这么一来,我们就不愁会产生文科生或理科生过少或过多的偏差。

其实,在一个先进国家,私立学校除能协助国家培育杰出英才外,也能满足一般民众日益高涨的求知欲。私立与公立学校的相互交辉,正是先进国民众素质特高,有独立思考能力,并兼具文化修养的原因。鼓励私人创办普及教育机构,若是个须深入研究的课题,那放松管制,让部分学校自行发展,却应是个及时推行的构想了。

1985.5.31



日本反核示威说明什么？

5月23日，东京的代代木公园，上野公园及明治公园，纠集了四十万六千名群众，男女老幼都有，有的身穿骷髅装，有的手推载着婴儿的乳母车，有的大腹便便，他们纠集着在听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废除核武器，进行裁军谈判以达致和平”。这就是在东京举行的反核示威，日本每年例行示威，但今年的规模最大。参加示威者有“反核”人士，“反战”人士，“反安全保障条约”人士，反成田机场

启用的“三里冢”人士，反“狭山案件”人士。日本人因为有长崎与广岛被炸经验，每年除在此二地举行反核示威外，也在东京进行示威游行。

我曾经参观过长崎的文化馆与广岛的和平公园，对日本人遭到原子弹的摧残惨景，有很深刻的印象。很多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向长崎与广岛投掷原子弹，主因是日本人不是白种人。日本人的这种相当偏激且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强占中国领土，侵略东南亚，屠杀无辜百姓，这种种罪行，除了有战争经验的老一代日本人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外，普通的日本年轻人是不甚了解的。由于不清楚二次大战时期日本的史实，普通的日本人，往往会用偏激的眼光来看待战争问题。这结果是，把日本想象为被战争牺牲的受害国，把美国指斥为残害日本的主凶，而忘了日本其实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元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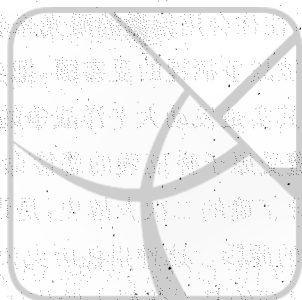
我同情日本人遭受原子弹摧残的悲惨命运，但我认为日本当局没有在学校中教导正确的二次大战史，是误导日本民众憎恨外国，而不能自我检讨的原因。这种捂住历史镜子的真实面，而只把历史镜子的虚假面呈现给日本年轻人的作法，会导致日本狭隘民族主义日益泛滥。因此日本人每年举行的反核示威，其原动力是来自本身的受害经验，而不是带理性的反核。

战后部分日本人既在内心里憎恨美国人，又鄙视亚洲人，我看和日本学校的没教导二次大战史很有关系。因此有些日本人就有这样的双重性格，既自认比其他亚洲人优秀，因此觉得日本无论是以军事手段或经济方式侵略亚洲，都不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却又痛恨美国人的轰炸日本，认为广岛被炸是由于肤色不同，种族有别的关系。日本人的这种双重性格，是他们处处遭人白眼的原因。

要到什么时候，日本人才能以理性的观点来反核，并与世界反

核人士取得一致的步伐？我看这是与日本当局什么时候在学校教导正确的太平洋战争史息息相关的。

1982.5.28



日本人的错误史观

两周前报章曾报导，一名德国纳粹分子拟加入一家大船务公司任要职，但受到该船务公司好多职员的反对。这些职员恫言，如果那名纳粹分子加入公司，他们就要集体辞职，结果是该名纳粹分子知难而退。这事件活生生地说明，德国政府正确地处理二次大战中的德国史实，因此今日的德国人民深明大义，能分辨是非。反观日本，由于当局以吞吞吐吐、含糊糊的态度来处理日本当代史，因此造成一般日本人会去靖国神社祭拜战亡灵魂，造成一般日本人只责怪美国轰炸长崎与广岛，而不会反省二次大战是日本发动的，以致出现美化军国主义的电影《大日本帝国》场场爆满的局面。这说明正确与不正确的处理史实，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其差别很大。

日本政府为何不能像德国当局那样，以正确的观点来处理当代史呢？日本国土厅长松野的看法，颇能提供我们答案。松野说：“每个国家对其历史都有自己的看法。有哪一个国家会教导它的人民，他们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何谓不光彩的历史，揆诸史实，那就是日本侵略别国而遭受到惨败的下场。松野的错误观点，并不只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日本一部分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驳斥这一部分日本人的这种错误史观，指出其观点的荒谬。

那部分日本人何以会有这种错误史观呢？那是由于部分日本人误解了“耻”的观念。日本人会误解“耻”，是由于他们判断“耻”时，是以野性的复仇精神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非为衡量“耻”的标准。这种偏差与德川幕府时代以儒学为国学，并渗入武士道精神有关，也与明治维新时代，政府大力提倡“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有关。但日本人只要一天不认识到“耻”是有是非标准的，没有是非标准的“耻”，在很多场合是“错”的代名词这事实，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就会阴魂不散。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所谓耻，是遭受到别人的欺侮或别国的侵略，而不是动兵去侵略别人遭遇失败。用这标准来衡量二次大战，所谓有不光彩的历史的对象，其实应该是中国，韩国，朝鲜与东南亚诸国，而不是日本。日本只有错而没有耻，而儒家思想中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名训，这很可为松野及其持同样论调的人参考与深思。

1982. 8. 14

日本篡改史实的前因与后果

自日本教育部篡改它的侵华占朝与蹂躏东南亚诸国史实，引起各有关国家的批评与抗议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日本教育部与外交部正为是否接受中、韩的意见，是否据实撰写它的当代史而闹得很不愉快。这很明显地说明，自民党内的鹰派与鸽派已因此事而把内部矛盾表面化了。

日本为何要在此时篡改史实？这大概可从三方面来分析这问题。从历史观点来看，日本社会中的好战分子，由于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始终都不曾对日本的发动太平洋战争感到后悔，而只为日本的战败感到羞耻，无时无刻不在想借机会东山再起以雪耻。

从国际情势来看，日美的贸易战，促使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日本扩大军备，既以自保，也能协助美国防卫亚太区。美国这样做，无非是想削减它在亚洲的防务开支，以图尽速恢复它的经济衰退，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美国的这一要求，正好给日本好战人士以扩军并重温军国主义美梦的机会。

从日本国内的情势来看，要扩军，要复辟军国主义统治，就必须制造口实与舆论。日本战后出生的青年，虽不知战争的可怕，但厌战心理强，要号召年轻人投军，就要有充足的理由，而在好战分子看来，篡改日本的侵略史实，美化日军当年的劣行丑闻，是达致

重振军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因此我们可以说,主张美化日本侵略史的,是一批眼光浅短,思想顽固,中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的好战分子。日本战后推行民主议会制,但政治发展到今天,大阪竟然掌在好战分子手上,实在是日本人民最大的不幸。

从种种迹象看来,篡改史实事件不仅会导致自民党内部矛盾表面化,也可能会迫使铃木善幸下台,会使得原本是派系众多,四分五裂的自民党进一步瓦解,更严重的是,日本战后三十多年来,精心塑造的反战形象,将从此消失无遗。现在日本既然篡改史实,亚洲人民对日本的所谓反战言论,就只好存疑。亚洲人民对日本的扩军,就只好理解为另一次侵略战的准备。亚洲人民对日本资本家的南来投资设厂,就只能理解为经济侵略。这种种反效果,日本人民将重新浪费一代人的时间,才有办法挽回亚洲人民对日本的信任,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只有为日本当权者惋惜,也为日本人民所蒙受的损失感到悲哀。

1982. 8. 23

无知之错与有意之过

日本教育部在处理外国舆论批评它的篡改史实时，是采取这样的两种态度：一是说外国干涉日本的内政，二是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告诉它的国民有关它的不光彩历史。这两个论点，只要揆诸事实，就无法站得住脚，就拿西德做例子来说明问题吧。西德学者在编写二次大战史时，不只真实反映当年纳粹分子的丑行，在史实牵涉到别国时，西德学者还会和英、法、波等国学者商量该怎样评价该段史实，务必做到各有关国家都满意才编写进课本去。

撰写有关西德怎样对待史实的文章者，都是日本记者，可见得日本当局篡改史实，不只外国报章对它抗议，连日本文化人，也见义勇为，提笔为文，抨击日本政府的荒谬，日本文化人与外国文化人对篡改史实的这种义愤，说明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希望看到人类将来有个更美好的生活远景，也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愿的。

外国文化人责骂日本当局篡改史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日本文化人也引经据典，搜罗资料来撰文抨击日本政府，这除了说明日本社会有民主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文化人有骨气，能明辨是非，敢仗义执言。比较起来，一些自诩为日本通的华人，居然撰文为日本的篡改史实进行有意无意的辩护，就有点是非不分，爱憎不明了。

有一篇文章这么说：日本人想在这时候淡化二次大战的历史

罪行,是日本人没有洞察国际形势而犯下的大错,接着该篇文章又引述别国史书的忠实反映史实,来说明历史教科书能忠于史实的实在不多,而这是当代的悲哀。最后该文作者又引用意大利、澳洲的教科书,怎样失实地把日本形容为空气极端污染、地震多到一天四五次的国家,作者多方引述资料,足以说明教科书内容若不忠于事实,就会伤害到下一代。

该文作者的真正动机何在,我们暂不深究。单单从立论的观点来看,这作者就犯上概念不清的错误,从而导致他在文章里有意或无意地为日本教育部辩护。意大利或澳洲课本编写员,由于根据失实的资料来编写课本,致失实地把日本描写为一个天天有地震,空气布满毒素的国家,这是无知的错误,而不是有意的过错。日本教育部篡改史实,即使是没认识到八十年代已不是可篡改史实的时代,但他们精心策划的修改课本,却是有意的过失。把无知的错误与有意的过失相提并论,并从而把两者的恶果等同起来,在客观效果上,就是为有意的过失制造者进行辩护。这种行径除了说明该文作者思路不清外,也说明他在潜意识里已自认为是日本当局的一分子,才会这样地多方搜罗资料来为日本教育部减轻罪名。

1982.9.18

樱花盛开前夕看日皇

际此樱花盛开前夕，美联社发表一篇评论日皇裕仁的文章，很值得我们深思。该报道所引述的一位留美日裔学者羽根对裕仁天皇的充满着温情的评语，也很值得回味。羽根从裕仁的随从主参谋的日记中多方引证以说明裕仁既善良又爱好和平，只是生性纯良，且受宪法牵制，以致无法阻止当年战争爆发。

战前的日本天皇，是被日本人当作神看待的。他可统帅海陆军，他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裕仁天皇也不例外。说裕仁天皇生性纯良，因此无法控制当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横行霸道，这未免有美化天皇的嫌疑。

日本发动二次大战，责任当然不在裕仁天皇一人身上。明治以来即实施的军国主义教育，早已使得日本民众，不分高官达贵，贩夫走卒，都把侵略别人国土，当作保卫国家的神圣任务。也正因民众中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毒，东条英机才有办法发动战争。裕仁天皇生在当时的思潮里，他是不可能不犯上以侵略别人国土为理所当然的错误的。根据手头的资料证明，当日本向英美宣战时，裕仁天皇曾扮演过统一各将领意见分歧的任务，并拉拢官僚财团出钱支持长期战争。

战后的裕仁天皇诚然是降为人格天皇，而非战前的神格天皇。

裕仁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他的地位是以拥有主权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而不再拥有高过一切的统治大权与特权。天皇仅能从事日本宪法草案所规定的国事活动,而不拥有国政权限。

对天皇这种有名无实的权限,自民党内有一小撮分子很是不满,而倡导赋天皇以实质元首地位,并强化天皇的实质权限。这些分子的言论,很教人担忧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并未销声匿迹,且随时要借尸还魂。因此,对任何美化天皇的言论,都难免要使人怀疑,这会不会是残余军国主义分子的行径。

在战前与战时是神格的裕仁天皇,即使他不是战争的主谋,但以他的地位与权威,而竟没能号召人民反战,这本身已是一种过错了。现在竟有学者从天皇的随从主参谋的日记中,断章取义拿来论证天皇的善良与爱好和平,实在教人费解。

往事不可追,天皇的过错,是日本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民的共同错误,不是他个人独有的过错。认真检讨过错,纠正过错,避免一错而错,并好好展望未来,才是正道。企图美化过错,蒙骗民众与世人,于人于己,都没好处。羽根根据日记断定裕仁天皇既纯良又爱好和平,其动机若纯粹是学术研究,则其偏差尚情有可谅,但其动机若是为了美化天皇,则就教人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在蠢蠢欲动了。

土人皇天口裕五不熱進封貴,點人為二條天皇日

親,貴志宮高代不,众男本日醫對日早,育榮又主國軍前

另因五出,養封至將前案國紅屬滑進,土國人懷調野戰精,幸主人

皇天口裕,幸點必愛者代育本馬英榮涼,推前繼思又主國軍了中

出池要代土國人民調對知土飛不前更不景盼,聖斷思前調出

天口裕,知點宮美英向本自出,即至林寶蘭夫手等則,前點前

實對出國極潮官將就其,養封前對代果意聯研看一案知前但皆

皇天裕前前前非而,皇天裕人代判雖然點皇天口裕前日點

日本缺乏改过的诚意

《朝日新闻》报导日本最新的历史教科书时，曾提及日本教育部依然篡改当年日军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大屠杀人数。教育部的这种企图减轻当年日军罪状的措施，于人于己都没好处。

一个民族犯上的历史错误，就和一个人犯上的思想错误一样，不是短期间内就能纠正过来的。日本人长久以来住在孤岛上，少与外间接触，德川幕府长达二百八十七年的锁国政策，更使大和民族的一般民众陷入夜郎自大与自以为是困境中去。明治时代的有意渲染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政策，加上日本本土的恶劣地理条件，是日本向外侵略的根源所在。

当今掌握日本政治大权的领袖，都是接受二次大战前的日本教育的人，他们也许多少会受到军国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而且，日本战后的历史教科书，也始终没清楚地交代日军当年如何残杀亚洲民众的史实。这结果是，在客观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民众或政治领袖，照例会低声下气地在表面上伪装承认日本过往的错误，但在内心里却还是自以为是的。日本近年来的首相，例必到靖国神社祭拜战亡灵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日本教育部去年对待其侵略亚洲各国史实的专横态度，则是另一个令人惊心的课题。这些事件彻底说明，至少是一般日本政治领袖，并没诚心诚意

承认日本过往的错误。

日本已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在军事上它也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为何亚洲各国都对日本的扩军抱着狐疑的态度呢?一句话,日本政治领袖并没诚心承认日本自己的过错。

人的思想是以他的知识为基础而延伸出来的,没有正确历史知识的人,他所演绎出来的历史观也必然是错误的。把日军屠杀亚洲人的人数刻意削减,把被屠杀的人指为抵抗日军的人,这种作法是死不悔改的表现。这种作法的立论的大前提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只有在肯定日本侵略别人国土是正确的大前提,才可得出抗拒日军该受屠杀的结论来,而这正是日本当局颠倒是非的作法。由于大前提是错误的,日本教育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虽不得已修改历史,但却又企图在没充分史料证据的藉口下,把屠杀人数减少。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犯上错误而想改过,重要的是诚意与实际的行动,而不是矫饰的行为与美丽的语言。日本教育部一天不诚诚恳恳、以正确的态度来编写它的侵略亚洲各国史实,日本民众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观;而其后果则必然是亚洲各国民众对日本人的始终不会信任。日本是有条件成为亚洲的政治大国的,但最大的克星是日本人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日本当局,对此应该三思。

1983. 6. 2

年轻一代日本人

应知道血腥事实

日本明年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提到“南京大屠杀”与“新加坡大检证”时,已改用“侵略”来代替旧课本的“进出”字眼,但却把屠杀人数削减,在叙述“新加坡大屠杀”时,教科书也形容被屠杀者是“被视为抵抗日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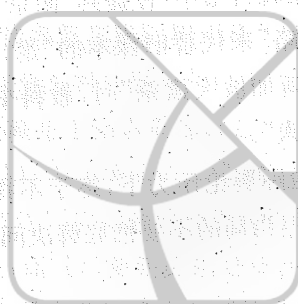
日本教育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终于不得不改写日本当年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但当局的不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态度,却说明日本政府没诚意改过。

屠杀新加坡人,到底是六千人,二万人,还是大家公认的五万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教科书把被屠杀的新加坡人说成是“被视为抗拒日军的人”。这种说法犯上两层错误。其一,如果说“被视为抗拒日军的人”,就该被杀,那等于说日军占领新加坡是对的,这是不承认错误的表现。其二,谁都知道,在大检证中被屠杀的五万新加坡人,全部是平民,他们根本没参与抗日战争,说他们是“被视为抗拒日军的人”,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我们相信大多数日本人是无辜的,是爱好和平的。不彻底承认错误,不让日本下一代洞悉日军当年残暴行径的,只是一批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人。不过,只要这样的一小撮日本人依然存

在,依然在日本政坛上呼风唤雨,我们就不可对日本的扩军掉以轻心。篡改史实,对人们思想的恶劣影响,到底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983.6.6



应该更正确地对待亚洲史

署名老忍的读者在他的《阿信剧场中的毒素》一文中所提出的，日本人篡改侵略中国史实的观点，并不特别教人惊奇。但他指出新加坡已整 20 年没教小学生亚洲史或中国史，却是个值得大家探讨的课题。

日本学者中岛正人刚完成他的第一部有关二次大战日本军队屠杀东南亚人民的历史书。他共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去收集资料，走访日治时期受虐待而庆幸生还人士，才写出这部名叫《屠杀的痕迹》的著作。

中岛正人肯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本书上，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是，日本人到目前为止还对日本军队屠杀亚洲无辜民众一无所知，日本当局把这段侵略丑史的资料大都毁掉了，在历史课本上，又把此段史实加以歪曲，这样一来，日本年轻一代就无从知道日本曾犯过的历史错误。中岛想写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著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年轻的日本人能彻底看到日本过去犯上的错误。

像中岛这样有良知的日本学者虽不少，但像《屠杀的痕迹》这样的历史著作，在漫画、软性读物流行的日本，却肯定不能流传得太远。此书初版售一万册，预料今年内可再售四万册，从滞销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成绩已很不错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一本销售

五万册的著作,对日本民众的影响就不太深远了。因此,该肩负起教导日本学生正确历史的是日本教育部。教育部篡改史实,除了说明日本有部分至死不承认错误的顽固分子外,也使日本年轻一代永远无法从历史中得到应有的教训。

日本的当权者什么时候才会醒悟,才会正确地处理那段史实,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能做的是,在学校里更全面地教导学生一些正确的亚洲史。如果日本的年轻一代对此段史实一知半解,甚至被歪史所误导,而我们的年轻一代对此段史实又一无所知,长远来说,对新日两国的关系必会有不良的影响。

中岛在闲聊中曾对我说:人与人的情谊应建立在互相了解,坦诚相待的基础上。扩而大之,两个国家的国民之间的友情,也应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教育部不肯让它的国民透彻了解日本的侵略丑史,这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改变的现实,但中岛正人想以严肃历史著作来教导日本年轻一代认识本身的历史过错,效果虽然不大,精神却是可嘉。身为受害国之一的新加坡,则不妨考虑在历史课本中插入此段史实,这样做,至少可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或在对待日本问题上,能做到知彼知己,而不致被没正确历史知识的日本年轻人的言论所迷惑。

1985. 6. 20

日本仍在歪曲史实

前天路透社的一段简短新闻说，日本教育部小组已审查通过一本新的引人争论的历史教科书。该历史书将于明年在日本各校采用，编纂者为日本一个民族主义团体。该历史书不仅避免用侵略的字眼，也掩饰日本于二次大战期间在亚洲展开的军事活动。

日本篡改史实的风波在 1982 年曾发生过，当时由于中国与韩国的强烈抗议，日本教育部才答应修正教科书。四年过去了，看来日本当局对中韩的许诺只是外交辞令，在内心里日本的有关者并没想对史实作忠实的托出。这种态度无论对日本或亚洲国家都没好处，实在教人遗憾与痛惜。

日本并不缺乏有良知的学者，他们所撰写的，比较符合史实的历史教科书也不少。例如日本大学教授小岛淑田所撰写的世界史，就相当具体与详尽地叙述日本统治殖民地的情况，但却遭到教育部的删除，理由是不宜过分强调历史的黑暗面。三年前，日本政府在检查“新加坡大屠杀”那节史实时，也把原书的“20000 名”被屠杀人士改为“6000 名”。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数目字，当局也依样画葫芦。

每个民族所编写的历史多少都有一些袒护自己的观点，这原无可厚非。但日本侵略亚洲的罪行，却不单单是大和民族的历史，

也同时是亚洲各国的历史。人类多少是在历史错误中得到教训而后才能逐步前进的,日本当局掩饰自己的过错,对大和民族的前进并无帮助。

与日本比较起来,德国对史实的处理就明智多了。德国在编写近代与当代史时,不只承认它侵略英、法、波等国的史实,还与这些国家商讨每段史实的评价问题,做到每段史实的记载,都得到有关国家的同意。

日本教育部在对待外国舆论批评它的篡改史实时,往往是采取这样的两种态度,一是说外国干涉它的内政,二是说没有一个国家会教导它的国家有关它的不光彩历史,也即是不宜过分强调历史黑暗面。这种狭窄的,傲慢的态度,对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日本当局在亚洲各国的一再抗议下,到今天还在歪曲它侵略亚洲的史实,这未免要教人怀疑日本到底是不是要在掩饰自己过去的丑史的同时,逐步发展为军事强国。近年来,由于美国要求日本扩军,日本今年的防卫开支已超过国民收入百分之一的传统界限,也逐步建立了一支军队。日本扩军,又配上歪曲史实的顽固作风,就难免要引起亚洲各国的担忧,而对日本产生不信任的心理。这是值得日本教育部深思的课题。

1986.5.31

日本应深思改史的恶果

闹了四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只余波未了,最近还节外生枝,教人对日本当权派的一些顽固分子的恶劣作风感到愤慨。日本教育部长藤尾正行前星期五在一次电视访谈中,竟然声称“那些指责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侵略行为的家伙,不也有同样的犯罪行为吗?”这声称已引起韩国政府的关注,并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解释;此外,韩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在汉城的日本使馆前游行示威,并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藤尾的访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政坛上那些依然拥有残余军国主义思想者的嘴脸是何等丑恶。藤尾用“家伙”二字来反击那些指责日本历史教科书有问题的人士,不仅嚣张,而且含血喷人,彻底地暴露了军国主义残余分子死不认错的本性。

藤尾的谈话有两点不合理处,其一是,在草昧时代国家尚未统一前,每个国家都有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互相侵略的战争,甚至与邻国发生领土纷争的战争,这些类型的战争与日本的发动二次大战在本质上有不同;其二是,日本侵占中国、韩国与东南亚国家,不是领土纷争,而是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的发动侵略性战争。而且,当年日军的残酷行为,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少见。

藤尾的反击,至少会使人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是不是有复活的

可能？他的诡辩，不单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反悔之意，而且是在为日本过往的罪行寻找逃脱的借口。中曾根首相虽然出来为藤尾的声明澄清，但中曾根只说藤尾没专指哪一个国家犯过侵略别人领土的行为，而没批评藤尾谈话的不妥处，这是教人遗憾的。

我接触到的日本年轻人，他们都没有在学校的课本中接触到日本侵略行为的历史，他们之中有些是从课外读物中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有些则全然不知。偶尔与他们谈起这段历史，他们就会惊讶、惭愧，并表示愿意代祖先赎罪。日本的年轻一代是厌战的，日本当局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段丑史，这不只有利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更崇高的形象，也有利世界和平。

与日本一样，德国在二次大战中也曾犯下滔天大罪。然而德国处理纳粹分子的严厉手法，处理该段史实的坦诚作风，都教人心服。德国不仅坦诚承认该段侵略史，且在撰写该段史实时，还与有关邻国磋商细节问题。与德国一比，日本就显得小家子气了。

闹了四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竟然又节外生枝，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至少说明，日本当权者的心胸是狭隘的，是不敢承认错误的，是死不悔改的。这种恶劣作风，从较小方面来说，不利于日本与邻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从较大方面来说，则不利于日本在国际上树立崇高的形象。日本有关机构篡改历史，固然教人愤怒，但真正蒙受重大损失的，却还是日本本身，日本当局不妨深一层去探究这个问题的实际后果吧！

1986. 8. 3

加强日本与亚细安文化交流

目前在日本攻读学位或进修日文的外国留学生共计一万多名,其中绝大部分是亚洲国家公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费生。由于日元继续高涨,留学生生活一日比一日艰难,只好拼命利用部分时间工作,赚取一些钱来补贴生活费,结果弄得身心交瘁,学业也搞不好。

日本的一些民间机构,眼看留日学生的生活窘态,就举办了好些义卖会,为留学生筹募基金,有些机构则尽量为留日学生提供租金较低廉的房子。尽管日本几家大报都不断在报道这类性质的新闻,日本政府到今天尚未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协助留日学生。上个月曾到亚细安六国访问的一个日本文化代表团,回国后就曾在报告中提及留日学生的问题,这是值得日本政府关注,并需立即予以解决的问题。

留日学生在日元高涨下,生活拮据,日本政府并没采取什么应对步骤,那只是日本文化交流政策落后的一个显著事例而已。长久以来就存在的、而今还未获得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日本政府并未充分照顾到留日学生的日文水准问题。当前的留日学生,若是攻读学位的,绝大多数只在日本语文学校补习一年日文,第二年就直接报考大学进入大一攻读学位了。因为本身的日文程度尚不够高,

一些讲师的言谈又带有浓厚乡音,留日学生在听课时很是吃力,对讲授内容的吸收也就大打折扣了。

日文不像英文那样在世界各角落都很流行,也因此,一般留日学生在到日本留学前多不是精通日文的。加上日本又没在海外设立类似英国文化协会那样的组织,留日学生不少是连普通日文知识都缺乏,就毅然远赴东洋留学。日本近两年来虽已在海外举办日语能力鉴定统一考试,但对在海外教授日文却还没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留学生问题自然不是文化交流问题的全部,但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事实上日本当局也很重视这课题,并计划在 21 世纪实现 10 万名留日学生计划。这理想当然很好,不过,若要实现这计划,有两个问题显然非先解决不行。那就是协助留日学生解决他们面对的生活难题,并提高他们的日文水平。

日本文化代表团的报告也建议日本设立一个日本亚细安文化中心,以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日本怎么说都是个亚洲国家,其文化与生活方式与亚洲各国大同小异,亚洲各国对日本语言、音乐、电视节目深感兴趣,绝非偶然。但日本就似乎并不那么热衷于介绍亚洲国家文化了,这方面的工作实有必要加强。

日本的一些较小城市的大学或艺术机构,有时倒更有兴趣于介绍亚细安文化。福冈市博物院数年前开幕时,就曾邀请我国名画家前往参展。一两所较偏远地带的大学也曾写信给有关部门,每年要提供数份奖学金给新加坡学生。日本政府若设立一个亚细安留日学生基金会,并广为宣传,相信必能获得热烈响应。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强国,日本在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显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1987.1.15

日本文化人的骨气

日本名摄影家浜谷浩，今年三月得到 1981 年度艺术选教育部奖状。但在上个月 27 日，浜谷浩却把奖状与三十万日元的奖金退还给有关当局，理由是日本教育部篡改教科书，很使他不满意。艺术奖对艺术家来说，是一项无比的荣誉，浜谷浩为了抗议当局篡改史实，竟然退还奖状与奖金，这说明日本艺术家大多是有骨气的，有原则的。

前些日子，有人自诩为日本通，妄指日本文化人中有些带假面具者，常常反对这反对那，而竟不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这种论调，对日本文化人，实在是天大的侮辱。

文化人的可贵，就在于能坚持己见，而不会随意苟同世俗的见解。一个社会有了这种人，这个社会才会有前途，日本社会到今天还欣欣向荣。与文化人的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有关。任何用狐疑的眼光来看待日本文化人坚持真理的人，都是以市侩尺度来忖测文化人的心态，他们的错误，在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诚然，坚持己见，未必就证明那见解是一定对的。三岛由纪夫也因坚持己见，而以自杀告终。三岛的妄想复活武士道精神，固然是个落伍思想，是违反日本的利益的，但三岛的坚持己见而竟自杀精神，却是文化人高风亮节的表现，这种情操绝不是市侩所能想象

一二的。

这回退还艺术奖的，也不只滨谷浩一人，在提名时，诗人谷川俊太郎、新歌手前登志天也拒绝被提为艺术奖者，原因虽不明，但却说明日本文化人确实不是为名为利之徒。

对这次日本教育部篡改史实，批评得最严厉的是日本报章，抗议的最大声的是部分课本编写员，据理力争得最厉害的是日本教师组织，这些文化人既非政客，也非市侩，他们批评自己的政府，既不是为了领取津贴，也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国家的前途，这种为真理而辩护的行为，又岂是斤斤计较蝇头小利的市侩所能理解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由于每一时代都有敢坚持真理的文化人在奋斗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说明，每一时代也都有的一些误以为自己是在坚持真理，而其实是在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的人在抗拒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过，这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的可爱处，那就是他们不投机取巧，不发媚俗的言论，这两种人是远比那些看风转舵、发违心之论以取悦权贵，并获取个人荣华富贵的人渣可爱。因此我们可以说，滨谷浩的退还奖状与奖金，实在最足以说明日本文化人是有骨气的。

1982. 9. 16

中曾根失言余波未了

日本首相中曾根有关美日民众知识水平孰高孰低的谈话，不仅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也在日本兴起舆论风潮，于今余波尚未了，真教中曾根尴尬。

中曾根说美国由于有有色人种，因此民众知识水平不如日本民众的高，结果是美国朝野上下一起抗议。中曾根赶紧澄清说，他所强调的是日本是单一民族社会，但结果却引来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的抗议。中曾根又赶紧说少数民族在日本已被同化，他们也没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结果却引起朝鲜族的抗议，朝鲜人在日本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是尽人皆知的。

到目前为止，中曾根失言的风波还未平息，而他每一次的澄清，总会引来另一个新的问题，看来他快被自己挑起的问题所淹没了。中曾根失言的主因在于他本身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思想偏差使他蔑视日本社会中的少数民族，也造成他得意忘形随意批评美国的少数民族。

环顾世界，似乎还找不到一个纯粹单一民族的国家，即使是汉族占其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也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存在，其他各国更不用说了。

交通发达了，世界缩小了，传播媒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世

界各处的新事物与新知识引进来,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其民众的思想也难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百分之百地维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的。

单一民族的国家既不可求,那怎样对待少数民族,便是从政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了。人类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同化,是一个长远且缓慢的自然演化过程,而且容不得武力干涉,否则必引起反抗。中国鼓励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字与文化,则更是开明的作法。其实,一个国家的文化渗入少数民族的色彩,可能会显得更多姿多彩也说不定。

即使撇开朝鲜族与阿伊努族不谈,单从文化上来看日本,日本文化也不纯粹是大和民族的产物,日本文化很显然是受到中国、印度与欧美文化的强烈影响的。一个民族的特性与其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大和民族的文化既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那大谈特谈民族的纯粹性又有什么意义呢?中曾根既忽略了日本国内有少数民族存在的事实,又忽略了日本文化乃是大杂烩的事实,归根究底这是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偏差促成的。他一再澄清,而始终澄不清少数民族的不满,原因也在于他的思想偏差伤了国内与美国的少数民族的心。

1986.11.7

寻梦 寻根 诗人 文人

——风沙雁创作论

周 宁

那天,细雨迷蒙,暮色苍茫,他再次登上山冈。多少年过去了,依旧是那番感动。“中华文化给我予多愁善感的特质,使我能欣赏自然中每一个美的境界。”说这段话的风沙雁骨子里是位诗人,有诗人的浪漫,诗人的敏感,诗人的天真与忧虑。在一个诗歌变成豪言壮语、格言警句或玄言天书的时代,他去写散文,用散文抒情,在散文中思考,散文成了他自由的形式,让他生活在云南园的浪漫回忆中、东洋的樱花枫叶中、中国古典的诗情画意里。

风沙雁曾经是诗人,写过诗,那时“年少才高”。后来专写散文,忧患深沉了,风格也越发沉郁。他的散文大多发表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联合晚报》、《联合早报》等报章上,后来结集出版的有《砂砾集》(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矛盾集》(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樱花飘落时节》(风云出版社,1982)、《枫叶初红忆扶桑》、《文艺絮语集》(中外翻译书业社,1992)、《海外来风·欧清池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哀思集》(中外翻译书业社,1993)。从内容上看,他的散文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抒情小品,一类是文艺评论,一类是政论杂文。写散文抒情时,他是一个浪漫到伤情的诗人;写文艺随笔或政论杂文时,他又是一位目光敏锐的批评家。我有时真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如此深入地生活在两个相对的世界。

界里，一为至情一为纯理。有人说文学是用血写出来的，哲学是用骨髓写出来的。苦吟苦作，忧思冥想，风沙雁的才情与学识同样令人钦佩。我想，不仅在新加坡华文作家中风沙雁的成就令人瞩目，在世界华文创作文坛上，风沙雁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在他的创作题材与风格上，更体现在他忧患深沉的主题上。他以诗人的心灵感受、学者的头脑思考，从个性情感到普遍精神，从寻梦到寻根。自70年代开始创作，他就走上了一条神圣而又痛苦的朝圣之路，如今他仍在求索，这条路将他引向远方，引向想象与自由的国土，引向民族文化的精深博大处。

写作是一种浪漫的经验，它把风沙雁分隔在两个对立的世界，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两个世界，一是自然，一是城市；一是文化，一是社会；一是过去；一是现代；一是中国；一是新加坡。前者属于理想，后者属于现实。风沙雁一旦进入抒情境界，所有属于理想的东西，都会显得分外美好。风沙雁在抒情小品中描绘的自然景色，无论晨光暮色，春雨秋凉，都是华文中可能创造出的最优美的文字，它继承了《离骚》的文采，李杜的风情，明清小品文的性灵。在自然中，作者似乎回到了精神家园。这里融通了广博的民族文化与悠古的历史，是一个与缺憾的现实完全相反的圆满世界。遗憾的是，这个美好的世界似乎离作者越来越远，儿时乡居的野趣被现代都市的组屋所取代，云南园的青春已如梦如烟，从日本回来以后，枯燥单调的生活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只有在文学创作中，他才能超越现实诗意地生活。

风沙雁的抒情散文大多集中在《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与《哀思集》中。他意识到两个世界的分裂，也试图寻找某种统一的境界。客居日本那五年，他似乎看到这两个世界融合的希

望,日本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并存使他恍惚看到现代的新加坡与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日本的自然景观与城市风物使他发现自然与城市还有可能达成审美的和谐。也许最重要的,是他生活在日本时常幻觉到生活在古代中国,生活在深情向往的精雅传统中。正是这种幻觉促使风沙雁写下了许多关于日本风物的抒情小品,而他最优秀的抒情散文,也产生自这批作品中。日本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化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即凄清美。他喜欢那种境界,体验现实有如幻想,体验幻想有如现实,或朦朦胧胧,或清清明明,山川草木,人文精神,在半醉半醒间看,在花开叶落时吟,有三分多情,二分伤感,一分凄清。

我没有读过风沙雁早年写过的诗,但觉得他的散文比许多诗更有诗情。80年代初,他客居东瀛五载后回到新加坡,一时竟分不清哪是他乡,哪是故土。中华文化孕育的日本风情时时让他联想到文化家园,可新加坡却是他生长的祖国。于是理想与现实的归宿再次分割了他,他时常感到痛苦。最初那几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关日本生活随感的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便是《樱花飘落时节》与《枫叶初红忆扶桑》。这两部散文集记载了他一种独特的体验,故园似他乡,他乡如故园。一位失去民族传统与文化滋养的海外华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心灵深处那种时常让人绝望的飘零感。

“游子的浮云感,竟然要靠异乡景物来慰藉,人生有比这更凄苦的境界么?”(《偶感》)本是故土的新加坡,却一时找不到“睹物思情”的地方;异乡的日本,却处处有故园之情。风沙雁的文化认同心态是极度痛苦而矛盾的,真是故乡也苍凉,异乡也苍凉:“……我对故乡的薄暮的感受,竟然是一如异乡的那么苍凉。日本的冬的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如果是乡愁与异族文化的挑逗;那故乡薄暮给我予苍凉感,却是因本族文化没落而来的悲伤。”(《薄暮的苍凉》)伤感凄凉的境界始终笼罩着风沙雁笔下的景物,这与其说是物境,不如

说是心境。这种心境我们曾在宋词元散曲中见过，宋明文人画中见过，总是寒斋早立，寂寞楼头；或冬雪皑皑，或春雨潇潇，无端愁绪无尽烟波。

回忆是一种享受，一种凄伤的享受。个人韶华不在，民族文化难全，日本归来之后，风沙雁的散文小品大多是触景生情的怀旧之作。他把精神家园遗失在云南园的山冈上，遗失在东瀛的山韵草趣中，每日单调枯燥地在都市里为谋生奔忙，没有诗意，很少闲暇。只有在写作时他才能重温旧梦，慰藉他那颗孤寂的心灵。然而，现实是一个世界，想象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经常难以调和。这是作者体验到的另一层痛苦，所谓故乡与异乡的错位感实际上是由社会与文化的矛盾造成的。风沙雁在新加坡只找到现实或社会的家园，而精神家园却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在想象中的日本。“景物的吸引人，其实是文化附着的关系。我的怀念东京，大半是在那儿我能看到自己的文化点滴造成的。我回来后的失落，却大半是看到一些好事物日渐消失造成的。”（《给桃女的信》）风沙雁说过，他只喜欢日本的景，不喜欢日本的人。他写过许多文章谴责日本侵华的罪恶。他在内心深处不会感觉不到那种被愚弄的痛苦：一个令他感到文化亲切的地方也同样使他感到历史的憎恶，他感情所系却是理智所殊。我说风沙雁生活在分裂的世界里，这也是一例。理想与现实分裂，情感与理智分裂。

山水关情，全赖文化的附丽。就像风沙雁所说：“在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海韵就格外动听。”（《海的追忆》）表面上的自然关怀，实质上是人文关怀。风沙雁堪称写景高手，在他的抒情小品里，随处可见出色的景物描写。而一切景语皆情语。晨曦暮霭，草色山光，都是文化的象征。我常想他为什么对新加坡的南洋热带风光缺乏感受，大概是华文古典文学中没有这类描写。风沙雁是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在诗情与画意中看世界的。他热爱自然，实际上是热爱自

然中可以感悟到的人文精神；留恋过去，是留恋往昔生活蕴含的那种文化传统。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对于风沙雁来说，成为一种充满忧患与感伤的文化寻根历程。“酒后的朦胧，雨中江景的凄迷，远山的淡云，秋景的肃杀，我除了化入这些情景外，我将何以解脱呢？岁月飘逝，这些情景就像我的其他只可追忆的情致一样，又都蒙上一层轻烟，若隐若现，让我时时可窥探一番。我带着唐诗宋词元曲看自然，自然都涂上诗词曲的意境美。”（《情思》）文化断根所造成的那种漂泊感只有在如诗如画的自然中才能得到解脱。

文化关怀是风沙雁创作的动机与精神核心，也构成他的思想与艺术特色。这种关怀产生于现实中的文化失落感。生活在大陆的华人，文化传统渗透在每一个生存角落，他们或许更关心传统的变革，而海外华族移民的后代，处于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之外，于是文化的延续性与统一性就尤其重要。文化的认同感是存在的基础，移居海外的华人经常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以放弃文化传统的继承权为代价谋取在新国家的生存权。由此遗留下来的文化空洞或“精神私生子的落寞感”就积淀成广大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在风沙雁的作品中体现得分外明显，它可以作为一个核心将他文学生涯中的种种表象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精神世界。在总结自己的精神历程时风沙雁曾说：“我这半生有两段生活最难以忘怀，一是云南园的四年寄读生涯，二是东京的五年暂居经验。前者是品味文化精髓的切实感受期，后者是领略东洋情调的凄清经验期，这两段生涯都教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春到河畔·芳踪何处》）风沙雁如此梦绕魂牵，并不断给他创作灵感的这两段生活经历，恰好是他生活中最亲近中华文化的时期，前者在书本上，后者从实物中。

“云南园的夜晚宁静得像刚出世的世界一样清冷，远处飘

来的花的幽香，应是她身上发出的；风的轻吹相思树的轻响，就是她轻盈的脚步声；何处的同学的宿舍飘出的轻音乐声，竟似海上的絮絮的波浪声了。我那时的情思是苦涩与辛酸的混合物。

“黄昏雨飘洒在异乡的浅草，冬寒加上乡愁，雨幕后的落日余晖，与亮着的屋檐的红灯笼的红光互相映照，在东洋小调的衬托下，我算是真正尝到去家离国的愁滋味了。”（《情思》）

就读南洋大学中文系，或许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气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时常沉醉到伤感凄迷的回忆中，每一篇精美动人的散文小品，似乎都是这种回忆的记录。风沙雁骨子里是位诗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传统文人，生活在现代化的新加坡或许不合时宜，或许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合时宜，除非在浪漫的幻想中。他一直向往中国的杏花春雨江南，可他游漓江时只在醉眼中才发现美，落后混乱的社会他是不敢恭维的。他说新加坡是一个火热的国度，在一个“似春似秋而都有所缺憾的时代与地带”，他“只有借文学作品中春景秋风冬寒的描写寻求解脱”。

写作是一种诱人的经验，它把风沙雁分隔在两个世界里，让他有机会“生活在别处”^① 生活在浪漫的幻想中。

二

真诚的幻想是存在的超越形式，在幻想背后有最严肃的忧虑。“民族与文化，有时困扰得我无法解脱……”（《秋意 秋意：诗情 诗情》）风沙雁的自白道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特有的关怀。所谓知识分子，是那些“有勇气的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人。他们关注

^① “生活在别处”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名。

的不仅是社会物质的进步,还有文化的完整性与连续性。T·帕森斯在论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时主张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在分析上的独立性,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角色资格,主要体现在他们“将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面对新加坡特有的文明结构,风沙雁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就显得分外突出。新加坡各民族之间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的制衡关系使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难以成为正统文化。而建设新文化的希望又飘浮在各种文化表象之间。因此真正的文化并不是靠举办几场音乐会、体育比赛或书画展就可建设起来的。文化必须具备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内聚力,是由一个民族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积淀完成的。现代人拼凑性地凭空创造文化只能创造文化真空。生活在这样一种文明结构中,风沙雁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不可避免要把文化关怀置于他精神的核心与创作的核心。说他是诗人,只能说明他创作的一部分或他的基本气质,他还写过许多政论杂文、文艺随笔;或许“文人”更为全面,他是一个典型的华族知识分子,善于理智地分析与批判,富于正义感与勇气,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风沙雁用散文的抒情形式表现他在文化身份失落后,从寻梦到寻根的情感历程。散文小品是他情感生活的实录。与此同时,他也带着深深的忧患,理智地思考新加坡文化和华族文化的建设与失落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沙雁的创作经常理趣多于情趣,他不仅从事散文创作,也致力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而且在后两方面的成就绝不亚于他的纯文学创作。

从抒情散文到政论杂文,我们已从风沙雁的精神世界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而将这情理两端统一起来的,仍是那种深切的文化关怀。在新加坡,即使人们在建设优雅文化上达成共识,很多现实的矛盾仍是困扰人心的。本族文化与本国文化,文化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之类本来在传统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在新加坡都变得分外敏

感。风沙雁在他的政论杂文中,除了一部分讨论具体社会问题,大部分涉及到新加坡文化建设与华人文化的延续与继承。在此我们发现他在散文世界中情感化表现出来的核心关怀,在政论文字中被充分理智化了。这种理智化的过程与情感化一样是痛苦的,分裂的。首先,他在情感中一再把寻梦与寻根的寄托放在日本,理智上关于日本的侵华历史的理解却使他难堪,自己最浪漫美好的记忆竟依附在一个随时暴露出邪恶的土地上,一个能让他感触到民族文化之根的国土也同样令他想起民族的劫难。这是第一种分裂的痛苦。其次,不断滋养他的想象与情感,不断为他创造生活意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使他在现实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将他无情地割裂在幻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两个世界中,倍感孤独。此为痛苦之二。再次,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解决生存中的幸福问题。现代化与传统的断裂使失去文化连续性的华人体验到一种精神危机,生命失去意义也失去最终的归宿。除非你意识不到文化环境,稍有一种精神自觉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生活在支离破碎的精神家园中。文化的荒芜感让人难以忍受,此其痛苦之三。再次,母语日渐衰微,语言生态被破坏了。一个华族子弟可能在公共场合讲华语,在职业所用英语,在家中说闽南话、客家话或广东方言,而他们都可能不认识华文!语言的口头与书写形式脱节,语感以及寄寓在语言中的精神完整性失去了。华人已经失去了走入内心深处、沟通情感的符号。此其痛苦之四。华文没落,同时也剥夺了华文文学的读者。当文学家想再次发挥文学的魅力,将流落的华族魂召唤到一起时,他们痛苦地发现他们的努力最终成为没有回响的悲鸣。有人写没人读的文学是残废的文学。此其痛苦之五。这些痛苦在80年代那些年里一直折磨着风沙雁,构成他创作的冲动与主题。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母语的教育与传播、文化传统的维护与发扬等问题。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在《文艺絮语集》与《海外来风》中。

语言是凝聚民族的形式,华语与华文文学的困境实际上是华族文化困境的缩影。从日本回新加坡的十年间,风沙雁感触最深、议论最多的大概是华族母语与华文文学的衰落。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中。因此,提倡并从事华文文学创作,还不仅是一个纯粹审美范畴的事;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它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承继与发扬,关系到每一位华人精神家园的建设。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血脉。于是,在风沙雁的文艺评论中,我们发现那个贯穿散文与政论的同一精神核心——文化关怀。

风沙雁在文化大背景下思考华文文学的命运,这就构成他文艺评论的特色与思考的深度。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精华都积淀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用华文创作,在继承一种文学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传统。而广大读者的阅读又使他们分享到这种精神与价值观念。新加坡幅员小,人口少,语种多,华文作为传播符号的社会实用功能也在逐年缩小,英语又只可谋生不可谋心。异族语言实用却无法情感化,华人会陷入一种感情空洞中,华族知识分子尤其会感受到这种缺乏文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生命虚无感。在这种大背景下,华文文学的使命就不仅在于现实主义的参与社会或政治批判。浪漫主义的抒情可以慰藉人们孤寂空虚的心灵。浪漫是一种解放,它使人的想象与情感获得自由,使人性得以完善,使古老文化的精魂在每一个个体心灵中复活。东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有时过分强调文学的直接社会性与政治意识。理解风沙雁创作的价值,必须具备一个更合理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文化。风沙雁是位诗人,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比关注社会物质进步更关注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有人说新加坡只有专业人才,没有知识分子,我想这种评价即使有些道理,风沙雁也是例外。在我所知道的新加坡文坛中,风沙雁属于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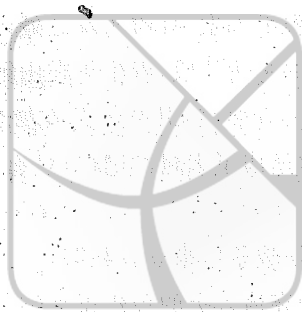
有“知识分子”气质与传统文化素养的那一些作家。

读风沙雁的作品，时常感到不论从思想上还是风格上，他都比时下许多大陆作家更加传统化。他有中国文人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关心，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对自然的敏感与对人文精神的热爱。20世纪中华文化花果飘零，这已不是一两位儒者的警惕，而是随处随时可以感觉到的事实与灾难。移居海外的华文脱离了文化本土，边缘化、漂泊感使他们更真切地体验到文化失落的危机。于是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而生活在传统之中的大陆文人，则更关心“文化革命”或自我否定性的批判。这是世界格局与本土眼界的区别。风沙雁始终有一种游子的心态，这种心态使他始终处在寻梦与寻根的痛苦历程上，使他始终把对华族文化、华文与华文文学命运的关怀置于他精神生活与创作的同心轴上。他知道华族文化与华文的衰微，知道华文文学的真正危机在于读者少，不是没有人写，关键是没有读。他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地带创作华文文学是少壮悲壮的义举，是一出浪漫的悲剧。

在落寞与痛苦中创作，可以体验到甜蜜与欣慰。这些年来，风沙雁笔下激情与伤感的情调淡了，文章写得越来越沉郁，理智与思辩色彩越来越浓。他好像正在从一位浪漫诗人转变成一位深沉睿智的学者。目前他在新加坡大学研修新马华文文学史。当然，他会继续写作，继续他的精神旅行，他已有过了令人难忘的经历，云南园晨曦暮雨的伤感，东瀛樱花枫叶的凄清，他还梦想着杏花春雨的江南。“我常常幻想把我的老年岁月掷在杭州西湖畔的闲步或扔进钱塘江畔的潮声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或明清小品文，都是我晨昏吟咏的作品，偶有感触，自会发之为文，可那时我能找到知音么？”（《心造意境》）

这是梦想，他也知道，可有梦即是有真，有梦就不孤独，就有希望。今年春上他再游大陆，最后一站是厦门，春雨时断时续，万物清

清明明，可他行色太匆匆。或许多少年之后，他仍在那个美丽的热带岸边，在雨后黄昏，在心造的意境中，向波涛之外，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遥寄情思。



后 记

蓦然回首，颇惊讶于流逝的岁月已那么多。引颈眺望，更感叹前景又何其苍茫。漫漫人生，鞋履所及之处，也曾留下些许雪泥鸿爪。童年如梦似云的生活片段，青少年在山冈上的笑声泪影，中年时代在异乡看到的春花秋月，壮年岁月在繁华都会与友朋偶聚的豪言壮语，这一切都已成了尘封的记忆，只有这些文字多少留下一点痕迹。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在找路，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这民族找到方向了吗？在这人类的理想近乎幻灭的时代，多少寓居他乡的华族知识分子，都在焦急着、探问着，这民族要走向何处？

午夜一点多的纽约街头，深冬的冷风扑向我们的脸，我们带着几分酒意，踉跄在凄冷的月光下，争辩着在这令人彷徨的年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该为这民族做些什么？次晨起来，我们已忘了昨夜争论的不愉快，大家一头投入小食店，就都在一起喝豆浆、吃油条和烧饼。我们属于不同的国籍，但同样流着炎黄子孙的血。你说黄土高原的贫瘠，我们可以不关心？你说江南暮春草长莺飞的景象，我们不会心动？

温哥华的秋的黄昏何其苍茫，那缠绵的雨把游子的心洒得都快碎了。偶然的相识，共同的语言，一下子就引出了一串串的飘泊

的故事。

华盛顿的夜又何其凄寂，我与白发苍苍的老报人茶叙，在街灯的昏晕光下，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含着对故土的怀念与关心。

我们来自没有领土野心又善良勤劳的民族故乡，寓居他乡，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只为了生存，盼望故乡能兴盛才是大家生活中的目标。

科技日益先进，资讯日益丰富，地球村的时代已到临，国家已不再是划分文化种族的标准，民族认同才是时代的大趋势。我曾在扶桑生活五年，我从我所结识的一批华族知识分子的抱负与言谈中，更加深我对地球村这概念的理解，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同一种族不一定得居住在同一个国度，有同样文化背景与思想倾向的人，无须受到国界的限制而不交往。人类文化创造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有在世界各地寻找知音的权利。人类的前途或许已不再是少数搞政治的人所能左右的，有识之士所扮演的角色应越来越重要。

在讲求功利的文化边缘地带生活是寂寞的，是绝难找到知音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我虽也曾出版过六册集子，但深感能读得懂或会去读你的文章的人一日比一日少，心情就更加的落寞。在一个不重视文化的地带生活，出书除了得自费外，还有有书也少有人要阅读的烦恼。庆幸的是，无论在多么荒凉的沙漠上，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丛生命力特强的花树，为荒漠的旷野涂上一些色彩。我过去出版的《文艺絮语集》与《哀思集》，就得到一位亦学员亦朋友的郭文龙君的赞助，每册二千新元，共计四千新元。郭君的这种出钱只为推广文化，而毫无为己利的精神，这几年来总教我铭记于心。

然而我终于决定，我不该继续在边缘地带出书，这除了“劳民伤财”外，也还因实在是难找到知音的缘故。1995年3月，我们到福建一行，到了厦门，与厦大的庄钟庆教授、陈育伦教授以及年轻

学者周宁博士见面。在饭余酒后闲谈时,无意中谈及出书的事,竟然得到他们三位的大力支持,于是我才想把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写的文章,包括已出版的与未出版的,挑选出一些来编为一个集子出版。这挑选工作就由周博士负责。他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还为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对我的作品的特点、个人的思想状况,都作了很深入的探讨,教我异常感激,也庆幸找到一位知音。庄、陈二教授又锦上添花,也各为此集子写了序文,为此集子增光不少。

当前的世界正是东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互相激荡的年代,华人的爱好和平个性与勤劳美德,华族文化的强调完成历史美的特点,无论对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文明的进展,都应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集子中所收的文章,有我在异乡的感怀之作,也有我在故乡的抒情之作,更有我对社会现象或措施的抒发己见。我并非不爱我的故乡,但我更热爱我的民族与文化,因此,我希望这些文章也能对中国的读者有点启示或参考的作用。

我想文化创作是全人类的,我因而不揣之翦随把此集子呈献给读者们。

作者



● 责任编辑:林秀平 ● 电脑创意:卢 清

ISBN 7-80640-046-X



9 787806 400463 >

ISBN 7-80640-046-X
I · 941 定价:35.00 元(上、下卷)